暗箭难防——毛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再认识（兼错误认识系列第四篇）

作者:sss

上次的一系列文章写完后，笔者发现有些问题没讲清楚，所以准备讲讲这些问题。读者们没看过上次文章也没关系，本文完全可以直接看。首先谈谈标题，为什么说暗箭难防呢？所谓的暗箭，是指隐藏起来的箭，这样的箭会给人们造成伤害，但又偏偏难以注意到，所以难防。笔者在这里写的暗箭，其实是指过往乃至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等。这些东西一方面是人们过往认识的结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是反过来其中认识的一些不完善部分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最终反而要“暗箭伤人”，从而起到反面效果。反过来，如果把“暗箭”变成“明箭”，那就好防了。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那就需要再认识，也即先把毛时期乃至流传到今天的认识列出来，然后去认识这种“认识”以及这种“认识”所反映的现实。在这种认识冲突中逐渐揭露出过往的认识为什么会产生？过往认识的不足体现在哪？新的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如何产生的？把这一系列问题搞清楚，那就不是“暗箭难防”，而是“明箭可防”了。

同时这篇文章也算是笔者上次写的一系列文章的续篇，前面的文章表达了笔者这样一种认识，在这里笔者再复述一遍。笔者写的文章是这样一个思路，也即现在很多流行的左派观点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但是许多人只是满足于复述这些观点。这就实际上妨碍了对现实的认知。所以笔者就选了一个比较为左派公认的观点然后去开刀，动他一下。也即《共和国的历程》里面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产生，完全不是因为毛时期的经济上存在问题，甚至于，毛时期的经济增速比改开后还要快，至少是不慢于后者。改开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走资派为了自身的利益颠覆社会主义道路。

而笔者的观点则是，社会主义毛时期在经济方面是存在问题的，《共和国的历程》实际上把新民主主义时期（49-56年）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56-76年）混起来谈，利用前一个时期经济增速快的特点变向掩盖了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增速下降的特点。而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路线是不一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很多做法反而是和新民主主义时期抵触的，这就陷入一种矛盾中。到底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路线更有利于发展经济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更有利于发展经济？如果从经济增速来看的话，答案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路线更有利于发展经济。而这个答案实际上刚好是忒涩的答案。如果大家仔细看过忒涩讲新中国经济史的书的话，应该能注意到这样一条主线。也即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比较良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就开始乱来了，经常性的违反“经济规律”，这就导致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毛死后，中国又重新开始按“经济规律”办事，国民经济才从崩溃中得以复苏。

也就是说，《共和国的历程》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准确地打中忒涩观点的要害，反而是变向承认了对方的观点。

但貌似没多少人注意到这种矛盾，反而是一些人对笔者产生了一些误解，认为笔者是在讲→派观点。其中一位先生就出来指责笔者把毛时期的经济增速估计过低了。这位先生提供了很多资料、数据，这是非常可敬的。毕竟许多人反驳时往往答非所问，给不出什么论据就硬要别人认可，在这种大环境下还愿意费时间搜集资料本身就是很可敬的行为。不过这位先生骂了笔者→派，笔者受激也反骂了回去，现在看来属实冲动，在这里顺便给这位先生道个歉。

总的来说呢，笔者和这位先生论战后逐渐达成了一致，那就是都认为社会主义毛时期的经济增速相对来说依然是很快的。笔者其实一开始反驳的其实是把这种快速夸大到不适应的程度，以至于掩盖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乃至于变向承认了忒涩的观点。

当然，笔者和这位先生之间还是有一些分歧，比如在一开始这位先生依然是习惯性从49年开始算，当笔者指出这段49-56这段时间不妥后，这位先生就转而认为76-84这段时期依然可以算是社会主义时期，因为这段时期经济体制没有变化，这段时期的经济成就依然要归功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笔者对这个观点既有赞同的部分，也有不赞同的部分，此次写文就是来系统阐述笔者的观点。

一，

首先先谈谈经济体制问题，什么是经济体制?这要从生产关系的两个层次出发，第一个层次是基本的生产关系，主要包含所有制，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分配关系三个范畴。基本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

第二个层次是具体的生产关系，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上来讲比如以前的计划经济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国家为了调控某些产品的产量而直接修改其价格，比如为了刺激农民进行棉花生产，国家就把棉花价格升高。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棉花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

微观上来讲则是具体的所有制制度，比如全民所有制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等。

说白了，具体的生产关系就是所谓的经济体制。

基本的生产关系就像内容，具体的生产关系就像形式。两者中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是前者的表现。所以，相比于经济制度，基本的生产关系才是最为根本的，那当时中国的基本的生产关系变化情况如何呢？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要首先明白这样一点，那就是现实实际存在过的社会主义模式，比如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马恩列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一样的。马恩列所设想的模式是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分配上的不平等仅仅只是跟个人提供的劳动量的差异有关，而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无关。这里实际上是说，马恩列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下，每个人对全部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都是平等的，而不存在差异，由此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也就与分配无关了。举个例子来说:

“氏族制家庭经济就是这样简单明了，人和物的关系如此，人和人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个人劳动力结合成为集体劳动力，在公有的土地上共同劳动，所得的劳动产品属于公共所有,实行直接的统一平均主义分配。 消费也是共同的，住的是大房子，吃的是大锅饭，只有贴身衣饰归个人。在集体劳动中人人出了力，在共同消费中个个都有份，大家的利益融为一体，在它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自己的特殊个人利益。食物充足时共同饱餐，匮乏时一起分担饥饿。食物从生产到分配以至消费都是大家共同参加的，再生产过程的不断往复都是有目共睹的。

生产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公社内的直接分配。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的伴侣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

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是怎样的: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已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出自《商品经济的起源》，P37）

以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共同点，在真正的公有制下，是不存在某些人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损害他人的利益的情况的。每个人都是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集体的意愿联合起来参与劳动，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劳动贡献直接享受相应的劳动成果，个人劳动直接就是集体劳动的一部分。马恩列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当然。相比起原始制度，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空前广泛的基础上，这必然要表现出一些新的形式，这和几十人聚在一起就算社会的氏族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现实存在过的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都与马恩列的设想是不一致的。就比如每个人都是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这点，社会主义时期（1956-1976）中国一直存在的一定的个体经济，个体经济本身就表明个体生产者所占有的这部分生产资料只归他个人所有，而与其他人无关。反过来，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个体生产者也无权支配使用，比如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人就属于这类。亦或者是集体农业中残留的自留地、家庭副业这些。这些形式都不同层次地表现为私有制形式，也即我的劳动与我的生产资料结合，然后我来支配我自己的劳动成果。整个过程是排斥共同使用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排斥共同劳动的。

但要注意，上述所谈的这些，只是为大家熟知的私有制形式，其实还有大家不熟知的形式。举个例子，生产队赶大车。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地方运输使用的还是骡子拉的车，用来承担些拉粪、拉庄稼、拉煤之类的活。在这里就存在一种情况，也即负责赶车的人在把生产队的活干完后会去接私活，从而获得高额收入。为啥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基本分配模式不一样。如果不接私活的话，假设赶车的人赶一天车记10分工分，一年工作300天挣了3000工分，然后年底结算时，1工分值0.05元，这样他总收入就是150元了。在这里，赶车的人能挣多少不在于他赶车值多少钱，而是在于生产队的总的净收入是多少，然后按照他的劳动量给予其相应报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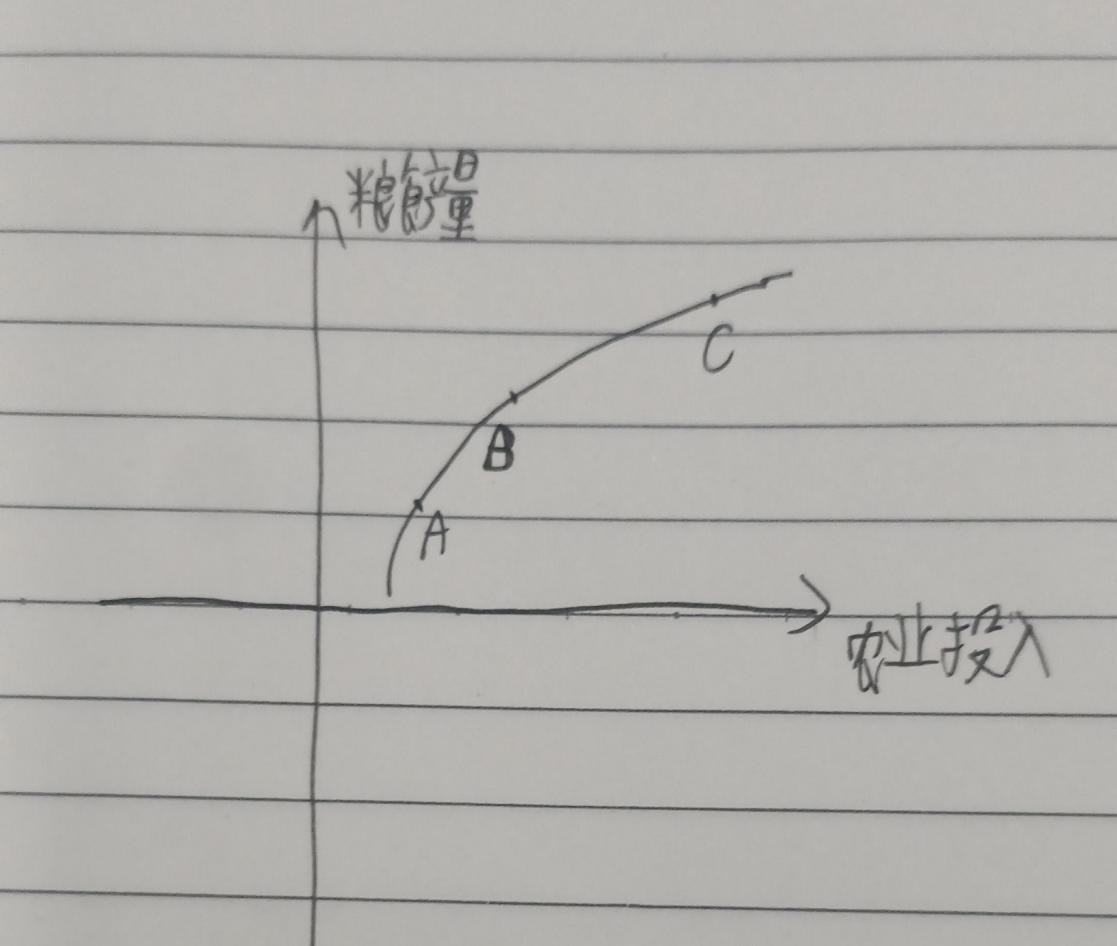
在这里就有个矛盾，那就是赶车值的钱和干农活值的钱是不一致的。比如可能种田一年只能赚150元，赶大车一年就可能赚到300到400元。对赶车的人来说，如果只是帮社里拉东西，那就像给自己家里带东西一样，是没有报酬的，但是一接私活就有报酬了，钱还特别多。对比一下原始的公有制就能发现问题在于，原始的氏族公有制时期，是没有商品关系存在的，个人付出劳动，劳动成果直接分配给整个集体，说白了在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商品交换的，因为只有一个占有主体，那就是社会本身，而自己是不能和自己进行交换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毛时期不是如此，赶车能赚多少钱，本身就意味着商品交换关系存在，交换关系存在就意味着存在不同的占有主体，这就和只有一个主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相冲突了。这实际上就说明，不同的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力是不等的，社会本身也没实现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就好像说两个人共有某物，实际上也是说两者对这个物品的使用权力相等。就比如两个人共同出钱买了一辆车，两者出资相等，两个人平常按照各自的需求通过商量讨论的方式来确定谁来使用，这就是两者的所有权相等。反过来，如果其中一人出了绝大部分钱，另一个人只出了小部分钱，出钱多的人要求一周可以开六天，剩下一天才归另一个人。那么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两者公有一辆车，另一方面两者的所有权却是不等的，这种不等本身其实就是私有制的体现。

还是以赶大车为例。赶大车的人通过接私活实现超额收入，表面上看好像经济体制没有变化，依然是人民公社所属的生产队，但是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层面却发生了变化。就所有权来讲，大车是属于生产队这个集体的，但是从实际上来讲所有权就受到了侵害。因为所谓的所有权并不是说只是指生产资料名义上归谁所有这个问题，还包括生产资料如何使用（这里叫使用权），使用生产资料的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这里叫分配权）。很明显，使用权、分配权不过是所有权的实际体现罢了。使用权、分配权受到侵害，实际上表明所有权本身受到了侵害。赶大车的人接私活，这是背着集体干的，违背了集体意愿，这就侵犯了集体的使用权。赶大车所得到的收益，由赶大车的人私吞，这实际上也侵害了集体的分配权。再加上赶大车本身也会对车造成磨损，这就需要额外多出修理费，这就需要集体付出一定的劳动给予补偿，从这个角度来讲，接私活本身也等于无偿占有集体的劳动成果。而现在就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下有一种新式的剥削，和经典那种资本主义式的工厂主剥削工人不同，社会主义下的新式的剥削表现为无偿占有其他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在这里，赶大车的人本身是劳动者，但却无偿占有了其他人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说，名义上是集体所有，是公有，实际上里面却存在私有制。当然，上述讲的其实是不被集体所有制的存在。

但从集体所有制来讲，这种个人不等的情况依然存在。还是以赶大车为例，假设赶车的人只为集体工作，即使是出去拉活，所得的收入也是全部交给集体，然后年末统一分配。看起来好像是在这个集体内部实现了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平等，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范围来讲，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依然不等。比如只有富裕的集体才有大车，才能靠赶大车去赚钱，赚的钱自然归自己所有，别的穷集体自然是没法沾光。即使是都有大车的集体，所处位置好，靠近城市的，才好靠跑运输赚钱。位于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的集体自然也没办法靠赶大车挣钱。与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每个人都拥有对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来对比。那么在这里是，每个集体只是占有各自的生产资料，并不占有其他集体的生产资料，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使用其他集体的生产资料。每个集体的劳动只是与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结合，然后由此获得的收益只在自己所处的这个集体范围内才进行分配。一句话，把集体看成一个大号的个人就好了。很有意思的事就在这里，集体是相对个人来讲的，是个人的集合。但是又有小集体与大集体之分，大集体由小集体组成，是小集体的集合，小集体相对于大集体来说又是个体。

这种不等在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也存在。某个人民公社集体只能管理自己的生产事务，也就是说只有权力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他是不能参与国有工厂的生产计划制定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国营工厂本身也没权力替人民公社制定生产计划。双方只能够各自使用自己所占据的生产资料，然后获得各自的收益罢了。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农业相比工业来说是效益很低的产业，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增长的很慢，而已农业还存在一个效益递减的情况，也即你越是增加投入，作物的产量反而增长的越慢，甚至出现这种情况，你增加投入提升产量，但是你的产量提升还补偿不了成本。举个例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没咋使用化肥时，每使用一斤化肥可以增产一百斤粮食，到后面亩产量逐渐提高，使用化肥的效益开始下降，下降到每使用一斤化肥只能增产六十多斤粮食。而再到后面粮食产量极高时，每使用一斤化肥就只能增产粮食六斤了。所以粮食产量越高反而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卖掉增产的粮食所获得的钱甚至没有办法补偿买的化肥所花的钱。在毛时期就有这种情况，高产队产量太高，但是继续提产量反而亏本了，所以宁愿选择减产。



举例来说，在A点农业投入100元，粮食产量100kg，1kg粮食值2元，这样最终收益就是100元。从A点到B点增加投入100元，粮食产量增加200kg，这样收益增加300元。从B点到C点增加投入300元，但是产量只增加100kg，这样收益反而要减少100元。所以，农民会尽量将农业投入控制在C点前

而工业的情况则与之相反，工业相对来讲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快，也没农业那种严重的效益递减情况。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单位农产品所蕴含的价值量下降的很慢，而单位工业品的所蕴含的价值量则下降的很快，假设工农产品本身的价格不变，这就会使得工农产品交换时有大量价值转移到工业。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就是工农差别的存在，工人农民都辛苦工作一年，但是彼此收入差异却很大，比如农民可能一年只能收入100多元，但是工人可能就有4，500元。对这种情况有人的建议是快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即让每个农民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这样产的多，卖的多，也可以使得单位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值接近相等，这就能从根本上消灭工农差别。但其实这种想法依然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工农收入差异的根源不在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的快慢，根本在于工农对彼此的生产资料处于一种分裂状态。说白了，工人只占有工业生产资料，农民只占有农业生产资料，双方各占据一部分生产资料，而不占据另一部分。

这就导致工人，农民的收益本身只是紧紧地与各自所处的行业有关，而与其他行业无关。在这里笔者做一个假设，如果每个人都是半年干农业，半年干工业。那么不管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高还是低，到最后每个人的收入都是基本一致。因为在这里，农业的低效益的代价不是专门由某些充当专职农民的人来承受的，而是由全社会，由全社会包含的每一个个体承受的。反过来，工业的高效益也不是由专门充当工人的人来享受，也是由全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来享受。

所以问题本身的关键并不在于工业，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一致，根本因素在于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等，在于个人仍然没有占据一切生产资料。这就导致事实上的劳动者之间的分裂，而不是联合劳动。这就导致工人只占据工业领域的生产资料，工人的劳动只与工业领域的生产资料结合，由此工业领域产出的成果则只为工人所占据。农民只占据农业领域的生产资料，农民的劳动只与农业领域的生产资料结合，由此农业领域产出的成果则只为农民所占据。由于工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增速不一致，由于仍然存在事实上的不同的所有制主体从而导致交换关系必然存在，这就会使得工农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也几乎是必然存在的。即使反过来，哪天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革命性突破，增速比工业还快了，（比如今天人工合成粮食）那不过只是开始农业剥削工业的进程而已。

现实的各个行业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有些行业往往好发展效益高，有些行业往往不好发展效益低，而现存的人类社会的行业则是越来越多，大行业内部又可以划分为各种小行业，指望全部行业效益一致从而实现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不是在于使各个行业发展的效益一致，而是在于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然后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承担代价，享受收益。

由此我们再对比一下原始氏族的劳动情况，原始氏族很可能一个氏族才几十人，这几十人共同居住在一起。一部分男人出去打猎，采集食物，采集到的食物带回来后就直接由居住地的女性进行烹调，然后整个氏族集体共同享用。在这里劳动分工就像人的各种器官的分工一样自然，而不需要说我打猎付出了多少劳动，所以我要多少报酬，我做饭处理家务付出了多少劳动，所以我要多少报酬。而类似的事件在今天可谓是反复发生，一家人内部吵架时，习惯就是互相强调自己做了多少贡献，对方多么没用，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种私有制思想的表现。付出了多少劳动，就要求多少补偿。

再看看列宁说的:

“如果所有的人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所有的人”真正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到达到了人人都识字，而且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关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一天之内立刻推翻资本家和官僚，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统计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当大家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统计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少数的例外,井且还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谀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这样，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安排好”幷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做同等的工作，正确完成工作量，领取同等的报酬。资本主义使这种统计和监督变得非常简单,成为一种非常容易、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察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统计，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们就绝对无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无处躲藏"了。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出自《国家与革命》，P89-P90）

列宁是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个大工厂，在这个大工厂中人人真正去参加管理。但是现实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的，工人农民直接互相分割开来，即使是在工业内部，也往往是各自领域、工厂的工人管各自的事务。即使是在一个工厂内部，也往往是干部、技术专家等少数人掌握管理权力。在这里要注意，如何管理使用生产资料本身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权的体现。由此可见，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仍然不是马恩列所设想的理想的那种社会主义，他没有做到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也没有做到每一个人都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马恩列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一致的。

这种不一致在现实中实际上产生了严重的效果，举例来说，现实中苏联宣布自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按照理论的社会主义来讲社会主义社会下是没阶级的，因为所有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都一致了嘛！都一致、都平等就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存在差异了。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每个人都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不可能存在人剥削人或者人控制人、压迫人的情况。我国后面指责斯大林没有认识到小生产会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规律，其实这个说法苏联那边也知道，但是苏联方面认为这属于中国方面滥用列宁的说法。他们认为列宁指的小生产会不断产生资本主义主要指的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建成社会主义的苏联内部就不存在小生产了，要么是集体农庄生产，要么是国营企业生产，由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苏联根本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事实证明苏联人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但是中国方面的解释也不尽正确。先看一段苏联学者的认识: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集体农庄经济成分中存在个人副业,反映着农村社会主义关系的不完备,而希望享有一块宅旁园地，似乎也是集体农庄庄员当中仍旧残存着私有制残余的表现。这是不符

合社会主义的实际的。集体农庄是农民的共产主义学校。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在农村也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必须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物质刺激，以及他们从物质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关怀，同私有制残余的表现严格区别开。苏联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因素。看来，任何一点点的私有制关系，一定会造成攫取别人劳动

成果的可能性和客观必然性。如果没有攫取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也就是说没有人对人的剥削,那么任何私有制的关系，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发展。

(符·温什尔:《副业是农产品生产的补充源泉》，《经济学译丛》1962年第

5期第29页)”

在这里有几个要点，

一，认为苏联当时存在的是纯社会主义关系。

二，在这种关系下，不会具备剥削人的可能性，现实性，也即根本不会存在人剥削人的现象，更别提发展。

按照小生产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实际上难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小生产实际上指的是小商品生产者，或者可以直接简单理解成个体农民，这是公认的私有制。但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呢？社会主义下集体经济是小生产吗？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小生产吗？并不是，也就是说，直接按照小生产产生资本主义这个理论是没办法解释社会主义下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现象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规律本身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所谓的小生产者，指的就是一家一户经营自己的生产资料，然后自己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这其中经营条件较好的小生产者不断地积累资金，接着便选择扩大生产，雇佣其他人来为自己打工，由此小生产者就转化为资本家。这里的要点实际上是，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劳动才会产生。如果说全世界只有一户小生产者，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那这样照样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只有一个主体是没有商品关系的，也不会产生剥削关系。所以，小生产产生资本主义其实是表象，最根本的其实是存在不同所有制主体会产生资本主义。

那在实际的社会主义中是不是存在不同的所有制主体呢？答案是存在。比如每个集体经济单位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孤立的所有制主体，不同的集体经济完全可以作为不同的所有制主体而存在。他们之间会进行商品交换，有时候甚至出现雇佣劳动力的情况。比如社会主义毛时期存在这种情况，一些生产条件好的人民公社，缺劳动力，然后就有落后地区的人过来“打工”，这实际上无非是一个集体共同剥削外来劳动力罢了，只不过这个集体本身又全都是劳动者。再比如全民所有制内部还存在临时工，发给临时工的工资虽然和一般工人一样，但是一段时间后他就会退出工厂领域，他所创造的多余的价值反而留在了工厂。

我们把社会主义理解成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个人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正确的讲法是:

一，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纯社会主义关系，他内部依然是社会主义关系与私有制的对立同一。

二，在这种关系下，实际上具备着剥削人的可能性，现实性。而现实也必然存在人剥削人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也要发展。

在这里要强调下，这里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又有差别。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主要是资本家所有，劳动者一无所有。这里的私有制则主要是占有不等，也即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彼此之间的占有关系不等而已。

既然是现实实际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关系并不是纯社会主义的，而仍然是社会主义与私有制的对立统一。那么这种对立统一也必然反映在其对应的具体生产关系——也即经济体制上。说白了就是，现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中国，他们的经济体制实际上都不是纯社会主义的，这些经济体制本身就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

二，

现在来具体谈谈这些经济体制的变化情况，76年后农村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77年时安徽出了个省委六条，引用如下:

“

“省委六条”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总体思路就是将农民从极左路线的紧箍咒里解放出来，给予更多的个人自由发展空间。

安徽的“省委六条”是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产生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自然引起了不同的强烈反响。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召开有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逐条讨论。不少人对“省委六条”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方向!”“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啦!”“这样下去， 会不会滑到1961年。

由于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形成了不小的阻力，原来准备写进去的一些放宽政策的条文，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富有政治经验的万里特意嘱咐农委:不要勉强，强求反而会把事情搞糟。经过修改并作为正式文件的“省委六条”一经发出，不仅轰动了安徽全省，而且引起了中央高层和其他地方的关注。<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纷纷派人到安徽组稿。1978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发表了记者写的有关通讯。1978 年3月，新华社播发了万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成了当时的重大新闻。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热情肯定，在出访巴基斯坦的途中路经四川，向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 紫阳做了推荐。邓小平表示，我们现在需要有些新概念，不能老是原来的老框框。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受四川省委委托，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专程到安徽采访学习。

在万里领导下出台的安徽省委六条，虽然带有落实过去较宽松的农村政策的色彩，但大大突破了60年代初以来极左路线为农业生产设置的种种框框，更突破了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划定的条条界限。“省委六条”所包含的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可以到市场出售剩余产品，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到人等，与大寨经验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也走出了按照大寨样板划定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的禁区,在打破十年动乱以来农村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探寻中国农业发展出路方面迈出了十分可贵的一步。可以说，没有“省委六条”，也不一定有后来在安徽首先兴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率先搞农村承包制的便是“省委六条”的诞生地——滁县地区。”（出自《包产到户沉浮录》，P225-P226）

在这里像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市场出售多余收获啥的，许许多多的人早就注意到了，所以笔者在此不多赘述，笔者在这里专门强调下所谓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一般算作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这种责任制从合作化之初就存在了，在人民公社时期继续存在，学大寨时期才被批判进行消灭。一开始叫做三包一奖。三包一奖制度是针对这种情况产生的，在人民公社创立之初，大队往往采取按实计算的模式。这是啥意思呢？假设一个生产大队内部只有两个生产队，两个生产队人口相同，每年提供的劳动量也相同，但是其中一个生产队生产了30万斤粮食，另一个生产了10万斤粮食。最后分配时就是把全部40万斤粮食收上去然后按照每个生产队给的劳动量进行分配，这样每个生产队就各分20万斤。这样高产队就有意见，觉得我辛辛苦苦在我们队的土地里苦干一年，怎么到了年末分配时隔壁完全没出力的队来沾这么大的光?由此往往会出现躺倒不干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在60年代初采取的方式叫三包一奖，三包指的是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指的是超产奖励。

包产指的是生产大队把一部分土地、耕畜、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交给生产队使用,并用承包方式或合同形式责成生产队在一年内生产队相应数量、种类作物。生产出来的这些作物最终都上交给生产大队按照各生产队的工分量进行统一分配。一旦说你的实际产量超过了所包的产量，那么就可以获得超产奖励，这就是所谓的一奖。

包工是指根据计算直接把一年需要多少工分包给你，这样的话假如一个生产队一年有10个劳动者劳动一年的工分，但是实际上我只出了8个劳动者劳动一年就把活干完了，那么参与分配时我就可以多吃两个劳动者劳动一年的工分的收益。说白了，包工的目的是为了让生产队提高劳动效率，节省劳动量的。

包成本就是，生产队生产需要多少钱的化肥、农药、种子啥的，直接把相应的钱发给生产队，生产队自行使用。这样如果合理安排这笔费用的使用，就能节省一笔钱。

这三包一奖的核心在于一个“包”字，所谓的“包”字的本质在于将一部分生产资料固定给一部分劳动者使用。我们知道劳动的整个过程是劳动者提供劳动量与生产资料结合，然后提供劳动量的劳动者就具备对这部分劳动成果的天然占有权。所谓的“包”字的要害就在于此，因为“包”的特点不是去要求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不是去要求个人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是反过来要求个人被束缚在一部分生产资料上，把个人束缚在一个狭隘的活动范围内，“包”的手段本身就是导向私有制的重要手段。说白了，三包一奖就是包产到生产队，而要注意，历来包产到生产队并不被看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然，在人民公社建立初期，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当时叫生产小队）上也被看做右倾行为。

再引用下:

“

1961年6月15日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公社在经济上，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和组织集体福利事业的单位。”“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可以一年一包，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两年、三年一包。包产指标一定要经过社员充分讨论，一定要落实，一定要真正留有余地，使生产队经过努力有产可超。超产的大部或者全部，应该奖给生产队。”“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临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耕畜、农具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

”（出自《李文: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

联系对比下就会发现，上面这种说法实际上和包产到户很像。包产到户是什么？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也就是说，包产到户这种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首先是将一部分土地，牲畜，农业生产工具等固定给对应的户，实际上就是说分地，分生产资料，各家各户私有各自的土地，农业生产资料。然后集体根据往年收成情况给每家每户摊牌相应的粮食指标，超过指标的部分全部由自己支配。

彼此的区别在于，首先是包的对象不一样。61年的人民公社条例相比大跃进时期的差异在于，包的对象从生产队（也即生产小队），进一步划到了生产组乃至个人。所谓的生产组，其实就是属于生产队的更小的集体。举例来说，小岗村搞彻底的包产到户前，实际上先搞了包产到组。小岗村那时候100多个人，一开始划分成两个作业组，每组五六十人，但是有人嫌这样还是平均主义，还是吃大锅饭。所以后面划分为四个作业组，这样每个作业组就只有二三十人了。但是作业组划小后，吵闹反而更多了，因为活动范围小了，谁勤快谁懒惰一看就知道，都怕自己吃亏，反而吵的更厉害。结果后面划成8个作业组，每个作业组只有10到15人，实际上这和一家一户已经很接近了。但这样还是不行，还是有剧烈的矛盾，以下为引用:

“

划成了八个组，大家才发现，这些“作业组”就成了“父子组”“兄弟组”或是“邻居组”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两家) ;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父子、女婿三家) ;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两家) ;

六组:严家其、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两家邻居) ;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两家邻居)。

这样一分，就都很满意。认为这是“ 被窝里划拳——没掺外手” ，谁都以为这样就不可能再生发出什么问题了。

然而，首先感到仍有问题的，就是严宏昌。

严宏昌和严付昌划在一组， 严付昌是他亲弟弟，两家一直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两家人现在成为一个作业组，如何出勤、如何记工，弟弟严付昌和他的看法首先就产生了分歧。他家是两个劳动力，六口人，弟弟严付昌是四个劳动力，八口人，如果依然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即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严付昌家劳动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严付昌就提出要凭工分不按入口搞分配，这样一来，严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再说严宏昌毕竟当了队长，队上的事不能不问，弟弟又是个急性子，看到农活缠手，进度太慢，便发了脾气，吵着要分开。

这事，严宏昌本来是应该想得到的。在外承包工程，为确保工程的工期和质量，他也是六亲不认，不会去照顾亲朋好友的。现在弟弟提出要求和他分开干，感情上虽然受不了，但他知道弟弟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而且是合情合理的。

同样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严俊昌和严美昌兄弟俩也闹了起来，并且闹得不可开交。

严美昌是个直性子，又是个勤快人，每天天刚亮，他就把全家人喊起来，早早地就下地干活了，干完一茬活， 才回来吃早饭。哥哥严俊昌，夫妻俩带着八个孩子，孩子一多，事情就多，每天就不能和严美昌一家人一齐下地。一天两天，还没什么，日子一长，严美昌的孩子有意见了，见地里总是自己一家人在忙，就埋怨:“ 爸，我们都干了半块地了，大爷他们怎么还不来干活?这地又不是咱一家的，不干了!”严美昌也开始沉不住气了，这天冲着严俊昌嚷起来，坚决要分开， 不愿再捆在一起了。严俊昌也很生气，但想想却又不占理。

严宏昌和严俊昌是亲叔伯兄弟，平日无话不谈，于是严俊昌就把自己的苦恼跟严宏昌说了。严宏昌一听，心里咯噔跳。

他寻思道:生产队的三人领导班子，两人“后院失火”了，这问题就不小:队干部自己家里的问题都处理不了，还能去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吗?

不过，他也发现，组划小了，各自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更直接;这样划分，依然存在平均主义问题，只是“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

”

（出自《小岗村的故事》，P30-P32）

在这里就有几个要点，首先是记工问题，所谓的劳三人七是啥意思呢？这里的作业组总共14口人，假设年末收获粮食14000斤，那按照劳三人七的分配方式就是，14000先划出其中的七成也即9800斤出来，这9800斤直接平均分配给14口人，平均每人分700斤，也就是说人七指的是收获的七成中直接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这部分分配是根本不管你这部分人口是否参加劳动的，也即不属于按劳分配。剩下的4200斤分配给参加劳动的6个人，每个人平均分700斤。最后结果是严宏昌家获得2\*1400+4\*700=5600斤，严付昌家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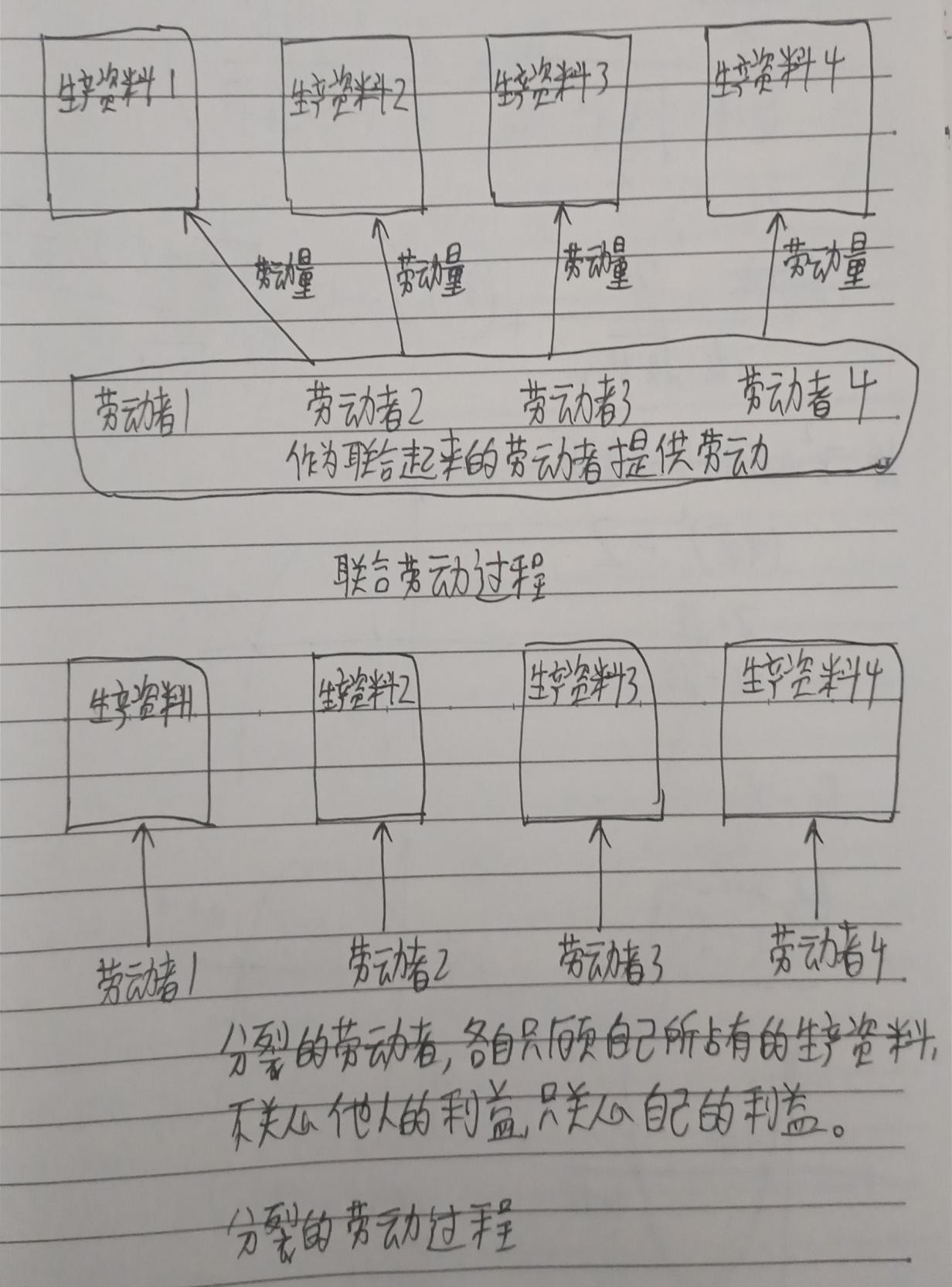
4\*1400+4\*700=8400斤。

如果完全按照工分的话就是，严宏昌家获得4666斤，严付昌家获得9332斤。很明显，靠人七制度严宏昌家能直接多获得1000斤粮食，这实际上是无偿占有严付昌家的劳动成果，所以严付昌家自然想单干。这种情况就是一直以来经常所诟病的所谓集体经济制度内部的平均主义，说白了这是一种劳动力差的家庭无偿占有劳动力好的家庭的劳动成果的一种模式。

接着我们在看干活多少的问题，严宏昌是队长，队里的事需要去处理，这样地里的农活就经常顾不上，只能靠他弟弟多出力。对他弟弟来讲，这就属于一种平均主义，也即他自己的劳动成果要被哥哥无偿占有一部分。更麻烦的是，由于哥哥老要去处理队里的事，地里的活可能干不完，这就要严重影响最终的产量。严美昌的例子也是同理，他哥哥严俊昌一家由于家事多，到地里慢，总是严美昌家多干活，到最后又可能会产生严俊昌一家无偿占有严美昌一家劳动成果的事，这又是一种平均主义。所以，哪怕是承包的单位划分到只有两户的作业组，还是被人们看成平均主义，二锅饭（也即小的大锅饭）。由此就非得再往下面划到包产到户不可。

但实际上，即使是划到包产到户，所谓的“平均主义”仍然不能消除。如果大家熟悉今天的农村的话，估计可以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一户夫妻经营田地，丈夫经常性出去打牌赌钱，妻子不得不多承担农活以及做家务。而丈夫脾气又不好，动辄打骂妻子，双方往往会爆发激烈争吵。争吵的话题往往就是各自对家庭做了多少贡献，对方是多么好吃懒做，多么废物云云。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各自做饭给各自吃，然后分田，各自种自己的田，得到的钱归各自支配。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平均主义仿佛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样，不惯你是包产到队，到组，还是到户，他都要存在。他一存在，各人的私心就涌动，就都觉得自己吃亏，就要就继续划小生产单位，就要求继续分生产资料。这整个过程不是一个个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然后联合起来的个人联合劳动的过程。而是反过来一个人只占据自己的生产资料，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一个极其狭隘的范围内，拒绝与他人联合，而是选择加深与他人分裂的过程。



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毛时期也存在与这种过程对立的行为，就比如大寨村，以下为引用:

“1956年春天，正值播种大忙季节，我到孔氏、南泉村下乡检查生产，发现生产队长每天因为派活，叫人上地，忙得团团转，死分活评在一些队还能评得开，一些队其实是死分不评，每天起来还是记老底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影响。

回到县里，我就找陈永贵，问他的劳动管理情况。陈永贵说:

“初级社时期，大寨实行的是死分活评，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评出劳动底分，再看当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结合底分进行活评。这办法执行得虽然不是太好，有时候评不开，有时候能活评。即使这样，这种办法当时基本做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因为初级社是在老少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时候人心齐，都不愿意让别人说自己劣，都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还不错。现在的情况变了，全村的人都入了社，人心七股八叉，常言说，‘人心齐，泰山移。'人心不齐，各有各的小算盘，这种办法就不灵了。现在有的人是集体地里养精神，小块地里杀冲锋。我看还得上新套套。”

我赞同地说:“是呀!‘定额管理’这个办法你听说过没有?”

陈永贵说:“听说过。

我说:“就是以一个中等劳力积极劳动一天所能达到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一个劳动定额，确定每完成一个定额记多少工分。然后按照定额把工包给作业组。活干完了，经过检查验收，实行按件记工。这样比‘死分活评'进了一步。”

陈永贵说:“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我说:“你回去试一试。今年咱县已经有几个队进行了试验，凡是干部认真、验收严格的，效果还比较好。”

陈永贵回到大寨，首先在第一生产队推行，社员的积极性比“死分活评”时要高，报酬也比较合理。1956 年一年就在全大队推开。由于从生产队到包工小组都认真试验，都感到这办法可以。但是有两个矛盾突出暴露出来:

一个是为了完成定额不注意质量，形成了严重的雇佣关系，你给我多少工分，我给你干多少活。没有工分的活，本来能捎办的事也不干。比如一次一个人耕地，地根放着一块石头，本来往地边搬一搬并不费多大力， 可他就是不干，只移到已经耕过的地里。人问他为啥不搬到地边，他说:“石头上又没有号着工分。

大寨是这样，全县亦然。自从实行定额管理后，人们都感到社员的积极性倒是提高了，但是生产质量不能保障。特别是年轻人。西大街有个社员锄地，一天完成了两个定额，质量却很差。队长让他返工，他和队长吵了一架。为解决这个问题，县里开过多次会，和很多村干部商量过，还找过一些老农，征求他们怎样保障营生质量的意见。一个老农说:

“这营生质量不能保障不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单干的时候，也有这问题。那时候，一个是懒，一个是没有技术。耕地、锄地别看这是庄稼话，掌握不了照样不行。特别是年轻人，不好好训练怎么行?”

我问这个老农:“当时单干时候用什么保障?”

老农说:“一个是动口，一个是动手。动口就是要骂要管，动手就是要用镰把打。那些不好好劳动的儿子哪一个没挨过打?

我说:“现在是新社会啦，不能骂，不能打。”

老农说:“不能骂，不能打，就不能保障质量，还要出懒汉。”

我听了这个老农的说法，忽然想到陈永贵的一些看似极端的做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陈永贵的脾气不太好，为营生质量不好常常发脾气，骂人、训人，因此惹了一些人。有时候社员开会，让给干部提意见，一些社员就像放连珠炮似地给陈永贵提一大堆意见，归结起来就是态度不好，好骂人。这个意见我听见了，就到大寨组织社员讨论，陈永贵为什么骂人?经过一番讨论，群众都不约而同地说:

“人家该为的啥?还不是为咱劳动不好，怕社里少打了粮食?人家又不是为自己。”通过讨论教育，人们对陈永贵的一些做法也就理解了。

因为陈永贵要求严，大寨合作化后的农活质量尽管不太好，也还差不多。有些大队因为干部怕惹人，好也不管，劣也不管，年复一年成了习惯，生产质量严重低劣，造成减产。集体化以后的另一个问题是排挤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过去靠“刮金板”生活的富裕中农是干半年，歇半年。集体化后，全靠劳动来生活，就明显出现了劳动力剩余。人们都把工分多少看成是生活好坏的标准，所以家里男劳力多女劳力少的人不愿让女劳力干活，想自己多挣点工分。到地里分配营生的时候，不按体力、不按技术，让妇女和他们干一样的活，挣一样的工分，让妇女干那些力不能及的活，实际是不让她们参加劳动。陈永贵为这也操心不少。一次垒墙时，本来让妇女拾拾草、拿铁锹铲铲蒿，干些轻活就可以，可是男劳力偏让妇女跟她们一样抬石头，留下轻活大家一起干。妇女们大多干不了，只好不干。这就大大影响了妇女劳动的积极性。

陈永贵为此开过多次支部会，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总是解决得不好。后来陈永贵悟出一个道理:如果生产门路扩大，变成人多活多，这问题不就自然解决了吗?于是大寨后来除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活路外，就大搞多种经营，这个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解决了活路问题，可是营生质量问题还是得不到很好解决。陈永贵埋怨营生质量不好，生产队长反而觉得一天起来忙得昏头昏脑。后来，大家觉得定额管理这个办法也有点烦琐，农活合起来有90几种，记起工来好多个百分比，白天搞包工，检查验收闹纠纷，腿跑断,鞋磨烂，营生质量没保障，社员还是有意见。

大寨是这样，全县也是这样，县里经常开会讨论，想方设法改进定额管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拿不出好办法。

1960年，大寨从党支部到社员，开展了一次大讨论，叫“怎么改进劳动管理?”讨论中，大家都觉得制度没有不行，光靠制度也不行。因为制度还是靠人去执行的，如果人的思想不对头，再好的制度也不行。地主富农有地主富农的制度，资本家有资本家的制度，他们的制度都是造成多数人贫困、少数人富裕的制度。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制度。我们的劳动管理也应该体现为集体干活也是为自己干活的思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不能有二心。可是有些人偏偏不这样想，总是想少出力，多挣工分，讨别人的便宜。这个问题不是靠单纯定制度能够完全解决的。

在大讨论中，党支部委员、复员军人贾来恒说:“定额管理这个办法虽然天天兑现，干一件事记一件事的工分，看起来好，其实有很大缺陷。要是解放军在战场上打仗，每刺一个敌人总要问一问连长，我刺一个敌人给我几个工分，那仗还能打吗?可是解放军战士没有定额管理，打起仗来照样非常勇敢。他们的办法是在平时就教育‘当兵为什么?’每一次战斗都有战前动员，战斗一结束开总结评比大会，评哪一个战士立了功，哪一个没有立功。这样就做到了个个有劲，生龙活虎。

这一发言，使到会的人得到了很大启示。

有人说:“我们也像解放军那样就好了。”

有人却反对说:“农民还能和解放军比?”

贾来恒说:“解放军还不是穿军装的工农子弟兵?虽然解放军实行的是供给制，我们实行的是工分制，这是不一样的。但主要是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既然农民当了解放军能够为革命打仗，那么农村也像解放军那样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社员也同样可以为革命种好田。”

大家都说:“对呀!解放军的办法咱们怎么不能学?”

方向明确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出来了。干部社员经过认真总结集体化以来劳动管理的经验，对曾经实行过的“死分活评”和“定额管理”反复进行了对比，最后一致同意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实行一种既简便易行，又公平合理的新的劳动管理制度，他们把这种制度叫“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以便更好地落实党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充分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特点是:它既不像“死分活评”那样每天用很多的时间搞地头评工，也不像“定额管理”那样每天计算定额、包工、验收，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这个阶段就和农事活动的小段安排相结合)才搞一次评分记分。评的时候，先选一个思想好、干劲大、出力多、技术高、干活最重视质量的社员作为标兵，定出标兵出勤一天得多少工分，然后人人对照标兵，自报该得多少工分，经大家评议后，由支委扩大会审查、调整，最后向社员公布。

这种劳动计酬办法主要不是靠计算，而是靠评议。评的时候又不像“死分活评”那样受劳动底分的限制，完全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同标兵对比,这就把评工记分和思想教育工作结合在一起了，评工会就变成了教育会、生活会，成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一种好形式。每评一次工，就是一次群众性的大鉴定、大排队、大评比，生动地体现了党支部大力提倡的为革命种田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很好地执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政策，真正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

由于“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这个制度简便易行，干部的事务工作大大减轻。这样，干部就能够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一下地，这就为加强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创造了条件。反过来说，只有大大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才能保证这种劳动管理制度的认真执行。大寨干部说得好:

“这制度灵，那制度灵，离开政治挂帅，什么制度也不灵。”

因为制度是人订的，又是靠人去执行的，不把制度建立在群众自觉执行的基础上，光靠制度卡人，只能事与愿违。

大寨干部还说:“实行新的劳动管理制度，日常事务的压力减轻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担子就加重了。而且减轻那个压力，正是为了加重这个担子。”

因此，他们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十分注意抓政治思想工作，经常表扬好人好事，反对不良倾向，开展“为革命劳动，还是为工分劳动?”的两种思想斗争，鼓励社员争做标兵活、争当标兵人，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生产和管理的全过程。同时，还通过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从党团员、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逐步培养出一支骨干队伍。依靠这支队伍，在生产劳动中带头实现“三高”，即高质量、高工效、高出勤，带头互学互助，开展群众性的监督。在评工记分时，带头实事求是，自报工分，带头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每个社员都能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

万事开头难。大寨开始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时候，由于党支部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多数人很自觉，但仍有个别人劳动时偷懒，评工时却要多报工分。起初，谁故意多报，大家光是对他开展批评。后来在批评教育的同时，还搞过“二牛对头赛”。

有一次，一个社员自报12分，跟标兵一样多。大家在评议时给他评了9分，他就大发牢骚，说:

“标兵拿镢我拿镢，标兵刨土我刨土，标兵手不停，我也没闲着，为啥我就不能挣个标兵工分?’

大家说:“你跟标兵虽然干一样的活，但是出力大小不一样，质量高低不一样，工分怎能一样?”

这时干部出来说:“标兵越多越好，人人成了标兵更好。他愿意向标兵看齐，我们欢迎。”第二天，就让这个社员同标兵一起劳动，标兵干啥他干啥，标兵咋干他咋干，标兵的工效、质量多高，要求他也做到。没干两天，他就顶不住了，只好向大家检查说:

“论体力和技术，我比人家标兵差得远哩!我多报工分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今后我一定改。’

多报工分的现象消失后,不久又出现了一种少报工分的倾向,有些人故意少报一分半分，让大家往上评，好像这就显得不自私了。为此，党支部又抓了当老实人的教育，使社员逐步养成了实事求是报工分的习惯。

大寨开始推行标兵工分后，我一直很关注。到1960年7月，陈永贵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我就去跟大寨一些社 员交谈，他们也都觉得可以。我又同王殿俊、张老太等劳模商量，看大寨的标兵工分怎么样。

王殿俊说:“这个办法可以。这几年来我在林业队实际上实行的就是这个办法。林业队专管林业，大队定期检查、评比，不过叫法不同。”

张老太则说:“陈永贵这个办法没有什么新创造，我们牧业、林业近几年来就是这个办.法，我们叫它‘大包工，小包工’。比如放羊，一个人放一百羊，一年下来看他放的死了几个，生了几个,羊的膘情如何，然后给他确定报酬。报酬的标准自然是以最好的为标准来评，并没有天天评、月月评。”

我说:“陈永贵的标兵工分虽然不是新创造，但他是在部分林牧副业实行大包工、小包工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到农业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发展。”

张老太这才说:“要说新发展，那也可以。”

张老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劳模，在劳动管理上很有一套，把村里搞得也非常好，因此对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吸收得很少。这次他总算承认了大寨的“标兵工分”是新发展，我觉得张老太有了进步。于是我又对张老太说:

“老太，殿俊经常到大寨去交流经验，你有时间也去看一看，给大寨传授一下林业、牧业的经验，另外也看一看大寨的农业生产。”

张老太说:“我抽时间一定去。”

7月下旬，我又到皋落公社，同皋落、车寺、铺上等几个生产大队商量，能否推行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管理办法，他们一致认为这种办法是在“死分活评”、“定额管理”、“大包工、小包工”的基础上的发展，比“定额管理”先进，不过要推行这个办法，必须有个条件:一是实行“定额管理”好的大队;二是生产大队、生产队有“定额管理”、“大包工、小包工”的经验;三是群众对集体化有信心，感到集体比单干能增产。我觉得大家说得有道理，就建议先选一两个先进生产队进行试验。

从此，大寨的“标兵工分”就在一些先进的生产大队逐步推行开来。

陈永贵在“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办法实行初期，对评工十分留心，每次评工以前，党支部还要在社员中，特别是在骨干中专门进行一次思想动员，以保障自报公议时报得恰当，议得合理。因此大寨的评工会开得非常认真、严肃，谁多半分，谁少半分，都要和标兵、和同等劳力反复比较，毫不马虎。广大社员说:

“即使一个社员工分定得不合理，也是个有关执行政策的大问题。这不光影响他本人的积极性，还会影响别人。”

大寨的评工会还注意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强劳力和弱劳力常常在评工会上互相鼓励。弱劳力对强劳力说:“你们挑重担，贡献大，留下轻活照顾我们,你们的工分应该多记。”强劳力对弱劳力说:“你们体力虽差，干劲大，出的力气也不小，要是光凭几个强劳力能办多少事情?你们的工分也不能少了。”

一个严肃认真， 一个团结友爱，这就使各种劳力的社员都感到心情舒畅，大家都是只怕劳动不如别人，不用担心工分记得不公平。因此，经过1960年劳动管理上的大破大立，人们的劳动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时起，每天上工不吹号，不敲钟，到时间大家自动就干起活来。不论男女老少，能干啥就干啥，需要干啥就干啥，干部操心到的事情有人去干，干部操心不到的事情也有人主动去干，真是“九牛。上坡，个个出力”，比一家人还要齐心。.由于大家“各尽所能”，工分又评得合理，表现在分配上，就是“有差别，不悬殊”，强劳力一天得10分、12分，收入高些:弱劳力一天也能挣个五、六分，也有一定收入。只要有点劳动能力，就能自食其力。什么超支户、拖欠户、分空户都没有了，分配年年全部兑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大寨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看!同是评工记分，“政治挂帅”和“工分挂帅”的结果是多么不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何等显著!

在评工时间上，大寨开始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时候，大体上是十天半月肝一次评工会。后来随着社员觉悟的逐步提高，逐步延续到一个月评一次。（出自《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2.11节，大寨的劳动管理）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即便是所谓的大寨村，一开始也是存在着那种只顾个人，不顾集体的自私自利行为的，合作化本身并没有立刻就使大寨村克服因为懒导致农活质量不好的缺点。而包工到组这种制度就像是工业中的计件制，做多少工，给多少工分，而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就是严重的雇佣思想。给多少工分做多少活，没工分就不做活，很明显这并不是一种主人翁思想，而是一种雇佣思想。在这种思想下，时常会出现一种因为个人利益破坏集体利益的行为。比如干活不讲质量，只求数量，这就和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在工厂一样，为了赚到更多的钱，所以宁愿偷工使产品质量低劣一下。而在农业领域中，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自私自利的人干的农活质量不好但是数量多，所以我记得工分多，而最终的总产量反而因为农活质量不好下降了，这种情况下自私自利的人反而可能因为工分多而赚的更多，那些老实干活的人反而吃亏。也即，自私自利的人反而无偿占有老实人的劳动成果。

第二，大寨村把政治思想工作提到了一个很突出的地位，这和小岗村那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其实就有一个重点，社会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意识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统一。小岗村那里，私字横行，私心横行，不管采取怎样的制度，这些制度都要去反映他们的私心。当然，这其中自然有什么样的制度更有利于反映私心的差异。很明显，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不管是包到作业组，还是包到户，在本质上都是有利于反映这种私心差异的。而在现实中，个人与个人之间难免有利益矛盾，个人与集体之间也难免有利益矛盾，除非彻底分田到个人，不然即使是在一家一户内部，所谓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所以重点其实并不是在于彻底反对平均主义，而是在于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平均主义。

一种办法是打着彻底贯彻个人利益的旗号，当然，他们也会说这是个人，集体，社会利益相一致。无论是农业的生产责任制，还是工业的计件制，都是强调你生产出越多的产品你对社会、对集体越有利。这种说法并不是错的，但这种说法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本身会强化劳动者的私有意识，而强烈的私有意识的存在本身就使得损公利私具有存在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就比如不管是包到组还是包到户，都容易存在一种累死牛的现象。啥意思呢？大量生产资料包下去了，还有些生产资料在集体那，比如牛，那么我为了多占便宜，就拼命让集体的牛去干活，最后把牛给累死。当下我是占便宜了，但是长远来看集体没牛了，我以后也没牛，我的利益最终还是要受到损害。所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当你提出彻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时，个人物质利益反而没办法贯彻。无论是工业的计件制，还是农业的生产责任制，都很容易让劳动者只是沉浸在如何给自身多捞好处的情况中。个人对集体利益漠不关心，这种漠不关心反而也导致个人对集体失去了主人翁的权力，你自己都不是社会的主人了，那你又如何去保障个人的利益？一个有意思的论调就是认为80年代是最好的年代，因为这个年代强调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收入增长很快，甚至工农差距收入都在缩小。但事实却是，在打着贯彻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的旗号下，各个劳动者越发只关心自己如何赚钱，越发不关心集体，不关心社会，由此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的权力则不被剥夺了。你当不了主人，那自然有人会骑到你头上把你当奴隶，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彻底的贯彻个人利益的结果反而是个人的利益没办法保证，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从这种情况中得到好处并成为剥削阶级。

所以，个人利益要通过集体利益来满足不止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必然应该如此的问题，不如此保障不了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历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在于，在研究如何使个人利益通过集体利益来满足时，着眼点都是在制度设计上，而忽略了政治思想工作，这实际上就是毛看社政经的评价。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人的意识改造。从上面小岗村的例子可以看到，当你用“包”的制度去搭配自私自利的意识时，结果就必然是滑向包产到户，乃至于分田到人。或者说，“包”的制度本身就是对当时普遍存在着的自私自利思想的无奈之举，只有通过“包”来去刺激个人为自己劳动的思想，然后才能有足够的产品去满足社会需要。

大寨村的办法则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树立为集体、为社会劳动的思想觉悟，也即首先是改造意识。然而这只是第一步，根本性的还必须改造他们所现存的整个生活。比如大寨的评工，他就和一般的包工制度不一样。一般的包工制度就像现在的工厂一样，工头安排工人干多少活，工人干完后工头来验收，试问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会产生集体主义思想吗？他会自觉去关心所谓集体利益吗？不会，现在的工厂里的管理者也喜欢强调大家要把工厂当一个家看待，强调大家是一个集体，但实际上没人会理会这种说辞。而大寨的评工则相反，每个人能拿多少分，不是由少数人决定的，而是大家共同商议决定的，每个人都是管理者，每个人又都是劳动者，人人都是主人，主人才会自觉关心集体的利益。而在这种制度下，大寨村的生产也没停滞，而是继续发展，而且比一般的集体要强上许多。这就导致一种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集体的利益得到发展，大家彼此之间存在的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关系。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按照大寨这种模式遇到小岗村那些难题该咋处理呢？由于大寨村的人内心主要都是为集体，为社会，为他人劳动的思想。那么即使是出现某些户劳动力少，人口多，按照人七分配反而可以多得的情况，那也并不会说对大家的利益产生什么损害。如果是小孩子多，那么这些小孩子长大后也可以努力多为集体做贡献，你今天让小孩多吃一点多占便宜，人家长大了也可以回报你。如果是老人多，导致多占了一些，那么你以后老了你不也可以多占别人的一些?所以，你在今天吃的亏，反而可以通过未来的某些途径进行补充回来。在现实社会中，劳动者联合劳动时指望所有人都完全不吃亏，能完全绝对地反平均主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有一个为社会，为集体劳动的心，那么总的来说是不会让你一直吃亏的，他会有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你可能短期来讲吃了点亏，但是长期来讲却是有利的。而且人人为公由于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社会发展的最大化，这就使得社会的经济增速要比私有制要快的多，个人在这种社会下反而个人利益可以得到更多的保障。当然，这也只是理论上的，现实中这种高度的公有制社会还没出现。

还可以顺带一提，改开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就提高了，笔者觉得可以简单理解成老人无人供养的结果，原先有集体管，后面没人管了。

反过来讲，如果是在一个全部人都自私自利的社会，那你吃亏为他人服务就是冤大头，因为人人都想占你的便宜，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变得自私自利。但是从我们上述的推论又可以看出，这种人人都自私自利的社会反而没办法保证人人的利益，最终只会有少数人得利。

再比如孩子多导致干活慢的情况，人人为公的办法则是专门划出一些人来照顾小孩，这样效率更高，能省出更多人力，既不用担心地里的活干不完，也不用担心孩子照顾不好，因为人家是具有高度负责的责任心的。如果说因为干部处理公事耽误了生产，在人人为公的情况下，调剂下劳动力就行了。干部处理公事也是为了集体，让人家处理好了对集体也有利，集体那么多人每个人出一点力气就能把落下的活补上。

由此我们反而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状况，包产到户本身反而没办法最大程度的实现每个人的物质利益。还是以小岗村的例子为例，包产到户后，无非是劳动力条件较好的户能把地里的活干完，那些劳动力条件差的户的地里的活还是干不完，这就必然影响到最终的总产量。所以，小岗村一直以来在中国，他的亩产量最好都只是一般，根本没有办法和那些集体生产搞得特别好的单位比。比如79年小岗村亩产量才266斤，在毛时期大寨村都是亩产1000斤以上了。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到这样一个要点:

社会主义应该是意识与制度的统一，既有为公的意识，也有实现个人与集体利益统一的制度。只有一方面没有另一方面是不能达到正确的结果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他人就是为自己，为社会付出越多，社会本身也越在乎你的利益。最终实现全部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利益最大化。

讲完上述过程之后，我们如果系统考察新中国建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史，就明显可以感觉到其中存在着基本生产关系和具体生产关系（也即经济体制）的矛盾。合作化时期农业盛行的就是生产责任制，人民公社时期一开始仍然是责任制，学大寨时期才开始逐渐往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转化，但实际上毛死后这整个进程又被逆转，77年虽然仍然在强调学大寨，但同时强调恢复责任制的文件也已出台。以下为引用:

“我国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包工制到包产制，经过不断地发展演进,最后发展到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条发展道路是十分曲折复杂的。如果加以简单的概括,它的发展和完善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不允许包产到户。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中,十分明确地提出恢复农业.生产责任制,但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不许“包产到户”。到1979年4 .月,中央批转了《农村工作座谈会纪要》,仍然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区别,是一种倒退”。这就是1978 年底到1979年上半年我们党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

第二阶段,包产到户政策开了小口。1979 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的限制仍然十分严格。但不管如何严格,终究在包产前边冠以“可以"二字。包产到户开始开了个小口子。

第三阶段,包产到户的政策有所松动。1980年9 月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发了《关于进-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纪要中指出,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业生产的管理要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灵活性。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还指出:“在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工作中,违背当地群众愿望强行推行一种形式，禁止其它形式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时对包产到户的范围作了具体的政策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更新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个规定中, 允许搞包产到户的范围比1979年规定范围大得多了,小口子变为大口子,政策又有所松动。

第四阶段,积极推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2年,中央经过几年的观察,已经看清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这一年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书记的座谈会,会上指出要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这样一些处在观望、等待的地方,也搞了起来。凡是搞起来的地方,当年都收到了成效。

第五阶段，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全面展开。经过五年多的实践,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已经完全立稳了脚跟。我们在理论上也彻底突破了以往的任何框框。1983年1月,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全.面彻底地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经济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

（出自《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论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兴起过程、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

实际上，农业生产责任制或者说“包”字的恢复并不是78年才开始的，77年就有了，再往上溯其实毛时期也有人偷偷搞。长期以来都有这种思想，认为包产到户就是不好，就是非社会主义的。但是包产到组或包工到组这些生产责任制就是社会主义的，所以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的一种。以下为引用:

“发表了李贻的文章《大田生产不宜于包产到户》。文章讲到一些农民认为“放宽农业政策就要包产到户”，“今年到组，明年到户”。针对这些看法，文章表示，农业劳动，特别是大田生产需要共同利用物质手段,协同劳动。在这方面，集体生产比包产到户要强得多。不能因为有的生产队没有搞好而否定集体生产，搞包产到户。大田包产到户容易成为变相分田单干，成为个体经济，违背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

上述针对包产到户的诘难，主要围绕包产到户的性质，即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分田单干，以及包产到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展开的。它已触及到二十多年来早已定论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而这一问题不解决好，不仅包产到户随时都有可能天折,并且正在蓬勃兴起的农业责任制也难以深化和扩展。”（出自《包产到户沉浮录》，P296）

但实际上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来看，现实存在的基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理想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不一致的，他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这里指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与私有制的对立统一。这样具体的生产关系就必然要反映这种对立统一，也即所谓的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本身就要反映私有关系。但是当时的人的思路还是，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关系，是社会主义关系等于不是私有制关系，不是私有制关系等于不会产生资本主义。比如1981年邓见到傅朝枢时就明确说过:“

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

从我们上述的分析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社会主义责任制本身就可以导向资本主义制度，他在基本的生产关系方面已经实际影响了集体所有制。在这种责任制下，劳动者不是成为统一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然后提供联合劳动给全部生产资料，从而实现集体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是反过来，责任制促进了劳动者的分裂，从大集体分裂成小集体，再从小集体分裂到一家一户以至于最后分到个人。历来对这个问题的注意都是相当不够的，公有制往往只是挂个名头，然后就一堆人认为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是好的，公有制就是非私有制的，公有制就不会导向资本主义。实际上，现实存在的公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关系与私有制关系的对立统一，所以他才会有通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如何考察这种对立统一的一个要点就是从个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出发，个人越是占据全部生产资料，个人越是与他人联合起来进行联合劳动，个人越是越出狭隘的活动范围而参与进广泛的社会生活的管理中来，那么社会主义关系就越是发展。反过来，个人越是只占据少少的生产资料，越是只在狭隘的范围内活动而不去广泛地参与社会管理，越是只注意到自己的个人利益，注意不到社会、集体的利益，那么私有关系就越是发展。这也就是说，如果具体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经济体制）不去尽可能地多地反映社会主义关系，那么他就要尽可能多地反映私有关系了，这就会导向资本主义复辟。那种认为什么什么体制是社会主义的，所以他就是非私有的，所以就没办法导向资本主义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想法没有把实际存在过的社会主义与理想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把前者当成了后者。前者仍然是社会主义与私有制的对立统一，后者才是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个人占据一切生产资料。以下为引用:

“决策层和领导层的动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或多或少地呼应了农村广大基层民众的迫切愿望。“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全国农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缓慢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却基本维持不变，一些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有所下降。于是，政治运动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大致从1978年秋天开始，在安徽、四川等地的一些农村,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三年困难时期曾经尝试过的一些“退回 去"的做法就又陆续“死灰复燃"了。其实那些做法无非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围绕“包"字试验的一些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旨在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恢复和促进农业生产，如“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到1979年底，全国一半以上的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1/4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在包工到组和包产到组的同时，个别的地方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包干到户。

但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分田单干,同私有化和个体经济相联系,因此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多,甚至引发了一场全国大争论。直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著名讲话以后，人们的思想才进一步有所解放,进-步明确了“双包”与集体经济关系的认识。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 专门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中央75号文件，总结了中国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对干部和群众从实际出发的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包工包产联产计酬和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文件认为,凡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 搞一刀切。 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D。这一文件打破了20年来强套在“包产到户”头上的枷锁，极大地鼓舞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会后，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推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的比重由1980年初的28%(实行不联产的包工责任制的比重为55.7%)上升到该年底的51.8%和1981年10月的81.3%(此时不联产的定额包干的比重降至16.5%), 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的比重在1981年10月已经占到50.8%,而在1年前只有15%,1年以后升至80%左右两年以后上升到9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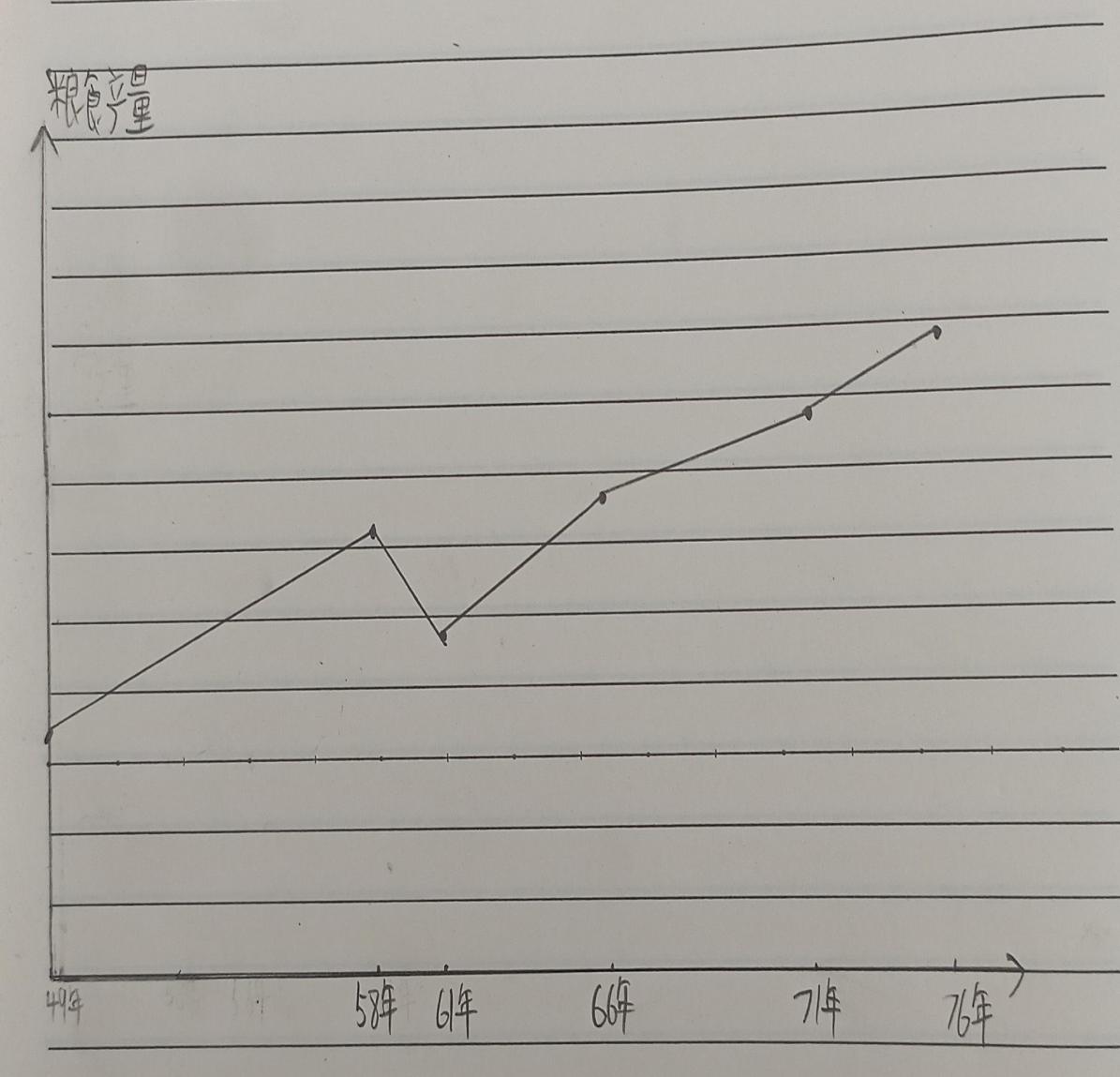
1981年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多变的一年，有些社队开春是小段包工，中途变为联产到组，最后又变为联产到劳到户或大包干。这说明群众经过观察、比较和实践一段后， 积极选择更适合他们的实际情况的责任制形式。也正是从这一年开 始包干到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982 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出自《再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在这里谈一下联产与不联产的区别，联产的意思是，你年末的分配是依据你取得的产量，产量越高你分的越多。不联产的意思就是，年末分配依据的是你的工分，粮食要收上来集中统一分配。这就会导致一些人干活不讲究质量，只顾着多干多赚工分，由此可见在私有意志支配下，从不联产走向联产也是必然的。而把上面的数据一看，79年时生产经营责任制都占比80%左右了。

顺带一提，文革十年期间粮食产量每年平均增长3%，1976年到1986年每年粮食产量平均增长3.16%，其实没啥差异，但是前者就是缓慢增长，后者就是快速恢复。原因之一就在于所谓的数据游戏，笔者批判过北马喜欢玩数据游戏，其实忒涩也一样。原因之一就在于数据游戏真的好玩，因为不管是农业还是经济领域，毛时期的特点就是大起大落，也就是说不同时间段起伏很大，这就是那位先生批判我玩数据游戏的原因，可能那位先生觉得笔者是刻意选取对毛时期不利的数据吧。玩数据游戏的要点在于:

起始点、结束点的选择，如果你要抬高数据，那你就把起始点的数值往低了选，结束点往高了选。如果你要压低数据，你就把起始点往高了选，结束点往低了选。因为计算公式很简单，无非是结束点的经济数据除以起始点的数据，然后开相应的n次方。起始点高，开n次方的值就低，起始点低，开n次方的值就高。

比如中国粮食产量，1966年的数据是21400万吨，1976年的数据是28630万吨，28630/21400=1.3378504673，1.337开十次方根约等于1.03，所以1966-1976年平均每年粮食产量增长3%。



简单画了个图，以这个图为例，这里面的低点是49年、61年，

如果想证明毛时期粮食增速快的话，就以低点作为起始点，高点作为结束点，比如49-58年是个快速增长，49到66或者49到76年都给人一种快速的感觉。如果你想证明毛时期粮食增速慢，那就选高点作为起始点，比如选58作为起始点。如果选高点作为起始点，低点作为结束点，比如58-61，那直接就可以算出负的增长速度。如果高点起始，高点结束，比如58-66，58-76，都可以明显感觉到增速不那么快。这就是所谓的数据游戏，也即通过选取符合自己需要的数据来论证自己想要的结论。我先确立毛时期是高速还是低速这一论点，然后我再去截取某一个时间段来论证我的观点。

那么如何避免数据游戏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选取数据的范围，也即尽量考察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这样短时间的高速、低速的影响会被尽量削弱，从而比较客观的还原出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讲，起始点选49，结尾选78年是很合适的，29年的范围是个较长历史时期，可以很好反映出毛时期的经济增长情况。但是，在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同历史时间段所采取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1949到1956年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阶段还不算一般的反对私有制，私有制仍然有许多的发展。然后1956到1966年，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基本生产关系方面还是社会主义关系与私有制的对立统一，具体的生产关系也即经济体制方面也反映出这种对立统一。进入文化大革命，开始斗私批修，其实反映在经济基础领域最根本性的变化就在于基本的生产关系和具体的生产关系开始了根本性的调整，也即希望基本的生产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关系，限制私有制关系，经济体制本身的调整也是往这个方向来的。76年以后，形势几乎是瞬间逆转，基本生产关系，经济体制本身反而是往发展私有制关系的方向转变。要知道，经济生产不止是一个单纯的产品数量叠加的过程，他也是一个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毫无疑问，按照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来，不管你是包到生产队，还是生产组，不管你自诩这是多么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只要你一包，经济一发展，你实际上是再生产了一堆私有制关系。按照一些农民的讲法，包到队不如包到组，包到组不如包到户。也就是说，当你的具体经济体制本身更多地倾向于表现私有制关系时，你的经济越是增长，生产越是发展，你越是会对基本的生产关系里面的社会主义关系进行强烈的否定。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把49到56年算进来就有问题了，因为49年到56年的基本逻辑还是允许私有制发展，承认发展私有制是有利的。49到56年粮食平均年增长7.8%，而56到76年粮食平均年增长2%。忒涩的一贯论述就是，毛的思想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正确的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很多错误，正是基于这个基本精神，忒涩宣称自己继承了毛的思想，改开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也即允许私有制发展。所以，当你把49到56年算入毛时期，然后用毛时期对比改开后证明改开不行，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49到76年的高速依赖于49到56年的高速，人家就可以说，毛时期之所以总体速度高就是因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搞得好，社会主义时期搞得不好，我们正是继承了毛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搞得改革开放。

再比如61-66年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叫调整时期，大跃进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叫做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可以理解成这次运动指望推进基本的生产关系和具体的生产关系向理想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更进一步。那时候毛就注意到了现实中个人的不平等关系了，而个人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个人对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关系。但是如此空前巨大的实践运动，进行又过急，人的认识难免跟不上，由此产生了巨大多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讲，一些新式的社会主义关系确实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比如大寨村。如果你纯看国家的整体经济数据，能看出这种新式的社会主义关系的诞生吗？看不出来的。而在接下来的调整时期，在文革时也被批判为黑线回潮，一堆人提出要砍红旗，甚至到大寨村那里去砍红旗，这实际上就是表明现实的实际存在的基本生产关系和具体的生产关系在向后退，但是61年到66年却是经济增速相对较快的时期。那这种经济增速快能反映出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关系遭到打压这个特点吗？也不能。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现象好似是难以理解的，好像社会主义关系一发展，国家经济就下降，私有关系一发展，国家经济就上升。其实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现实是复杂的，理解现实也要用复杂的思维，而不能用简单的思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北马的《共和国的历程》，还是今天的一些左派都习惯性的将问题简单化。就比如北马的《共和国的历程》说明毛时期经济发展很快，那从微观层面来看如何呢？也即全国那么多的经济单位，他们的发展是快还是慢？很明显，北马的写法给人一种，毛时期经济增速快，所以毛时期的一切经济单位发展都快的感觉。这实际上就等于没有分析毛时期经济发展的情况，更别提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了。我们都知道，辩证唯物主义有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论，所谓分析就是把一个事物分解成各个因素，然后对各个因素的作用、属性、特点加以研究，所谓的综合就是用分析出来的事物的各个因素的总和来再现事物，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更深刻的认知。

而对经济单位的分析一般来讲都可以分为三类:好、一般、坏。在这里笔者主要是分析社会主义时期（也即1956到1976年），因为要解释说明的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增速的问题。

首先谈好的经济单位为啥发展的快，就比如大寨村吧，他们为啥粮食增产的快呢？在笔者看来因素有很多，但归根到底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中最主要是干部。很明显，回顾大寨村的发展，他们那里也不是说就一堆人天生是圣人，天生就一心为公，不是的。相反，大寨村和广大农村一样，许多村民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他们是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呢？陈永贵在这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这个干部思想好，相信革命，相信党，相信毛，愿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他在种田方面确实有一套，同时他懂一些辩证法思想，善于在碰到新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这就使得大寨村那里比较顺利地经过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阶段，以至于最后步入人民公社。在这整个过程中，陈永贵不仅在各个阶段兼顾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而且在生产上也有很多新办法，这就使得集体生产不断增长，个人利益也得到满足。在碰到个人为自己的私利劳动与为集体劳动的劳动时，陈永贵很好地发动群众讨论出了新的办法，并且很好地执行了政治思想工作，有效地改造了群众的意识，并且搞出了一系列利于社会主义关系扩大的制度。由此这类先进单位，不仅经济总量在各种经济单位中是最高的，而且增速也是极高，几乎不曾停滞。

那我们再看看落后的单位，比如小岗村吧。这个单位的干部的水平就很差。合作化的时候玩熬鹰，牵牛，割庄稼强迫村民入社。给耕牛估价时把价格定的特别低，损害农民利益，逼得村民宰杀耕牛破坏生产力。进入人民公社后没搞出啥生产的新办法，新套套，同时又没办法解决平均主义问题，小岗村村民本就高度自私自利，往往只有为自己劳动的积极性，这样自然更不肯干。到了学大寨时期，工作组的人来也主要是斗群众，强调不能去市场交易，没收自留地，对于群众的疾苦则不关心，更别提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这种情况下小岗村村民反而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越发抵触。其实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下为引用:

“1967 年，我回到昔阳，到大寨时，陈永贵给我谈到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时说:

“经过几年的实践，干部经验越来越多，社员觉悟越来越高，开始是十天一评，现在是一季一评，咱县其他大队也实行这个办法，效果也都好。可是有些人偏不赞成，说什么这是为为图省事，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污蔑这个办法是‘神仙一把抓’，有的还说，‘什么大寨工，是大概工。’

我说:“老陈呀!这并不怪。因为人们的经验不同，各地的情况不同，执行起来有的地方好，有的不好。我到文水就没有执行这个办法，因为那里的基础太差。但是，大寨的办法我是赞成的，到目前为止，大寨的劳动管理我认为是最先进的。

1974年，我到寿阳工作，发现那里的劳动管理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和文水大体上差不多，干部不参加劳动，社员埋怨情绪很大，粮食产量不是提高，而是倒退。群众说什么“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为此，我在县委会上提出:

“学大寨要学精神，不能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现在寿阳学大寨要实行‘三不’:一 不搞大队核算;二不搞大寨工分;三不取消自留地。”

大家听了一致赞成。可是有人把我在寿阳的这些做法汇报给已经当了副总理的陈永贵,说张怀英到了寿阳后提出不学大寨。不久,我把实际情况给陈永贵作了说明。陈永贵听了说:“你既了解大寨、昔阳，也了解寿阳，从实际出发，这有什么错?’

因为在寿阳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较得当,寿阳学大寨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县的粮食产量就从9千多万斤提高到两亿五千万斤，翻了一番多。陈永贵对此非常满意，说:

“学大寨就是要学精神，学大寨具体管理办法不能死搬硬套。”

1975年，我到运城任地委书记，发现那里的劳动管理大部分实行了“大包工、小包工”，比如棉花多数实行大包工，实际是死分不评，所以有些生产队的劳动积极性不高。那里流行一句顺口溜:“在家等敲钟，村外等集中，到地等分工，干活是一窝蜂，好坏分不清。”一些社员还埋怨说:“这就是学大寨标兵工分的结果。”我问一些干部、社员，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不仅社员答不上来，干部对此也是茫然无知，这怎么能把社员没有劳动积极性的原因归结到推广大寨经验身上呢?

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上，我汇报了这个情况。省里的一些同志一直认为， 在全省一些地方学大寨学坏了，什么“大寨分，大概分”等等，其实这些地方对什么是大寨工分根本不知道，这怎么能够学好?又怎么能不出问题?

在1967年我和陈永贵的谈话中,我曾经说:“在办高级社时,你说要‘理顺麻团搓成绳’。从多年的经验来看，经营管理的要害是劳动管理，只有劳动管理搞得好，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你多年来在劳动管理上大做文章，从‘死分活评’、‘定额管理’，上升到‘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这真正是‘理顺了麻团搓成了绳’。（出自《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2.11节，大寨的劳动管理）

”

说白了，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有问题，而是你走的路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个人占据一切生产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那么强迫农民入社的时候，农民是主人吗？不是。做好群众政治思想工作，关心群众物质生活利益，促进生产发展，使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发展的过程中满足，小岗村学大寨时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的吗？也不是。这就好像一堆人看了点马列毛的书，然后自称马列主义者或马列毛主义者，然后这些人按照自己对马列毛的理解干了些蠢事，那能证明这些蠢事的诞生怪马列毛的理论吗？又或者说，一些人把马克思，列宁，毛的理论当教条无条件执行，然后吃了亏，这就怪马列毛的理论有根本性问题吗？马列毛都强调过不要搞教条主义，你自己非要教条主义，那是你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再比如给了个原始人一把步枪，他把步枪当棍子用，觉得不如棍子好使，这是步枪的问题吗？这是人的问题。所以从根子上来讲，落后单位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社会主义道路有问题，而是他们走的恰好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两个问题很容易混在一起，比如学大寨是学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学大寨了，所以我学着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我学大寨失败了，等于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也就是说，“我”学着并实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实际上作为样板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两回事。“我”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我”学的样板有问题，而是在于“我”刚好没按照样板的要求来。

而在好坏中间夹杂着的就是一般了，这些一般的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学社会主义道路比坏单位好，具有一定优越性，所以生产还能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学的又不如先进单位，一些消极性没能克服。这就导致说他们的总量不是特别高，增速不是特别快。

那么好，一般，坏各占据的比例如何呢？笔者是没办法讲清楚这个问题的，因为具体的经济单位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笔者只能根据自己看到的一些材料给出一些大概的认识。就比如韩丁认为，好的人民公社占百分之30，一般的占百分之40，差的也是百分之30。我们就以这个认识作为基准，整个国民经济笔者估计差不多也是按照这个比重分配的，以下为引用: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如此持续的歪曲大寨的真实情况呢?

邓和他的一帮用“实事求是”的口号维护自己的权力。!然而当实际情况与他们所推行的政策相抵触时，事实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今的政策需要干部来挑战毛时代的典型;然而更好的是抛弃它。报告应当表明“责任制”比集体制更有效率,不仅是在那些明显停滞的四川或者安徽的小村，更应当首先包括位处山西丘陵地带的毛时代的典型公社。

诋毁大寨的故事到了这步田地就跟“实事求是”毫不搭边了。大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挂帅”“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先公后私”作为原则的典范。大寨的成功，并不是如改革者们现在所宣称那样，是由于国家补贴和军队的人力支持，它归功于大寨人民的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和合作精神，归功于陈永贵的天才。如果合作化运动在中国普遍取得大寨那样的成功，整个农村改革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在70年代，中国30%的村庄治着大寨的模式，发展的很好;另外中间的40%，显示出很大的潜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最下的30%, 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采用大寨模式，陷于停滞之中，这部分农村确实很穷。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后30%农村的回答。这些地方实施责任制以后，很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于是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不管中间的40%和发展最快的30%的农村居民怎么想，强迫他们必须走同一条路。 为了替私有化的不可逆转扫清障碍，改革者发现他们必须毫不含糊的抹黑、诋毁、破坏所有代表正确方向、发展良好的农村样板，或是干脆不提它们，把这些样板打入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冷宫，使其影响完全消失。后面这种封杀的方法对那些不是很有名的公社是适用的，但对像大寨、张庄这样的公社则不起作用。这样，在改革的实践和“实事求是”的口号上产生了不寻常的矛盾,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 一批集体经济可以很繁荣兴旺的、健康的发展起来。真理，这个在中国早期剧变中频繁提起的词语，成为了改革的第一个牺牲品。”（出自《大逆转》，P57）

联系起来就明白了，毛时期的主线在于推进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但是只有部分单位做得很好，这属于发展最快的一批。而大量单位做的一般，这属于发展速度一般的一批。还有少部分做的很坏，几乎是不发展乃至倒退。三种因素反映到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速度中来，必然是最好的单位的高增速被大量一般的单位和坏单位拉低。而之所以在像调整时期那种私有关系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关系被打压时，经济增速反而快。就是因为私有关系虽然落后，但他同时比较简单易行，一般的和坏单位使用后都能快速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先进单位虽然受到打击，但又不像是76年以后那么严重，所以还能维持一定的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单位没有被很严重地拉低，坏的单位反而有一定增长，反映在经济数据上自然好看许多。

在这里还可以顺带提一下，有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认为新事物绝对好，旧事物绝对坏，其实这种认识只是对了一半，但不完善。我们从历史来看的话，任何新事物诞生之初都是具有很多限制性条件的，而旧事物反而简便易行。比如火枪这类武器诞生之初，就有容易炸膛，火药堆在一起容易爆炸，阴雨天火药受潮无法使用，火枪精度不高，火枪射速太慢等等一系列问题。用上帝视角来看，火枪不是比弓箭先进的多？但是火枪诞生后却并不是立刻取代弓箭，虽然火枪本质上是先进的，但是作为刚诞生的新事物，他自身也有许多难以立刻克服的缺点。由此在历史上，虽然火枪本质上先进，但是弓箭在很长一个时间段还是大家的首选，因为弓箭这个武器使用时间很长，相对来说问题没那么多，方便好用。但是这种情况只是一时的，随着火枪性能的不断发展，弓箭也被一步步地挤出战场，到了今天可能也只是在消音作战时可能使用。所谓的大寨制度和包产到户的差异，也和火枪与弓箭的关系类似，虽然大寨制度相比包产到户先进的多，但是实施起来对各种条件的要求也高。需要高水平干部，需要对搞生产有一些方法策略，需要很好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大家普遍具备为社会服务的意识，需要有比较好的制度搭配。一旦不具备这些条件，强行推广大寨制，只会得到一种扭曲的结果。包产到户就简单了，各家单干有啥困难的？要不要干部我看都无所谓，在今天的农村都可以感觉到干部基本上没存在感。（当然，损害村民利益时他可能就出来了）说白了，包产到户这种制度由于极度落后，反而因此简便易行。这就像出门开车一样，开车要有油，要注意路况，要考虑路上是否堵车。出门靠腿呢?啥问题都不用考虑了，直接走就行，要啥油?路上堵车能堵住我这个行人?厉害点的还可以跋山涉水，地形复杂也拦不住。所以有趣的事也就在这里了，先进事物本身也是优点与缺点的对立统一，他的优点自然是主要的。不然的话火枪就不会取代弓箭，汽车就不会这么流行了。但是同时，先进事物自身往往对各种条件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先进事物本身的优点反而发挥不出来，甚至产生反效果。反过来，落后事物也是优点与缺点的对立统一，人走路很慢这是缺点，但是人走路方便，可以不考虑地形、路况，所以在今天即使汽车十分的流行，但是步行却依然没有被消灭。

再类比一下，在今天自然最先进的组织办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一个小组织最好能同时进行理论工作，实践工作，并将两者结合起来，由此不断推动理论、实践向前发展。理论上这自然是最好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想达到这点相当困难，许多人有自己现实实际的困难，他们往往低强度的活动本身已经是实属不易，现在还要继续加强他们的活动强度。他们自身也有许多问题没法解决。很可能强行结成一个组织后，急急忙忙往前闯。结果实践没进展，理论没突破，大家的积极性饱受打击，现实的困难又没办法处理，最终大多数人都选择消极离去。说白了就是，先进事物自然是大家都想达到的目标，但是先进事物本身要求的条件也会更高，不具备条件强行过渡，只会迎来最糟的结果。反过来，落后事物虽然有诸多缺点、不足，但是却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最好的办法是谨慎评估现有的条件如何，看看现有的条件是否适合向先进事物过渡，如果不具备就应该看看缺乏哪些条件，然后逐步去创造这些条件，不断地提升自己，这样就既稳妥又不保守了。

上面的论述综合一下，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了。在社会主义毛时期（56-76年），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路线，一种路线倾向于发展社会主义关系，一种路线倾向于发展私有关系。这两种路线各自都产生了复杂的效果，推进社会主义的路线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最先进的经济单位，这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一面，但同时，许多一般的单位存在许多问题，许多落后的单位扭曲了社会主义路线，这就使得大量的经济单位增速一般乃至停滞，从而拉低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倾向于发展私有关系的路线虽然能在短时间内使的极其落后的单位的经济快速增长，并且同时不那么严重地压低先进单位的发展，所以总体上会给人一种快一点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私有关系越是发展，本身就越是要压制先进单位的发展，而且私有关系本身的发展上限也不高，所以这种快一点的感觉几乎是很快就要消失。

就比如包产到户，从76年开始的主线就是加强农业集体经济单位中的私有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一开始是落后单位逐渐开始实施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各种经营形式。而同时还有少数的先进单位依然坚持过去的搞法，就比如大寨村83年时才被强制命令搞包产到户。所以76年到83年这个时间段，落后单位开始提速，先进单位还没被压制，再加上粮食加价刺激农民多产粮，这段时间粮食增速要快一些。但是先进单位一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很快迎来断崖式下跌，这反映在国民经济上就是粮食产量85年大减产，然后粮食产量大概徘徊了4、5年左右才超过了84年。也就是说前脚强制包产到户到先进单位，后脚就过了大概1年多，粮食产量就爆跌了，85年大减产幅度很厉害的，降幅达到百分之7。其实这个问题，哪怕是吹包产到户的书也不自觉地展现出来了，以下为引用:

“怕高产稳不住。一些发达地区的农业产量相对较高，农业基础较好,所需农业投入较大，如果采用包产到户等分户经营方式，可能造成农业投入减少，损害原有的农业基础，从而出现减产。三怕征购任务完不成。边远山区、困难地区和“三靠地区”,不仅很少为国家提供多余粮食，反而要国家和其他地方予以支持和补助。实行包产到户，这些地方可以解决粮食自给问题，甚至上交征购粮，于国家、地方和农民都有利。而在发达地区，征购任务长期较大，通过社队统一管理体制可以较好地完成征购任务。如果把土地包给农户经营，一则不能保证高产，二则农户不愿将多余粮食卖给国家，有可能出现征购任务完不成的情况。受这“三怕”心理的支配，不少发达地区的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不象落后地区那样有紧迫感反而持消极观望和等待态度。所以，直到1981年,发达地区采用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很少。”

（出自《包产到户沉浮录》，P337）

这里就把谜底解开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毛时期，之所以能实现人口的高速增长，那肯定是因为粮食增速足够，不然的话哪养活的了那么多人呢？那既然人民公社体制很糟糕，搞不好农业，那这么多的人靠谁养活的?小岗村吗？答案还是人民公社，不过是先进的人民公社，或者说真正的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艰难地从400斤爬升到600斤，而600斤实际上差不多已经是国际上的温饱水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人口增速也特别快，差不多是2%（56到76年），粮食增速要跑赢人口增速，才能实现人均粮食占有量不断上升。印度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出现下降不是因为粮食增长的慢，而是因为跑不赢人口增速。而改开后（76年到2022年），人口增速才百分之0.9，压力直接小了1.1个百分点。即便是按照同样的时间跨度算（76年到96年），人口增速也只有1.35%。人均粮食产量已经到了600斤，人口增速又低很多，从勉强温饱到比较不错也就临门一脚的事了。而让中国人民温饱的关键无疑在于人均400斤到人均600斤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主要依靠的是先进的人民公社，也就是说，是真正的人民公社承担了让中国人民走向温饱的任务。像小岗村那种地区，说难听点就是不拖后腿就好，他能给多少征购粮?

比如79年，小岗村吹的是粮食产量13万斤，征购任务是2800斤，实际完成的征购任务是25000斤，按小岗村20户人口来算，平均每户完成1250斤的征购任务。而大寨村，1963年，完成粮食征购任务24万斤，征购任务直接比小岗村总产量还高。平均每户完成征购任务3000斤，直接一户顶小岗村全村的征购任务。实际上大寨村每户完成的征购任务也是小岗村的2.4倍，还要注意，这彼此之间还有16年的差距。大寨村后面的亩产还在提升，到79年时，大寨村每户完成的征购任务达到同期小岗村的4、5倍估计也不奇怪。实际上，笔者去翻写小岗村的书，小岗村里的人也是讲，包产到户后一夜过了温饱线，然后二十年不进富裕门，那进了富裕门的都是原先的先进集体经济单位。很多人就好像觉得看点黑材料，里面的认识就全是错误的，假的，乱编的。但是笔者把里面的一些观点整理出来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虽然有些论调隐藏的很隐秘，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推论出事实。比如社会主义时期人均粮食产量的增长依赖于先进集体经济，包产到户其实没那么神，并不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这就说明包产到户即使是针对落后地区，他也不是说只有积极作用，没有消极作用，从小岗村的反“平均主义”就可以看出来，包产到户本身也不能解决一些劳动条件差的家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包产到户本身就有着促进与抑制生产发展两种作用，而且他并不是说只是抑制先进的集体单位发展，就算是落后单位他也一样抑制。所以现实的情况是，包产到户后的落后单位最多解决下温饱问题，然后就陷入长期的发展停滞局面。

当然，在此还顺便补充一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增速还有一些不利因素。首先是像三线建设这种工程，这样的工程位于我国的内地，属于自然环境相对险恶的点。给这种地方投资的一个特点就是低经济效益，也即成本太高，会影响各方面，最后导致经济数据不太好看。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改开后就是主要把资金投往沿海地区，因为这样效益高，结果就是沿海地区大发展，这反而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均衡，并且只有少数人受益，同时如今这种不均衡也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同时呢还有一个认识问题，我们人如果去做某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一开始多半是要失败的，没有经验嘛！只有反复失败取得经验教训后，才逐渐明白该怎么做。我国进行社会主义也是经历了这种情况，发现原先照着苏联学不是很好，要探索走自己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急了点，又没有经验可供学习，自然难免出现一些差错，反映在国民经济上也会一定程度上拉低数据。但是，今天的犯错，却给未来少犯错创造条件，这样未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反而可以得益于这部分失误的经验教训，由此变负面因素为积极因素，这部分反映在国民经济中无疑会抬高数据。

上次那位先生批评了笔者的一些观点，笔者对此受益良多，上述笔者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吸取了那位先生批评的结果。实际上，像那位先生那样仔细做研究的人在今天貌似并不多，大多数人往往是给笔者扣几顶帽子，然后很难拿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比如有人认为笔者吹包产到户，认为笔者反对人民公社，然后就丢出一个什么小岗村包产到户按手印做假的文章来反对笔者。那从上述整个论述都可以看出，这个按手印做假跟笔者的观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都能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当论据。然后这样的人只需要把笔者的某些观点抽出来打上某些印记，比如什么笔者支持邓，支持改开，支持包产到户，反对人民公社，然后到各个地方宣传一番，然后就有一堆人跟着走。这也是今天左派内部的一种情况，笔者要在这里声明一下，笔者在这里说这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指责谁或者怪罪谁，因为笔者发现在交流过程中，如果语气、态度本身具有怪罪的意思，那对方就很容易把你当敌人看待，一旦对方把你当敌人看，那你的观点不管是对是错对面都很难接受。所以笔者在这里要做个自我批评，前面的一些文章语气激烈，态度不好，由此激起许多人的义愤，这是完全正当的，笔者在以后也会避免诸如怪罪人、扣帽子等行为。当然，有时候为了描述某些派别观点笔者还是会说啥派如何如何，不过同样不会说语气激烈。当然，语气不激烈不等于说笔者就不批判笔者认为错误的观点了，只是说笔者在批判错误观点时，会更侧重分析错误观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点在今天刚好不为人所重视，大量的人喜欢的方式还是喜欢简单指责你的观点属于xx，然后xx是错的，所以你犯了严重错误啥的。而从我们今天的分析可以得知，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包产到户问题，实际上背后所反映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简单的解释实际上不能讲明问题是什么，也就难以真正克服错误的观点。

那问题再回到为什么别人认为笔者支持包产到户上来，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笔者文章的写法问题，因为笔者的观点是和许多左派一直以来认为的观点有冲突的，他们认为包产到户没有任何促进增产的作用，笔者则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增产作用的，但是在本质上是落后的，就像笔者对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对比那样。但是笔者在文章中往往只写了包产到户促进增产的一面，对于其抑制增产的主要方面反而论述不足，这就自然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笔者支持包产到户的印象。因此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就更多地把笔墨着眼在批判包产到户上，就是为了让笔者的观点尽量全面，客观，而不至于说让大家产生误解。

另一方面则是人的认识习惯问题，人在认识事物时总是以自己已有的认识作为认识框架的。我国历史上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一开始的观点是认为包产到户只有落后性，认为是阶级敌人鼓动的。接着忒涩反过来吹包产到户，再后来包产到户神话破产，对忒涩论调的反击就更接近一开始的观点了。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一种对立，凡是支持包产到户的都是敌人，凡是否定包产到户的就是自己人。忒涩一般宣传包产到户的伟大意义时，给予的腔调是全面肯定，所以相对的否定包产到户的人给予的腔调自然是全面否定。那么很明显，你跟一个全面否定包产到户的人讲那一点点积极作用，即使你的说法很完整，对面恐怕也难以接受。如果是那种不咋愿意进行理论学习或者没时间进行理论学习的人，你跟他讲了这些观点，他往往也不会去求证，而是会选择继续保持现有观点。如果是那种进行了大量研究的人，那可能会更糟，因为人家可以轻易拿出一大堆证明集体经济比包产到户优越的材料。所以，当笔者只是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增产这一论断时，笔者就已经有很大可能性被打成支持包产到户的分子，因为只有支持包产到户的人才会给包产到户的人说好话，反对的人是不会说一句好话的。

这里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以论叙史的习惯，也即先确定一个论调，然后按照这个论调来叙述历史。比如我设定一个包产到户绝对坏，集体经济绝对好的论调。接下来我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堆叠包产到户导致严重后果的例子，不断地堆叠坚持下来的集体经济发展很好的例子。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压倒包产到户，从而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事实上，忒涩正是用了这个手法，疯狂地鼓吹包产到户，否定集体经济，从而为在全国范围内解体人民公社打下了舆论基础，更是为以后的持续性私有化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这种以论叙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现实的斗争的，为了使现实的实践活动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这种人民公社绝对好，包产到户绝对坏的论调是没有问题的，是对于发展集体经济有利的。严格来说，这种以论叙史的方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他正确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强调人们应该不断地抛弃旧事物，不断地迈向新事物。但他的消极性在哪呢？

就比如，我们只承认先进事物的积极性，不承认他本身对各种条件要求也高，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过渡容易起反效果。那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集体化在落后地区的推进，就比如小岗村，那里明明缺乏集体化是基础，结果硬是强逼人家搞集体化，而集体化后生产生活又没改善，这就引起了人家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人的认识特点又是，对于现实发生的事反应强烈，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则反应平淡，这就导致一种集体化并不好的认识给他们打上了思想烙印。也即，主观目的是为了推进集体化，客观结果却拖延了集体化。反过来讲，当我们不承认包产到户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促进作用时，我们也很容易对包产到户产生一种简单性认识。比如说既然包产到户绝对不好，那么想搞包产到户的人就一定是阶级敌人，对付阶级敌人那就要采取批斗，打倒等形式。那么这种做法也在小岗村那体现过，结果呢？包产到户被打倒了吗？没有，小岗村村民反而对集体化更加深恶痛绝，反而更想要单干。反过来讲，当我们承认包产到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增产，那我们就必然要去探寻这种增产的原因，增产的效果如何。就像笔者在上面所做的那样。经过和集体先进单位反复对比，发现包产到户的优点在于简便易行，对于干部、群众没什么要求，反过来。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干部具备政治思想工作能力，需要干部去关心爱护群众，需要干部懂得生产，需要干部比较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有太多私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集体化的规模，逐步改造群众的意识，逐步发展生产，这样就使得落后地区可能可以向先进地区转化。

所以在这里就有个重点在于干部的培养训练，那就不要像原先那样搞什么工作组，从上面选一堆干部搞几天理论学习就派下去，结果乱搞一通。就比如可以先从落后地区选一些人出来当做干部，把他们送去先进地区去学习，就不要搞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直接让这些人去那参与劳动，去先进地区生活，直接亲身感受先进地区是怎么办的。而不至于说，学大寨，结果对于啥是标兵工分都茫然无知。说白了，亲身体会就是最好的学习。这样，理论学习就和实际结合在一起了，等到学完后，还可以专门选择先进地区的一些合适的人，将他们培养成干部。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如何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系列过程，对于中间的各种矛盾也有应对经验。这样的话，先进地区派人去落后地区，落后地区的人亲身体验到了先进地区的先进制度。两者一结合，就能有效地扭转那种学习先进单位中实际上对于先进单位的制度到底是什么茫然无知的情况。然后同时再做一些其他措施，比如一开始不要急于过渡到高级规模的集体经济单位，可以先从低级的开始过渡，哪怕是从最基础的单干过渡到互助组也行。因为低级的东西虽然落后，但是他也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我从单干一步过渡到人民公社有困难，那我从单干过渡到互助组的困难就不大了吧？这样就更容易成功，而一成功给人的现实印象就是集体化好。那大家就都想集体化，这样每次前进一小步，每次前进一小步都是胜利，小胜利逐渐积攒成大胜利。虽然这样干可能花费的时间，但却是真正意义上挖掉了单干的根子。其他的还可以增加一些附属措施，比如单干可以使落后地区达到温饱提供一定的征购粮，这样先进地区每年就不用支援落后地区很多粮食，省下的粮食可以专门用来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比如办集体产业，或者说提供一种保险作用，因为低级公有制往高级公有制过渡时，有时候容易利益受损，这样大家就束手束脚的。有这种保险作用就可以补偿这部分损失，使大家敢闯敢拼。同时强调科学种田，根据当地的情况设计农业计划使得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等，而只有粮食产量增长，才能坚定大家走集体化的信心。毫无疑问，笔者上面提的办法都非常的理想化，没有考虑到现实实施这些办法的限制，但按照上述谈的基本思想来解决单干问题笔者则认为是正确的，这比那种谁搞包产到户谁就是阶级敌人然后就去批斗打倒的方法要好。因为前者是去挖掉单干的根子，后者则是形式上激烈，但基本不触及包产到户产生的根源，结果是想要单干的想法还要不断产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承认我们所要反对的事物也具有优点时，我们实际上也进入了如何消灭这种优点的领域，等到我们所要反对的事物的优点消失时，也就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事物真正灭亡的时刻。

再举个历史上的例子，比如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就习惯性地抬高我方力量，贬低白军的力量，以下为引用:

“从上述这些事实看来，可见中国红军在反对蒋介石空前的大“围剿”底一年斗争过程中，除中央苏区有部份领土损失外,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是在保存、 巩固和发展红军实力方面。最大的甚至空前未有过的胜利是属于川陕苏区方面的红四军团。从中国革命全部斗争底政治观点看,从军事和军事战略底优越观点看，在红军及苏区更加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条件之下，川陕苏区将逐渐走上为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胜利底第一等地位上去。

同志们!以上这些就是我要讲的一切具体事实，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具体事实来估计中国现时的一般政治形势。根据这些具体事实,我们不能不作出结论说,现时中国一般政治形势是苏维埃革命力量向前增长的形势，这个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利于红军战胜蒋介石的。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近前途，与红军冲破六次“围剿"所得到的胜利底范围和程度有极大的关系。如果红军在冲破六次“围剿”胜利中,未能给蒋介石以真正致命的打击,那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帮助之下，有可能经过很短准备期间很快地再来一个新的军事“围剿"。而如果红军在冲破六次“围剿”胜利中,给蒋介石以严重的和致命的打击,使蒋介石永远地或至.少很久时期内不能翻转身来、再去组织新的大规模的对红军底“围剿”,那么，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或者要冒险地来实行自已直接的公开的武装干涉，以反对中国人民。

”（出自《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王明）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王明对战胜蒋介石的五次反围剿表现的十分乐观，结尾考虑的只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小胜，另一种是大胜。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自己的力量的夸大，对敌人力量的贬低。而实际上王明也不是说绝对肯定自己的力量，绝对贬低敌人的力量，他也估计到困难。但是，他的总体判断依然和实际情况有偏差，而就这一点偏差就要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的代价。以下为引用:

“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 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 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4]，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一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 “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6]。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 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 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 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出自《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毛泽东）

实际上毛的意见就是针对王明那一类人说的，毛在开头就强调，不管客观情况是对我们有利也好，不利也好，我们都要去正确地反映他，正确地反映他了才能指导我们进行正确的实践，从而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接着毛后面长篇大论实际上都是在批判主观主义的方法，所谓主观主义的方法就在于不是根据客观实际，而是根据主观愿望制造出来的，所以这种观点反映事实来总是不那么确切。五次反围剿时，毛认为敌人力量很大，我方力量相对较小，结果就被主观主义者们打为机会主义。一方面来说，肯定我方力量，贬低敌方力量是为了树立获胜的信心，因为过分肯定敌人力量很容易遭致惊慌失措。但是反过来，过分肯定我方力量，过分低估敌方力量却是对现实的不正确的反映，错误的认识指导的实践不得不陷于失败。由此不得不强调这样一点，正确的认识事实以达到真理，才是最好地达到目标的途径。这就和以论叙史这种方法相冲突了，以论叙史这一方法的核心在于证明论本身是正确的，而正确的认识事实要求的是达到正确的认识，如果原先的论和如今的正确认识冲突，他所要求的是肯定真理，而不是单纯的维护以前的论调。其实道理也不难，就比如是不是要承认敌人的优点？那要看是不是事实，如果敌人事实上确实具备优点，那只有承认了才方便对付。就比如五次反围剿时，白军兵力强大，装备很好，这是对方的优势。如果我们想要打败敌人，那就要尽量避开对方的优势或者使其优势无法发挥作用。所以毛才提出要跳到外线去打击敌人。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承认对方有优势，那自然不会去做应对对方优势的策略，这样反而给敌人发挥自己的优势创造了条件。对于包产到户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承认包产到户的优势，才好去限制，消灭他的优势。反过来，一味地否定，反而给包产到户发挥他的优势从而顽强存在创造了条件。所以，在这里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去反映现实从而达到真理，而不要被固有结论所束缚。

当然，在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对过往理论和实际的宣传的态度问题。实际的宣传中一般习惯性都把问题简单化，比如毛时期的成就多么高，集体经济多么好之类的，这实际上来源于过往的理论。但是经过笔者今天这样一分析，就会发现上述这些许多论述实际上是有问题的，而照笔者这个逻辑去推很可能一下子就会对现有的各种宣传产生剧烈的否定。也即你们宣传了这么久，结果你们的宣传错漏百出?如果按照这个讲法的，那么恐怕许多人在内心都是没法接受的。实际上大可不必如此，今天的宣传的意义总的来说针对的对象还是那些知之甚少的人以及那些经典的抹黑毛时期的谬论。很明显，那种抹黑毛时期的谬论自然也不会像笔者那样仔细分析毛时期，基本上就是一顶毛时期搞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好的帽子扣上去就完了。你让他讲清楚不同历史时期基本生产关系，具体生产关系的变化情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再加上，大量的受宣传的人本身也缺乏相应的历史知识，政治经济学知识。你把这么多复杂的认识全部一股脑塞进人家脑袋中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所以，就宣传方面来讲，那种简单化的宣传反而是必要的，因为他有利于向大众传播观点，从而形成比较正确的认知。

对于过往理论方面来讲，则不得不强调，笔者的论调和他们的论调之间没有根本性冲突，因为总的目的都是去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是说，在许多具体的观念上有所分歧。比如笔者不喜欢完全肯定集体经济，完全否定包产到户的讲法，因为笔者觉得这种讲法本身并不能真正否定包产到户，但是归根到底，笔者和以往理论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只是在基本方法方面，笔者更强调正确反映现实，而不是以论叙史，这就必然会对过往的许多理论形成冲击。其实这个过程严格来讲也不复杂，因为人的认识本身也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人的认识总有正确的部分与错误部分之分，人的认识的发展就是靠不断克服自己认知中错误的部分从而实现的。以论叙史其实背后反映的是肯定先进事物的一切，否定落后事物的一切的倾向。对于笔者来说就有这种情况，比如历史上的毛在年轻时与他人交往时往往不注意方式方法，结果明明他是最正确的，他的意见却总是难以被接受。笔者看了后反而觉得毛的这种不注意方式方法的做法才是正确的，因为他是毛，所以他做啥都是对的。后面笔者在与他人的实际交流中才逐渐注意到交流的方式方法的重要性，费了很大的力气去克服，到今天效果如何也不好说。笔者在这里的依据就是在实际的交流过程中注意到，如果说话不注意方式方法，习惯于辱骂或者讲他人难以理解的话，那这种交流模式就是低效的。很可能你讲了半天，你在讲什么对面并不理解，也不愿意接受。当然，毛在中年时期也逐渐开始改变自己与他人交流时的方式方法了。可见，即使是毛，他也存在一个辩证否定自身的过程。这种事例其实经常有，比如毛讲过以下这些话:

“过去我们也是简单地去看错误，连一点好处也看不到，老是只反对错误、仇恨错误，这种看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你们是将军，打过仗的，打仗总要有几次失败,没有打过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从败仗中获得了教育。中国有句谙语叫“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很久就有的，马克思主义是集中了人类思想的大成。”

（出自《毛泽东年谱》，1956年10月）

“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长。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

（出自《毛泽东年谱》，1957年2月）

“另一种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嘛。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不要妄自菲薄。”（出自《毛泽东年谱》，1958年5月）

在文革时，还有人问过毛，说毛的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毛回答说可以。以上全部联系起来就是，任何思想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那么正确的部分。思想本身是靠不断克服自身的错误来不断前进的，这就表现为以后的思想对以前的真理的不断超越。指望某种理论观点成为永恒真理是不现实的。当然在这里还要注意，也有很多人打着一分为二的旗号诋毁毛的思想，这点要反对。但即便如此，现实中的观点往往也很复杂，你觉得这部分是对的，他觉得那部分是错的，这就需要争论，需要实践，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真理则会最终胜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每一个阶段代表先进的理论本身也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在前一个阶段起到重大作用的理论本身也有不足，而到了下一个阶段则会通过克服前一阶段的理论不足而实现前进。这种克服不是说完全否定前一阶段的理论的成果，恰恰相反，他是在充分肯定前一阶段的理论成果之上进行的。继承发展其积极的部分，克服其消极的部分，说穿了就是这回事。这种辩证否定，无限上升的过程往过去可以追溯到马列毛，也即马列毛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有所不足，后人对这些理论的发展既包括肯定发展其积极的部分，也必然包括克服其消极的部分。同理，在今天的左派中也是如此，过往的老前辈们在理论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进行了庞大的工作，这种光辉的业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同时，他们也必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局限性而存在各种认识不足，这点在今天的网络上也有表现，许多老同志讲的理论就不那么正确，有许多问题，历史继续发展下去是必然会对这些不足的部分进行否定的，因为这是理论发展的必经阶段。而对历史上理论的辩证否定也必然发展到对自身的辩证否定，因为这其实是一回事。许多人往往对历史上，对过去的理论缺乏一种辩证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必然体现在对自身的认知上，也即很少进行自我批评，结果就是辉煌的胜利也隐藏着巨大的失败，因为胜利本身隐藏了失败因素。就比如你去参加一场游戏，一整局你犯了不少失误，但是由于对手失误更多你拿下了比赛，由此你变得骄傲自满，觉得自己的操作都是完美的，这样当你碰到更强的对手时就要吃亏了。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辩证否定的，以前的理论要辩证否定，现在的理论要辩证否定，以后以至于遥远的未来的理论都是要辩证否定的。就比如笔者今天写的东西，毫无疑问也包含了一堆错误，谬论，当然笔者今天可能看不出来，读者的各位说不定能帮助笔者认识到这些点。这样过了几年后笔者再回过头来看今天这篇文章，可能也会觉得幼稚可笑。所以搞笑的事也在这里，当你对自己进行辩证否定时，当你不觉得自己永远正确，一贯正确时，你的快速进步反而就发生了。反过来，当你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没啥缺点时，实际上你已经深陷泥潭之中，无法前进了。

当然，在这里还有一点要强调。现在左派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倾向就是，一旦别人理论有错误，那就恨不得把别人完全打倒，然后墙倒众人推，事了踩上一脚，也即对待理论上持不同意见的人几乎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处理的。首先这种做法其实不是很利于正确的思想传播出去，因为当你用激烈的态度对待别人时，别人也往往会受激反过来用激烈的态度对待你。这样双方互相敌视，往往就很难做到客观讨论，结果是讲了半天，激烈的争论有，往往正确的思想被对方给拒绝。所以，比较恰当的讨论方式实际上是对事不对人，也即把重点全部放在分析事实本身上。至于那些比较容易引起对方激烈态度的指责，谩骂实际上是多余的。笔者以前跟别人交流时就深受这点困扰，十句话里面总有那么一两句辱骂、嘲讽对方的话语，对方看着不舒服，所以总是硬要对抗下去，对抗到没法说话时就跑了，结果就是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当然，往往这种倾向也同时存在，也即掌握错误观点的人态度也很差，既不做研究，你没说两句话就给你扣一堆帽子，这种情况笔者建议是先尝试一下说服，失败了就干脆放弃好了，指望别人能一下子具备反省精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同时呢，由于笔者也算是做理论研究工作的，也知道做理论工作的人的处境其实往往很艰难。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往往是这样一些文章，要么是长篇大论的引经据典的类型。这类文章特别青睐马克思主义经典，长篇大论都是从理论到理论，对现实问题、历史的问题等鲜有涉及。还有一类文章执着于还原历史细节，但是由于缺乏对整个历史的深刻认识，所以往往理论性不是很高。把理论与历史或实际结合起来的文章是很少的。但不管是上述哪一种类型的文章，写起来都是相当费时费力，搜集材料，组织论述写作，无一不是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可以说理论工作者本身就要付出许多。一篇简单的文章出炉，很可能就要耗费好几个星期的努力。除此之外还有类似的翻译工作。这些人中具体的生活状况如何笔者不好一概而论，但其中确实有许多为了做理论工作付出了许多，放弃了许多。笔者就看到有做理论工作的人强调自己在经济上有困难，生活上有困难，精神上的苦闷无法向人诉说。总而言之，理论工作本身要付出许多。就笔者自己而言也被严重的经济困境束缚着，不得不尽量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上。用不着隐瞒正是依靠一些人积极地在经济上支持笔者，这样笔者的理论工作才能缓慢进行下去。笔者说这些肯定会让有些人高兴，这也是如今一些左派的特征，碰到理论与自己不同的人就把这些人看成敌人，就巴不得这些人有各种各样问题，被各种各样的困难打击，被各种苦痛折磨。比如笔者上次看到一篇反对某某的文章，那篇文章就不是说按照对事不对人，主要分析对方观点为啥是错误的原则来的，而是开头强调某某以前有抑郁症。也就是说，专门挑选人家生活中的黑料，然后集合在一起，目的是希望通过让对方痛苦来打击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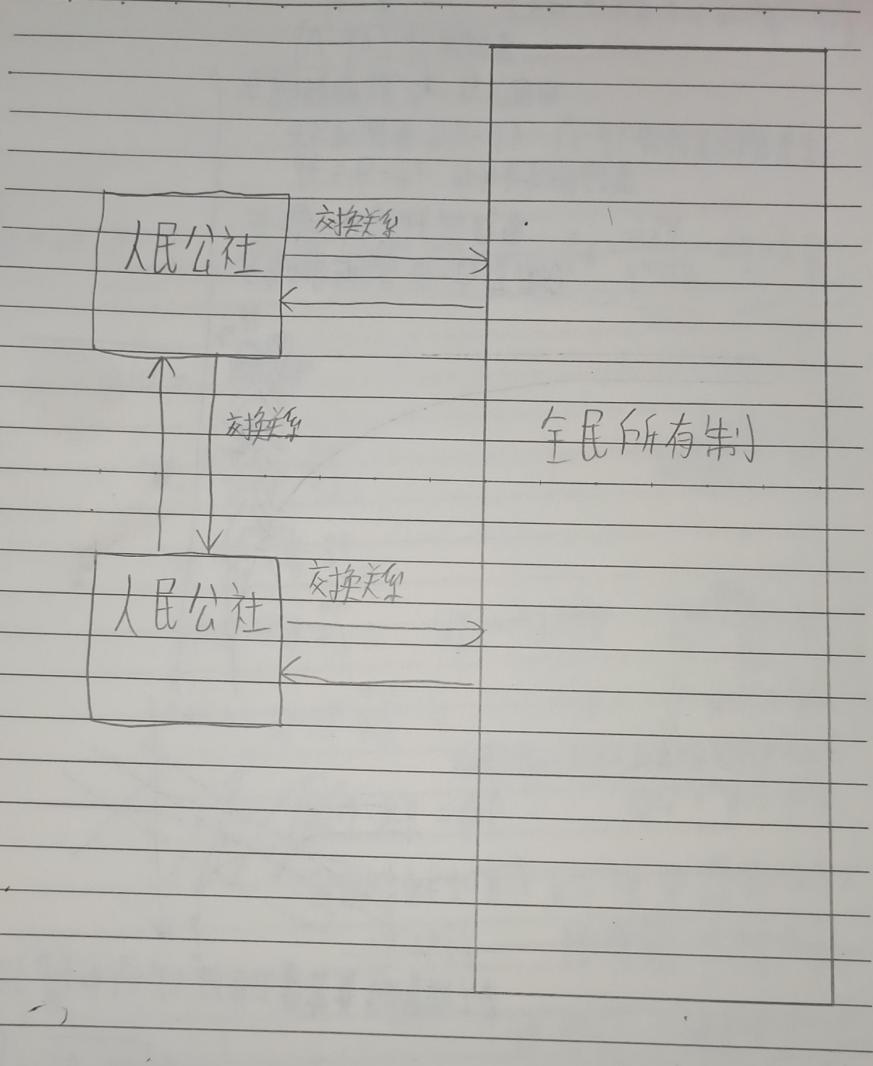
记得笔者上面的论述讲过，在一个每一个人都热心服务社会，社会本身也热心服务个人的社会里，个人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反过来，在一个人人皆自私的社会里，个人的利益反而会受到巨大的损害。左派本来应该是引领人们进入人与人普遍联合从而达到每一个人都热心服务社会，社会本身也热心服务个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行者。但是如今弥漫在左派中的风气却与之相抵触。诚然，嘲笑与自己理论不同的人的痛苦十分简单，但是反过来，当你陷入困境时呢？当你需要帮助时呢？你等来的也只是嘲笑罢了。用在别人身上的武器最终也要打在自己身上。时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一些组织的头头由于犯了错误，被后来者给激烈的打倒，然后后来的头头上位后又犯了错误，然后就被用同样的方式打倒，用来打击别人的武器反而最终打击到了自己身上。如果说，在一开始就是主要研究问题是什么而不是忙于打击追责，强调某某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在哪，让对方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不管是其下台还是停留在领导岗位，那对于组织整体的团结也是件有利的。组织本身以后遭遇动荡时，也会因为以前处理的好而给以后如何处理树立积极的榜样，这样组织本身就容易发展壮大。

综上，对于理论工作者笔者还是相当尊敬的，因为尊敬他们实际上就是尊敬笔者自己。左派中的许多人，出于现实问题亦或是缺乏学习习惯而没办法进行细致的学习，更别提进行细致的理论研究了。这也是左派本身理论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忒涩学者们有官方供养着，自然有时间、有精力天南海北的到处研究。我们左派理论工作者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生活中的困难，精神上的困难等等，要付出许多心血才能得到一点点的成果。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些成果存在错误乃至严重的错误就给以粗暴的否定，那很明显是很不利于理论发展的。人家克服那么多的困难才取得一点成果，被你轻而易举的就否定了，那最大的可能是走向彻底的消极。

所以，如果我们想真正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进入到社会主义，我们首先可以做到的是先改造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把这种相互关系推广到人民中。一个有趣的事实就在于，很多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式关系，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前就存在了。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军内部的关系，红军与群众的关系等等。联想到今天就是，如果我们想真正对过往的理论进行一个辩证否定，在理论上来讲就是，我们就要充分继承发展其积极、正确的一面，仔细、谨慎地否定其不足的一面。对于过往的理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充分关心照顾他们的感受，给与其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不是互相仇视的关系，才更容易共同进步达到新的更正确的认识。

三，

上述讲了基本生产关系和具体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举的实例是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其实这种讲法还不完全。首先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关系与私有制关系的对立统一。就如同农业生产责任制使得集体内部又划为不同的小集体，从而最终走向单干一样。在整个国民经济这个大集体中，集体经济也是“小集体”。不同集体经济就像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主体一样，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发生交换关系，同时他们本身又可以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发生交换关系。



在这里的要害是在于不同生产资料占有主体的存在，这些不同主体之间互相发生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条件较好的主体就能不断地发展下去，从而积累出更多的生产资料，这就很容易导致一种后果，生产资料的积累超过了集体自身能提供的劳动力，从而形成劳动力不足的局面，由此为了继续实现扩大生产，就需要引进外来劳动力。以下为引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得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数字不能直接相比。劳动力的数量不仅大大增加，而且有了质变。1978 年村里有大约200个劳动力，1986 年超过了250人，但还不足以供给所有的企业于是村里从外面寻求帮助。改革前的大寨很少或者不雇佣外来劳动力，而改革后的大寨在赢利最多的副业、煤矿和几乎各个地方都雇佣了数量可观的非本地劳动力。三分之一的矿工是从其他村里面来的，75人中大约有25位。这样劳动力就不仅增加了50人而是75人或者更多。由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形势推断，就可以想象还有外来的日工在大寨的其他的小工厂、果园里和卡车、拖拉机上工作。保守的估计，从1978年至今劳动力总量增加了足有40%。

劳动力的扩张显著的增加了大寨的总收入，也增加了人均的收入。因为虽然外来工人把工资带回家里，但他们的剩余价值还留在村里。总收入的这一部分增加了集体所有的积累基金,长远来看也会提高人们的平均收入，人们将从新的资本投资中得到更多的工资与津贴奖金。山东一个雇用外来矿工开采金矿的村庄，现在已经正在为所有的村民建造价值万元的房子了。,”（出自《大逆转》，P54-P55）

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还在毛时期，就已经有关于社队企业发展的两条道路的争论了，以下为引用:

“西樵公社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就办起了工业，但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一直发展不起来，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指引下，社队企业才有了迅速的发展。应该看到，社队企业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总想利用我国现在还存在着的商品货币制度，侵蚀社队企业，使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在社队企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斗争集中在社队企业要不要由公社统一管和怎样管的问题上。多数同志认为要管。不管，资本主义势力就会抬头，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不能巩固。

社队企业办公室党支部经常组织社队企业人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使大家认识到:“以粮 为纲，全面发展”，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社队企业是对的，而“以钱为纲”、“以工挤农”，盲目地发展社队企业是错的;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服务是对的，而追求利润，大搞资本主义经营是错的;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人力，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是对的，而不择手段，投机倒把，非法协作，与大工业争原料、争市场，与农业争劳力、争资金是错的。

第二，对社队企业的供、产、销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人民公社社队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同样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的生产、 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同时，它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主动精神。”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各个社队企业的生产任务由社队企业办公室遵照国家计划和来料加工任务统一下达， 使社队企业的生产获得相对平衡的发展。社队企业不得直接与有关单位自由挂钩。社队企业要大力发展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项目;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技术力量。

”（出自《把社队企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广东南海县西樵公社加强社队企业管理的调查》）

说白了就是社队企业本身也可以向资本主义发展，那他是怎么向资本主义发展呢？从上我们可以得知，社队企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在于商品制度的存在，具体表现就是以钱为纲。这是啥意思呢？以钱为纲通俗来讲就是什么赚钱就搞什么。这就会导致以下几种后果:

一，首先是以工挤农

在商品制度下，搞不同产业的收益是不等的，或者说赚的钱是不等的。而在当时，搞农业赚的钱就不如搞工业赚的多。1974年对马陆公社的调查显示，一年一个劳动力在公社所有的企业中工作，他创造的价值是1909元。而同期一个劳动力在农业中创造的价值只有338元。那么从多赚钱考虑，自然是要大力发展工业，少搞农业。这样的话农业劳动力就要大量流入公社所办的集体企业内，从而势必影响农业生产，造成农业生产的持续性下滑。

以马陆公社为例，在1957年的其工业总收入只有1万元，1980年社队工业收入为3836万元，增长3835倍，副业收入1957年为0.5万元，1980年为1059万元，增长2117倍。但农业发展缓慢，1957年农业总收入245.5 万元，1980 年为523万元，仅增长130%。而1974年以来，农业出现停滞、萎缩的状况。1974年，1974年 农业收入为550.4万元，1980年为523.3万元，减少27 .1万元，平均每年减少0.8%。

而在1978年到1980年三年中，农业减产幅度更大。1978年， 粮食总产3063 万斤，1980 年降为1948. 8万斤，减少36.4%; 粮食亩产1978年1962斤， 1980年降为1265斤， 亩产下降35.5%。

对比一下，78年全国亩产量大概是500斤，79年小岗村的亩产量大概是400斤。（老实说不知道这个数据咋来的，因为79年小岗村粮食产量是13万斤，耕地为1000亩，一除亩产应该是130斤，属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都不到）那么很明显，马陆公社的亩产量在1980年都是500斤的2倍以上，78年时更是500斤的4倍，明显属于先进公社的范畴。那这里实际上就表明了一个新的很少被人注意到的问题，集体经济的发展本身也可以导向资本主义。历来左派对于建国后粮食产量下降的基本解释都是包产到户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破坏性效果，农业机械被分散，总的意思就是因为单干才导致农业产量下降。而从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被掩盖了，那就是发达的人民公社之所以粮食产粮下降，是因为他们把更多的劳动力用去搞工业。道理很简单嘛，有上述的论述我们知道先进集体经济才是提供粮食的主力，先进集体经济本身逐步放弃粮食生产，自然会导致全国粮食产量的下滑。举例来说大寨村就是如此，83年包产到户后全村劳动力很快转移去干工业，甚至这还不够工业劳动力的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粮食产量断崖式的下跌。这就和以往的论述产生了一种矛盾，因为以往的论述的依据是，因为集体经济被破坏所以才导致粮食产量下降，由此以前的左派们都很认同那些坚持下来的先进集体单位的发展。然后一定程度上以改开后集体经济与包产到户的对立来看做社会主义与私有制的对立。这种歌颂集体经济的行为即使到今天也依然存在，比如许多人就鼓吹南街村之类的来证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但是实际上，这些村子的发展基本逻辑已经是资本主义式的了。也即通过集体作为基础不断地扩张工业，雇佣外来劳动力，这就行成了集体剥削外来劳动力。同时在集体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少数人成为集体的头头。当然，这里不是说包产到户就没有对集体经济的破坏作用了，只是说这种论述只注意了一面，忽视了另一面。以下为引用:

“农村被作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突破口。农村是当时城市政权较为薄弱的地方，而城市涉及多方的利益，关乎党政官僚的经济基础，因而农村改革引起的冲突和阻力会小很多。而且农村本身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薄弱环节，极其容易向私有制退化。毛泽东曾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农民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他是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一方面他是小私有者，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虽然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了人民公社，但是由于机械化还没有普及，很多地方生产方式没有彻底实现社会化，农村工业化也由于官僚的破坏而受阻，农民的小生产倾向就还没有根本消除。而很多农村由于政治思想工作差、官僚主义严重，集体化就更是难以得到农民的支持。教育农民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就在于农民向小私有者的发展的自发性，“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这种自发性的集中表现。而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与统-计划的公有制经济背道而驰，因此建国以后在农业领域两个方向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要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逐渐实现集体化，将农民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通过机械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建设加快农村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使农村实现生产社会化;同时要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农民并对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在农村开展反官僚化、反复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现农民的民主管理。

在没有进行包产到户的1978年农业增长了7%,在经历了1978——1984 的大增长之后, 农业生产开始徘徊不前。而且1984年市场粮食达到了4亿吨，实际上主要是那一年，由于粮价上涨大量库存粮食流出。之后由于库存粮不足，粮食只能在3.8亿吨左右徘徊。

而且产出同样多的粮食，还需要农民更多的时间投入，因为机械再也没法使用了，尽管一些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起来，然而这种积极性能带来的无非是比以前更长时间的投入，然而这种投入是有极限的。认为只靠积极性就可以使得生产大发展，岂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吗?因而农村的生产力发生了严重的大倒退，而且直到现在，小农经济还在阻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实际上1978——1984 的粮食产量上涨，尽管有积极性被激发的因素，但主要在于技术的发展。第一是种子革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包括水稻、小麦、棉花、油料等在内的各种农作物，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引发的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大增长。这项技术于1973年10月“三系杂交稻”研制成功"，1975 年多点示范5600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20%以上; 1976年示范推广迅速扩大到208万亩，1990 年全国推广2. 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50%，而总产量占61. 6%。以杂交水稻为首的种子革命,对八十年代初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重大作用。

尽管小生产具备了资本增殖的可能，但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主要的生产资料不能转移，仍然不能像资本那样自由转移，因此，农村的承包制只能作为恢复资本力量的先驱和示范，也能为资本提供自由的劳动力和市场，而不能成为资本运动的主体，但农村改革毕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步， 对于复辟资本主义有重要意义。

就是在农业逐步走向衰落的同时，农村的个体、联户办企业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的工业、基础建设劳动不再进行，劳动力大量过剩，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上去，搞多种经营，出现了一批种植、养殖、运输、建筑、加工的专业户、专业组、专业队。“

同时，随着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农民剩余资金增长并逐步转化为资本。农户储蓄年末余额从1980年的117亿元增长到1986年的766亿元，少数有劳力、资金、关系的农户开展多种经营，形成了“两户一体”。

1984年末,“万元户”平均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4786元，比一般专业户 高出58. 5%;拥有机械动力26.6马力，比一般专业户高出96%。1984年共有各种形式新经济联合体5.9万个，从业人员50.3万人，形式多是个人入股，每个联合体平均投入资金8273元，平均获得营业性收入3. 1万元。根据温州市委的调查, 1982 年全市有专业户、重点户20万户，占农村总户数16%，其中50户比较拔尖的户均纯收入7150元，比全市农村人均收入高出3倍。资本开始在农村快速崛起。

资本要增殖，必须要榨取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与社会主义精神是相违背的，在民众和官僚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下，歪曲和欺骗成了唯有的办法。在1980年的中共中央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还明确规定“不准雇工”。.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 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并雇工的情况，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讨论，最后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认为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例子进行歪曲，推出结论:“八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八个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个人以下不算剥削。”“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八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1983 年1月，中共中央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有了明确的说法，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就这样，农村走上了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农业开启了小生产的时代，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从农村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农村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先声。

”

（出自《共和国的历程》，P234-P245）

由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共和国的历程》完全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放在个体经济的发展上，个体经济限制雇佣八个人，集体经济雇佣的早就远超八个人了。再比如积极性，《共和国的历程》在这里反而提了包产到户对于农民有促进积极性的作用，但实际上是集体经济因为发展工业更赚钱的原因反而对发展农业丧失了积极性。有趣的是就在这，笔者说包产到户对落后地区具有刺激积极性的作用，然后被人打成给包产到户说好话。而现在《共和国的历程》也说了包产到户可以刺激积极性，但是不划对象，没有注意到先进集体经济丧失了农业生产积极性的事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继续增加投入，而是人家减少投入了，在这里对于积极性的理解反而也简单化了，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归根到底其实可以看出来，包产到户的所谓积极性问题其实是个人以自私自利为基础从而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的问题。这种积极性并不是说只有通过包产到户才能表现出来，他通过小集体的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也可以表现出来。甚至社队企业的这种以工挤农也属于这种私心的表现。因为从总的国民经济来讲，粮食不是生产够了，而是生产的还很不够，但是为了集体的自身利益而选择减少粮食生产则实际上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同理，既然包产到户刺激积极性的基础在于自私自利，那么包产到户对于农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刺激发展与抑制发展两种倾向，只有在包产到户对于个人实现利益有益时，他才能刺激积极性，比如落后单位生产实在太差，再加上粮食加价政策，搞包产到户一下子就能赚许多钱，这时候农民自然对种田有积极性。但是对于先进单位来讲，他们已经可以靠工业赚更多钱了，农业反而是高投入低产出的行业，那么不管你接下来搞不搞包产到户，按照自私自利的原则先进的集体经济都会丧失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理，到80年代中期以后，通货膨胀严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这就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效益下降，一大堆农民都更青睐于转移到工业领域赚钱，而对农业生产丧失了积极性。那这种积极性丧失不也是包产到户的结果吗？所以，所谓的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问题，其实反映的是人思想中自私自利的问题。人的自私自利思想要通过各种行为表现。由此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许多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单位之所以搞得不好，其实就是因为内部存在着自私自利的思想，而现实的按劳分配又总是难以完全做到，两者一冲突，就普遍产生出单干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研究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问题，必然引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从而探寻到包产到户产生的根源在于现实生产资料占有制的不等以及与之相对的私有制意识。认识到这点后就正如笔者所说的，认识到落后事物的优点在哪，才可以有效地限制，消灭这些优点。也即当你认识到包产到户对于刺激积极性的基本逻辑后，你如何去限制、消灭包产到户的根源也就有了办法。反过来，简单化的分析只是一味地强调包产到户没积极性，或者积极性没啥增产作用，本质上是把上述这些问题掩盖了，你既然掩盖了这些问题，你又怎么可能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对你来讲这些问题不存在嘛！

而实际上笔者提的这些，也并不是笔者首创的，文革时期禁止社队企业雇佣外来劳动力，也形成了社队企业发展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但是从文革后到现在40多年了，许多左派对于社队企业的认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的认识清晰，由此形成了一种理论倒退的情况。所以认识发展的有意思也是在于这里，改开后忒涩的认识对文革时期的认识进行了一次否定，后来的左派对于忒涩的认识又进行了一次否定，然而在一些问题上左派的认识反而不如文革时期的一些认识，由此又需要对这部分认识进行一次辩证否定。由此可见达到真理是一个漫长、曲折、反复的过程。当然，重点不是在于指责某种认识是错误的，而是要讲明白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理想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认识不清楚，前者是社会主义关系与私有制的对立统一，后者才是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据一切生产资料。（归根到底是个人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但不是分裂的个人，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这就很容易让大家形成一种公有制就是好，公有制就是非私有制，公有制就不会导向资本主义的错觉。其实现实的公有制并不那么公有，这样理解就简单了。同时改革开放时期，私有制的主要表现倾向是单干，先进的集体经济毕竟不多，没有占据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矛盾自然是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对立，下意识选择支持集体经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再加上以论叙史的习惯，支持某物，就要肯定其一切，自然不会去思考集体经济本身也是对立统一的这一问题。在今天指出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意义，首先社会主义建设不止是过去的事，也是未来的事，如果未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注意到单干走资的倾向，注意不到集体走资的倾向，那无疑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有负面影响的。同时，理解清楚了集体走资的问题，也算是加深了对一般性的生产资料占有问题的理解，集体走资这个特殊问题中表现着一般的生产资料占有问题嘛。特殊性中蕴含着一般性。

二，其次是资本主义经营问题

对于资本主义经营的描述是以钱为纲，投机倒把，非法协作，与大工业争原料、争市场，与农业争劳力、争资金等。具体来讲就是什么行业赚钱就搞什么行业，这样资金就会快速积累，工厂规模就会越来越大，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的市场销路。这样集体经济的发展就往往会和国营企业形成类似资本主义式的竞争关系，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整体，如果合法的渠道无法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那么非法的渠道就会大大发展，说白了就是地下市场，地下交易。

而与之相对社会主义路线则是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也即自己主动依靠自己拥有的原材料扩大生产，然后就在当地加工，直接服务于人民公社内部的需要，这样就不会形成新的交换关系。不过笔者认为，如果能够将集体工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然后扩大原料生产，同时生产一些社会上急缺的物资。亦或者跟国营经济合作，专门承担一些服务于国营经济的工作也是可以的。当然，这里只是属于个人看法。在笔者看来，虽然一定程度上发展商品关系容易导向资本主义发展，但总得来说当时的主要矛盾还是集体经济的规模不够大。集体经济规模的扩大可以使得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有效地向二级所有制乃至直接的公社所有制过渡。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也是有利于整个公社从多个所有制主体的联合变成单一的所有制主体。

回顾历史，集体生产本身也是对立统一的，他本身既包含着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同时也包含着向私有制发展的可能性。而向私有制发展的路径又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逐步减小集体从而逐渐达到包产到户，另一种则是通过集体本身的资本主义经营。建国以来可以明显看到这样一条红线，那就是集体经济总的来说是在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虽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内部也具备着不同的私有关系。而76年以后这种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几乎是瞬间被逆转，因为76年以后实际上就已经把发展的重点放在私有意识发展，群众之间的普遍分裂的基础上了。不管是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还是先进集体经济本身的发展，本身其实都在为导向资本主义开辟道路。76年以后的主线是发展压倒一切，所以是怎么快发展就怎么来。这就直接背弃了社会主义方向，结果是，经济本身越是增长，实际上却是再生产出了更多的私有制关系，更快地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

接着再讲点工业领域的，工业领域的发展历程和上述农业领域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很相似的，当然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公有化程度更高的存在，其内部个人占有程度不等的差异是低于集体经济内部或者集体经济之间的差异的。比如同是工业领域，轻工业工人和重工业工人之间的收入就有差距。即使是同一行业，也会由于地区的差异而存在工资的差异。比如发达地区的工资就比不发达地区的工资高，工资水平一定程度是依据不同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制定的，但是对于不同家庭来说实际效果就不同。家里人少的自然宽松，人多的还嫌不够。同时工厂与工厂之间也存在利润差别，效益好的企业能及时发工资，还能发些福利，效益差的甚至工资都发不起。甚至毛时期还存在这种现象，有些工厂用高薪去挖其他工厂的骨干，这种资本主义下争人才的方式在社会主义下竟然也存在。上述讲的其实是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就是经典的厂长、专家治理工厂，工人对生产资料的使用缺乏发言权，这实际上表明工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受到了影响。联系起来就是，工厂与工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因为某一位工人应该不止是他所在的那家工厂的主人，而应该是一切工厂的主人，但事实上没做到，彼此之间仍然处于一定的分裂状态。同理在单一工厂的内部，工人当家做主的权力也受到影响。

文革则是对上述状态的一种打破，历来谈文革其实都很少注意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大段篇幅都在描写夺权斗争，反而忽略了对最微观的工厂单位的考察。文革的结果是，工人组织成工人小组参加管理，干部专家等则参加生产劳动，纵向之间的分裂被缩小。同时，单一工厂的工人也逐渐地成组织地与其他工厂的工人进行沟通，彼此之间横向的分裂也在逐渐缩小。

但是76年以后，强调的立刻就是恢复规章制度，强调按劳分配，实际上又是往横向，纵向分裂的老路上前行。包括后面的什么国企权力增加，允许保存更多超额利润等，都属于上述的范畴。以下为引用:

“这次改革意义确实非常重大，为什么呢?我们体会，旧的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压抑了广大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过去我们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三大要素大家都很清楚，这就是人、工具、原材料。象首钢这样一个资金比较雄厚，设备也有相当的基础，又是搞原材料的企业，自己还有相当加工能力，也有人才，有相当数量的工程师、技术干部，自身有相当大的发展能力。可是在旧体制下，这个能力发挥不出来，受到束缚。职工的积极性，解放初期好一点，那时候一些老工人，苦大仇深，对党感恩图报，积极性相当高。但后来就不行了。因感恩只是一阵子，不会是一辈子。那时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于是就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但是慢慢的不是那么太见效了，积极性起不来了。当然少数的先进分子、模范人物积极性还是很高的，但多数人的积极性对工厂来讲是个不好办的问题，老是忆苦思甜就不那么起作用了，特别是青年工人越来越多，忆苦思甜他们听了觉得好笑。这些青年多少还有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有的还给我们算国家对他们的“剥削”帐，说我一天能创造多少钱、多少价值，你给了我多少工资，多余的是不是你剥削我了?似懂非懂的。你给他们讲《哥达纲领批判》，说我们有各项扣除，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工资老是三十七元，有的青年工人发牢骚说，我们是三百七十大毛。生活水平长期提不高，工资由国家七、八年、十几年长一次。他一算，下次长工资不知到哪一年，所以积极性起不来。那时还搞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出了事故看你阶级成份。实践证明，靠这些不行,用政治的方法办企业不行,搞经济不用经济的手段不行。当时，我们感到不论是发挥工人的积极性，还是发挥设备的作用，都是个很大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是优越的，但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是发挥不出来?从理论上来讲，职工是工厂的主人，主人嘛，为自己劳动，应当好好干，但过去只是理论上的主人，在实践中他体验不到自己主人翁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到，这是个体制问题，是经济体制不合理，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主要是计划体制，改革前什么都是指令性计划，连老鼠夹子、女同志戴的发卡子也是指令性计划。首钢这样一个大企业更不用说了，完全是指令性计划，国家要我们生产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要我们生产多少，我们就生产多少，不敢越雷池一步，半步也不行。可是钢铁的品种有一千多种，国家机关怎么能计划得过来?

”

（出自《首都钢铁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徐晞前同志谈首钢经济体制改革》，P2-P3）

在这里就有个有趣的是，极少数先进劳动模范自始至终具备劳动积极性，毫无疑问这部分积极性的基础是为集体，为社会，这里看起来是在指责毛时期的工人没有积极性，反而不经意地表明了毛时期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为社会劳动的先进分子。很明显，改开后这种愿意为社会劳动，一心为公的人只会越来越少。

然后是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不好办，部分青年工人几乎没啥积极性。这也符合那种好占少数，一般占多数，坏占一部分的情况。见微知著，首钢如此，那恐怕全国的工业企业都存在问题。上次笔者跟那位先生争论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劳动者积极性如何，笔者强调当时劳动生产率数据的下滑，那位先生则指出下滑是由小企业，三线建设等导致的。很明显，难点在于导致劳动生产率下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反而使劳动生产率下滑是否表明劳动积极性下滑这个问题变得琢磨不清。所以这次笔者更希望从微观的角度来探寻工人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不过反过来，这些材料只能指出确实存在积极性问题，而对于具体对劳动生产率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则无法说明，这也算是一种无奈。需要说明的是，国企内工人工人积极性的下降不止是因为工资不动，还有其他因素，同时也有企业比较好地解决了积极性问题，比如工业学大庆中的大庆。以下为引用:

“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有的人经不起会战的严峻考验,说“八级工不如一捆葱”，便弃工回家务农、弃工经商。这股风也严重影响着我们队。当时，生活确实艰苦, 职工大都是年轻小伙子，粮食定量减了，吃不饱，就用瓜菜代，人饿瘦了，有的得了浮肿病。有的司机当了三四年兵，又参加近二年的会战，还没找到对象;有的成了家，也接不来;有的家属来了，又没房子住。各种困难向我们车队袭来，当时，干部的压力非常大。我记得有个朝鲜族司机叫全民善，他家里来信说，家中的大米吃不完，你在外面生活那么苦，一月工资才400大毛，还不如回家种自留地。他看了家信后，一连写了3份退职报告，要求回家。在当时生活和工作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这样的问题不少，工作也确实不好做。因此，队干部为解决这些问题,商量来、研究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胜一切困难。党支部组织职工认真反复地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等几篇文章，大讲石油会战对甩掉我国石油落后帽子的伟大意义。同时，在车队里展开了比思想、比干劲、比贡献的活动，并注意了解全队每个人的思想变化情况。不管是谁,只要作出了一点贡献,我们就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表扬。即使干活不多、贡献不大的，只要安心在队里工作，都要给予热情的鼓励。在学习和“三比”活动中,全民善同志逐步提高了思想认识,他认识到了参加会战的伟大意义，认识到了甩掉石油工业落后帽子的重要性，认识到了为国为民分忧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他撤回了退职报告，向队里表示要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的决心，后来车子要进山拉运“困山材”时，他连夜写了请战书要求参加。领导考虑这项工作相当艰苦，他是个少数民族，家属又刚刚来队探亲，没同意让他去。他知道后，便悄悄地把爱人送回家，和队伍一起上山了。在山上运木材，他起早贪黑抢着干;表现非常突出。后来他被评为大庆五好标兵。（出自P198）

那时，我们队里有一名被称为“秀才”的工人，是1958年毕业的高中生，叫张秀志。刚到井队时他在日记中写到“望草原唉声叹气，当钻工真没出息，论前途更成问题，理想不能实现到处扯皮。”曾一度产生了悲观思想。后来，通过一人一事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铁人和周围其它同志的模范行动感召下，终于使他树立了干钻井爱钻井的思想。他还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懂得了真正的革命人生观，他说理想和前途就是“奋斗”。因此，他在工作中表现很突出，被评为五好红旗手，还当了司钻。于是，又在日记中写到“望草原欢天喜地，当钻工真了不起，论前途远大无比，革命工作一生奋斗到底。”他在打10万米的战斗中带领全班猛打猛冲。夏天草原上蚊子、小咬成群，咬得心里发慌，他就往脸上抹稀泥防蚊子的叮咬，张秀志连续一个多月没有倒班回家。有一天，他爱人找到铁人“告状”说，孩子病了也不回家看一眼。铁人听后很生气，坐上车就直奔1205队，把张秀志叫到跟前,以批评的口气问到“你为啥不倒班回家?”此时张秀志被大队长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闹懵了，只是反问了一句“来大庆时打第一口井你7天7夜没离开井场那是为了啥?”铁人不容分说地把他拉到车上送回家。原来是他的爱人和孩子都感臂发烧，尤其是孩子高烧到40度，他马上到卫生所买了退烧药。第二天上午，张秀志满有理地对爱人说，孩子高烧由40度降到39度，呈下降趋势,这回没事了，就拜托你了，又匆忙返回了井队。（出自P163-P164）

当时，我们的宣传工作搞得也很活跃。黑板报形式多样，如《四进士》，表示4个班都是火线上的勇士，专登各班竞赛的情况;《状元榜》专登个人的先进事迹;《火箭报》登载全队的钻进动态等，光宣传形式就有21种，诗画贴满墙。每当饭后,宿舍、队部、伙房墙壁前总是站满了人，不看看自己当天的成绩和对手的指标，晚上做梦也觉得不安宁。然而战斗是激烈的，艰苦的。

由于连续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国家正处在异常困难时期。石油大会战面临着粮食紧张、副食品困难等实际问题，会战工委一方面号召油田职工为国家分担压力、分担困难，粮食不足，暂时多吃点野菜;另一方面号召全体会战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改善粮食紧张的局面。

由于吃野菜油水少，加上劳动强度大，人们越吃越能吃，总觉得肚子没底。这时，队里出现了一个“无头案”，每到吃饭时，饭量大的人老是吵吵:“谁在我的饭盒里放窝窝头了?”青年工人也嚷嚷:“我饭盒里的高粱米饭原来是半盒,怎么现在满了?”你吵吵，他嚷嚷，可谁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后来，有的传是队长、指导员干的，有的说是老师傅干的.....但他们谁也不承认，人人心里都明白，这是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同志间的友爱。（出自P170）

铁人象热爱石油事业那样，热爱为石油事业奋斗的人们。在他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各样急办的事情。对群众的疾苦，他了如指掌，并逐一解决。队里新到了职工家属，不等人家找上门，他早已派人把粮、油送到家里;井队技术员而立之年找不到女朋友，他热心地从中牵线搭桥;到基层检查工作发现有家属生娃坐月子，他立即让工会主席送去棉花、布匹，派人挑水、翻开铁人那本“毛选”,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圈圈点点划了许多记号。这篇文章，铁人反复读过多遍，其中有许多句段，都能背诵下来。他经常告诫自己，也告诫身边的干部:“毛主席管着全国的大事,那么忙，还想着群众的柴米油盐。我们是党的基层干部，总不能把马列主义的道理和党的政策，光挂在口头上，摆在书架上、撂在文件夹子里吧?家属大嫂房子漏雨、缺原油烧，几十里外的钻工就感到冷了，娃儿们没地方读书，当父亲的能安下心来打井吗?这些不上串儿的事，我们当干部的不管，谁管?”的确，铁人管得很宽很多。接送职工上下班的车辆安排好没有，他要管;家属区道路通畅不通畅。他要管;就连业余秦腔演出队组织得如何，他也要管。他带领职工家属自己动手，盖起了全指挥部第一.批千打垒住房,又开辟荒地,种粮种菜，办成了第一个拥有自建粮店、邮局、豆腐房、缝补组、卫生所、澡塘、托儿所、小学、广播室的家属生活区。铁人究竞为群众办了多少实事好事，谁也说不完、数不清。二大队职工家属这样说:全大队每一块庄稼地里郁印下了铁人的足迹，全大队每一栋干打垒里都洒下了铁人的汗水。铁人用赤诚滚烫的阶级情爱，温暖了周围人们的心。

（P122-P123）

四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大庆石油会战中，我们把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靠广大职工的革命行动、创造精神办好企业，作为一条根本路线。具体做法是:充分发扬政治、生产技术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主要是保证每个职工有向一切违反党的政策、法令的现象作斗争的权力;保证每个职工在一定的会议上有批评干部的权力。生产技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地吸收工人参加生产技术管理，把群众管理和专业管理结合起来，经常发动群众讨论生产上的作业计划，讨论规章制度，讨论生产技术上的重大问题。经济民主，主要是工人参加经济核算活动，搞班组核算，管理食堂，讨论生活规划，讨论农副业生产分配方案等。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职工代表会议，五级三结合会议以及职工关于政治民主的“五项权利”，生产技术民主的“五项职权”、: “五不施工”，生活管理上的“四条权利”等制度和规定。( 2 )必须破除“束缚群众手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死规章、死制度”，“必须打倒机关的衙门作风，机关必须为生产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领导首先不做，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接受群众监督”。（出自P92）

”

（出自《大庆文史资料 第2辑》）

从上述材料是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点的:

一，首先即使是大庆油田，他在一开始也是存在工人劳动积极性问题的，一些工人往往在一开始还是没办法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眼光没办法放到集体，社会。针对这点必须要大搞政治思想工作，激发大家的社会主义竞赛认识。

二，大搞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必须要改变工人实际现存的生活环境，要发展生产，逐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要干部们真正发自内心地去关心工人，关心工人的家庭，生活。而不是说只是靠思想来忍受苦难。现在一些人老是指责说歌颂苦难不好，其实在大庆这里不是歌颂苦难，而是歌颂克服苦难的精神。

三，既要依靠先进干部的带动促进作用，也要发挥工人的主人公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刺激广大工人为集体、社会、国家劳动的主观能动性。

那么很明显，在这种环境下劳动，可能工资啥的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工人出于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是愿意通过一时地低收入来换取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前进的。在这里的关键点实际上就不是工资变不变的问题，而是是不是由我决定工资变不变的问题，对于主人来说，他往往更能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一些眼前利益。同时在这里，工人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善，自身的问题有人关心，劳动虽然艰苦但却在精神上很享受，自然是干了又想干。这种积极性就脱离了工作为赚钱这种狭隘的资产阶级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为社会主义工作就不应该生活好，只是说我愿意为了以后更好而现在更多地吃苦罢了。其实光靠奖金刺激，他带来的积极性也有限，以下为引用:

“

记者:依稀记得，70年代末恢复奖励制度之初，奖金对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曾起过不小的作用。可如今奖金发得不少，可职工的积极性却依然不太高。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信长星;钱这个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对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有作用的，但钱的力量不是无限的，单靠发奖金来调动职工积极性是注定要吃苦头的。这不是凭空推论。行为科学中有一种双因素理论，这一理论的创始人赫茨伯格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发现，使职工不满意的因素与使职工满意的因素是不同的，前者称为保健因素，后者称为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的满足，只能消除职工的不满，并不能使职工变得非常满意。工资、奖金、生活条件等都属于保健因素。因此，企业家在这些方面所作的努力，只能希望以此消除职工的不满情绪，并不能奢望靠它来长期激发职工的积极性。由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奖金的作用会越来越小了。

记者:管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加强企业管理，关键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而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一定要建立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又有两类:一类是物质的，另一类是精神的，即人们常说的物质刺激与精神鼓励。

信长星:这就是说，企业家要想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不但要在工资、奖金等物质方面作文章,还应当着力改善激励因素,包括成就、赏识、提升、工作发展前途及责任等，这些因素都属于我们所讲的精神鼓励范围。

我们的工作，常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警如，精神鼓励的作用在过去几十年中曾被片面地夸大，物质刺激则被贴上了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标签，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度被取消达20余年。现在看来，这着实有点“左”得可笑。

后来，当人们终于察觉到精神鼓励并非万能而物质刺激亦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以后，各种各样的物质刺激便陆续来到我们中间，名目之多、花样之繁，远远超过了西方。与此同时，精神鼓励却又不知不觉地被人们遗忘了。报载:美国麦道飞机制造公司派往上海航空工业公司负责培训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期满离任回国前坦诚地评论说，中国的企业缺少长远的眼光，普遍偏重物质刺激，企业的领导把奖金作为提高生产的砝码，精神鼓励讲得少了。他认为，为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以解决工人的住房、提高他的奖金作为主要手段，这在短期内可能有用,但时间长了就会失效。他告诫中国企业家，单纯用物质刺激来调动人的积极性，这决不是中国企业家应有的品质。

应当说，这位专家的这段话是切中要害的，甚至可以说是为我们那些眼睛只盯着奖金的企业经营者敲响了警钟。

记者:当前，奖金等手段难以有效地调动职工积极性，除了没有处理好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的关系外，与现行奖金制度不够合理、不够完善恐怕也是有关的。

信长星:我赞同你的观点。从根本上说，由于制度不合理，办法不完善，才使得本来有效的奖金显得效力不足，甚至逐步下降。从理论上说，奖金，作为对超额劳动或特殊贡献的补偿或奖励，其发放必须是论功行赏。然而，现行的奖金制度怎样呢?

一是平均主义。奖金，就其本意而言，是对劳动者超额劳动所付的报酬。因此，奖金的发放应当严格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据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量的不同，拉开合理的差距。然而，在现实中，奖金的分配却并没有真正贯彻这一原则。在机关、事业单位，奖金几乎都是按人头平均发放。在企业，倩况虽比机关、事业单位好一些，但也同样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现象，特别是在同类人员之间，合理的奖金分配差距并没有拉开，多劳多得原则只存在于方案中，并未完全付诸实践。

二是差距过大。这种现象不但在某些企业之间存在，而且在某些企业内部也严重存在。在企业之间由于企业奖励基金的增减主要取决于利润的变动，而利润是受价格、设备占有、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的，因此，企业之间奖金水平差异甚大，苦乐不均。在企业内部，经营者和职工之间奖金也差距过大。据调查,去年广州市一些企业进行年终一次性奖励， 厂长所得奖金额从3000元到8000元不等，副厂长2100元 到5000元，而工人最多的只有200元，有的则分文未得。这种情况在其它城市的一些企业也同样存在，只是严重程度不同罢了。

”

（出自《让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并驾齐驱》）

搞笑的事也在这里，当真正彻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后，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就没办法满足了。像发奖金就，越到后面反而会形成少数管理者拿走大多数奖金，大多数工人拿的奖金数量只是充充门面而已。同时工人在企业中也逐渐从主人地位变成奴隶地位，精神会越来越压抑。最终的结果是钱也赚不到，精神又压抑。

再接着补充一点，76年在工业领域的改革主线是，一个主体逐渐分裂为不同的主体，各个主体之间各自有其特殊利益。以下为引用:

“

第一个阶段，从七九年到八一年。这一阶段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当时，我们扩权的形式是利润分成，就是企业实现的利润，在国家计划的利润内，可以留成百分之八点三，在超计划的利润内留百分之十。这是开始改革的办法。我们把这个办法叫“水涨船高”、“水落船低”，企业实现利润多了， 国家可以多得，实现少了，国家少得。而且实现少了，国家损失比企业损失更大，因为企业顶多是百分之十，而国家是百分之九十。这比利润全部上交的体制，确实有点改革的味道，前进了一步。企业的积极性比过去高了，特别是企业领导人清楚，企业生产多少利润，可以留多少，可以安排多少技术改造项目，搞多少措施。但工人对这个问题不关心， 因为奖金还是国家规定的，跟企业的效益不挂钩。

第二个阶段，从八一年下半年开始，实行以承包为中心的经济责任制，这是首钢开始搞起来的，也是受到农村包产到户的启发。这个办法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八一年钢铁限产，要减产三十六万吨。钢铁减产了，利润就会减少。我们实现利润估计只有二亿六千五百万元，当时国家搞第二次经济调整，国家财政困难。北京市要求我们上交利润保证二亿七千万元。我们把利润全部上交也不够，只有二亿六千五百万元，还差五百万元。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要从大局出发，我们的周冠五同志党性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二话没说，无论如何要保证上交二亿七千万元。北京市给我们的政策，就是包给我们了，千方百计要完成。超过二亿七千万元的部分，不管多少，都留给首钢，多超多留， 少超少留。压力大，动力也大。周冠五同志回来后，召开常委会研究，怎么办?国家把这个任务包给我们，我们也要把这个任务包到全体职工，当时叫做千斤重担众人挑，采取“包、保、核”的办法。包，就是每个人都来承担任务，层层包，公司包到厂，厂包到车间，车间包到班组，班组包到人。

达到百分之十没有奖金;达到百分之十五，奖金和上一年一般多;超过了百分之十五，奖金也可递增，上不封顶，单位不拉平，不搞平均主义。这样,企业既有了压力,又有了动力，特别是把三者利益结合起来，每个工人都知道百分之七点二是给国家作贡献。把责、权、利三者结合。这也是受农村包产到户的启发，农村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个人的。我们也是这样,首先是保证递增，然后是多超多留、个人多得，这是共同点。《决定》里讲要让承包制在城市里开花结果，我们是尝到了这个甜头的，这是带有实质性的改革。第三个阶段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改革的步子相当大。实行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搞钢铁的就是以钢铁为主，实行多种经营，不仅生产钢铁，也搞跨地区、跨行业的投资，经营其它事业。首钢搞第三产业的事，报纸上也登了，那是小打小闹，自己生产面包、挂面、酱油、洗衣机、电风扇等。那时，不这样于不行。我们不能把多余的人推向社会，而要自己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多余的人不能留在岗位上。留在岗位就不得了，岗位上一有富余的人，纪律就会涣散了。所以多 余的人减下来，必须发展其它事业。中宣部有人参观我们的面包厂说，首钢生产了最硬的,也生产了最软的。最硬的是钢铁，最软的是面包。.我们的面包确实是够味的。那时北京市不让搞，说你周冠五怎么搞的，不务正业!因为石景山区不买他们的面包，买我们的。商业部门说抢了他们的买卖，老给我们提意见，卡我们，不供给我们面粉，我们提出自己办面厂，又不让我们建。现在卡不住了，粮食放开了，不给面粉，我们到外面去买。最近，李锡铭同志说，周冠五不是不务正业。北京市希望我们多搞点第三产业。大生产本身的一个规律，就是一搞承包，一搞经济责任制，企业钱就多了。

”

（出自《首都钢铁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徐晞前同志谈首钢经济体制改革》，P5-P8）

由上可以看出，先是增加各单位的利润提留，在私心刺激上，必然要走上利润挂帅的道路。后面全面承包，学包产到户，虽然能一时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但是长远来看必然下降。接着为了处理剩余劳动力，为了赚钱，又向别的产业进军，和其他部门形成竞争关系。说白了，一个主体分裂成不同主体，各个主体之间互相竞争，根本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综上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毛时期也必然存在着普遍的工人积极性不足的问题，这种工人的积极性不足究其根源一般可以理解成意识根源和制度根源。工人本身还是有许多只注意得到自己的个人利益，注意不到社会，集体的利益。而同时一些制度使得工人的生活不那么好，或者损害了工人作为主人参与工厂生产的权益，实际上损害了工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会普遍存在积极性不足的情况。但是一部分先进模范始终都能有昂扬的积极性，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工人生活问题解决的好，工人主人翁作用发挥的好的企业，工人的积极性则十分高涨。所以，并不是如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毛时期的工人要么全都十分积极，要么全都十分消极，而是有十分复杂的表现。这种复杂的表现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对立统一的表现，也即社会上既有为公的思想，也有为私的思想。前者带来的是积极性，后者只能靠私利刺激才有积极性，许多时候还表现为消极性。

四，

现在再回到经济体制问题，上次那位先生批评笔者时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笔者认为算社会主义毛时期不应该算到76年以后，那位先生认为可以算到，最起码可以算到84年，因为经济体制基本没变。那位先生同时也反复强调，他支持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队企业，而不是在市场经济中活动的那种。

从上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一，这位先生的看法是有很大道理的，76年到84年的各种发展，包括社队企业的发展，无疑是社会主义本身优越性的体现。对今天来讲，大多数地区的集体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在70-80年代，不仅是农村有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发展，城市也有集体性质的由居民联合经营的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联合起来快速发展，本身就表明了集体经济本身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包产到户后面的二十年没进富裕门则表明了这种发展模式潜力十分有限。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当时对这位先生的批判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只看到一面，没有看到另一面，同时给人家扣了很多帽子，造成不好的影响，这里再次向这位先生道歉一番。

二，虽然76年到84年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但是其基本的发展逻辑却不是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不是向着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个人占据一切生产资料，劳动者的普遍联合这些大方向发展的。而是反过来，把发展的重点逐渐放在刺激劳动者的分裂的基础上。我们经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来，如果全社会都普遍向先进的社会主义单位学习，使得一般的变得比较好，落后的也赶上来，那么社会的总体发展速度甚至可能比毛时期还要快上许多，更是能把改开后的发展速度远远甩在后面，这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我想这点应该没有分歧。反过来，虽然76年以后搞的许多措施还是在公有制经济框架下搞得，甚至很多措施本身也是毛时期的措施，如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等。但是这种发展思路总的来说会逐渐限制先进社会主义单位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促进一般以及落后的单位全面走向资本主义复辟，也即这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我想这点应该也没有分歧。

在这里实际上就有一个矛盾，那就是毛时期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辩证否定的过程，很多前一个时期还比较适用的东西，到下一个时期就成为落后的了。而单纯看经济增速本身是很难反映出这种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的，因为经济增速本身主要还是宏观考察事物，对于事物本身缺乏分析，不能够将事物分成各个因素考察其互相作用。所以在这里就有这种矛盾，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从总的经济数据好看来论证毛时期的优越性，那我们实际上就很难反映出毛时期社会主义因素与私有制因素的斗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我们对私有制因素缺乏认识，对于如何限制消灭私有制因素就会处理的不好，最终会造成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在这里其实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认识的第一阶段是认识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认识的第二阶段就是具体分析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与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差别以及其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那种认为吃了五个馒头就饱了，所以前四个馒头就不重要的想法依然是错误的，没有前人的探寻认识，今人的认识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但是反过来只是复读前人的认识，而不对前人的认识进行辩证否定，不去提出新观点也不对。

当然，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讲，像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认识往往是在再次进入社会主义后才展开的。再重新进入社会主义后，然后继续按照以前的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接着发现实践效果不如预期时，才容易引起普遍反思。但是真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普遍反思，那代价往往就很大了。实际上从笔者上述的写法也可以看出，笔者的文章表面上是在谈经济体制，实际上还顺带谈了许多思考方法，认识方法的问题。对过去的观点的简单认同这种思考方法，认识方法本身就会对今天的实践造成影响。以论叙史会阻碍达到真理，而达不到真理必然会影响到今天的实践的展开。所以，看似是历史问题，看似是将来才需要考虑的事，其实在今天也会发生影响。比如笔者谈了如何使他人认同自己观点的方法，网络上活跃的人恐怕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点，当你态度很差激烈地攻击他人时，不管你的意见是对是错，对面都很难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做法不是和强迫小岗村村民集体化的方法是一致的吗？也即，是重态度，重用激烈的语气指责对面，然后轻分析，轻视解释清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就是费了半天劲做思想工作，结果是一堆帽子甩出去，人家既不理解现实，也不领你帮助教育的情。当然，也有许多人本身不具备良好的讨论态度，对于这类人不理就好。那么很明显，掌握了做思想教育的工作的方法后，那么低效讨论就能减少许多，组织内本身也能更加和睦，更有利于长远发展。其实从笔者今天的论述就可以看出，指望靠一两次讨论就理清问题基本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背后都反映着相当复杂的现实，复杂的现实本身就容易给出现象，从而使得不同的人们往往得出互不相同的观点。就比如包产到户，他在一开始就具有减产效应，比如使那些缺乏劳动力的家庭难以进行农业生产，但是如果只看某个落后村的数据却给人一种包产到户是万灵药的感觉。反过来，当一些人研究到包产到户的减产效应后，又觉得任何单位的减产都是包产到户导致的，这又忽略了先进单位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上的转移。所以，要真正搞清楚一个问题是不简单的，需要自己进行大量的研究，然后与大家进行细致的讨论。而简单化的讨论根本不利于达到真理，你说出你的意见，贴出一些和以往观点不那么一致的材料，然后就有人跳出来指责你是xx观点，你反对人民公社啥啥的，试问这种讨论氛围下又如何达到真理，如何实现对过往理论的辩证否定呢？由此流行的必然就是对过往理论的简单肯定，然后不同立场的人各执一词，各自按照以论叙史的方法找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说从现实出发提高自己的观点，由此总的认识也就不得不陷入长期停滞中。

接下来笔者再试图剖析一下北马的文革史观，当然笔者看的不多，所以也没法分析太多，这里只谈一部分。首先这个作者的基本观点应该是，社会主义下的基本矛盾应该是:

“党的包办替代与权力垄断和群众在引导下的自我组织“谁战胜谁”的问题。”

接着这个作者大谈苏联道路与延安道路的分歧，认为前者代表包办代替，后者代表民主的群众自我组织（实际上就是排斥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但是这个作者貌似不太敢公开承认这个观点），以下为引用:

“许多人认为这一分裂起源于延安道路和苏联道路的分歧。这一说法似乎有一些道理。中共独特的夺取政权的方式带来的后果绝对不仅仅是一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能简单概括的。我们看到，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由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然后党由城市“扩散”到农村。列宁只带了几千名布尔什维克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斯大林模式也同样是一个“扩散”的过程。从农村中提取充足的资本注入城市的高速工业化之中，这是苏联工业化最主要的来源和动力。如果从政权的权力分配上来讲，苏联自始至终是城市中的干部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有抱有平等的理想的“老革命”和科层式的技术官僚之间的斗争——这在 30年代末发展为苏联的大清洗——但是 农村在新政权中始终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不仅是集体农庄要完成国家建设的沉重负担，甚至每- -个集体农庄如何具体增产都由莫斯科来计划。也就是说，斯大林认为城市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无论它怎样剥削农村——都会使得现代化能够 “扩散”至全社会。结果，苏联模式最终培育起来的不仅是高速的工业化奇迹，还有一大群享有极好的福利和待遇，拥有专业的技术知识，但刻板僵化，等级深严，以执行上级命令为唯一目标的城市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工人农民只处于被计划，被管理的地位上。但这对于任何一个憧憬着人人平等的激进革命者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个想看到的结局，尽管斯大林坚称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建设共产主义，是必由之路。因此，西方一些学者悲观地得出革命的“热月”的观点。

延安模式的具体表现有:在政治领域中减少官僚主义自上而下的命令，加强上下层互动的“群众路线”:压缩等级制的“扁平化”管理和“精兵简政”;为了给群众提供参政条件而实行分散的政治结构;以及干部、知识分子必须定期参加体力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下放”“下乡”等等。由于身处孤立的根据地中，因此并不十分强调领导人员的严密分工，强调的是素质的全面和“多面手”的角色。它与苏联模式中官僚与人民等级森严的分界，官僚之间复杂的等级关系，以少数专业技术官僚制订严密计划，一切按部就班甚至刻板僵化的政治结构有极大不同。这种极力压缩官僚科层式的等级，竭力加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互动的模式，就成为后来被西方学者称为“毛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雏形，这也是后来那场群众性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

”

（出自《文革史》，北大马会，P13-P15）

首先第一点，这位作者犯了个非常明显的历史错误，那就是列宁靠几千布尔什维克就从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然后扩散到农村夺取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就连笔者这个不那么了解苏联史的人都知道，二月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虽然有争议，但基本都是在1万、2万左右，到了十月革命时期就直接是35万人，到21年时就达到了巅峰的73万人。按这位作者的描述，我觉得这位作者更倾向于描述的是21年，但实际上不管哪个时期都和列宁带领几千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毫不沾边。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位作者到底对没对苏联史有过最基本的研究，而一个对苏联史基本缺乏研究的人大谈苏联道路的弊端，那只能是一种情况，也即这位作者草率地将其他人的观点搬过来作为自己的观点。实际上这个作者也承认了，他这本书搬了很多别人的观点，这本身没什么，搬别人的观点本身并不是错误。问题在于，你在缺乏对苏联史进行大量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草率地使用别人的观点，那别人观点的错误也就不可避免地由你负责了。

第二点，这位作者无疑很贬斥苏联道路，甚至认为其是热月。但是在笔者看来，重点根本不在于你是贬斥还是褒扬苏联道路，而是讲清楚苏联道路存在的社会物质根源是什么。也就是说，是现实的什么条件使得苏联道路必然存在？不讲清楚这一点就会滑为唯心主义，也即苏联道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斯大林这类人为了自己的私利拍拍大腿强行要求存在的，没有任何的社会物质根源。这也就是说，想要否定苏联模式也就只需要另一个人去拍拍大腿就可以取消。在这里，一定的政策、制度就不再是对现实的反映了，而是完全成为了某些人的主观产物。那么苏联道路存在的物质根源在哪呢？那就要从苏联的革命史出发，在这里笔者不想赘述苏联的革命史，只是简短提一下，如有错漏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就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在一定条件下是依靠了民主的，但同时又在一定条件下不得不限制民主，在这里的民主主要指的是与工农之间的关系。以下为引用:

“

工人监督就是使工人阶级有可能监督生产资料的使用的一整套措施，这种监督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产生的组织进行的，并在那些还属于私人资本的和已被没收的工厂里同样发挥作用。

列宁在1918年赋予工人监督的作用主要是致力于准备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迈进的一个初步措施。为此，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里写道:

“可是在工人监督还没有成为事实以前,...便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

在1917年期间，阶级斗争的具体发展提出了以发展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工人监督问题。这一运动在1917年2月和10月间已有发展,布尔什维克党也曾坚决予以支持。在十月起义后的几个星期里，布尔什维克党曾想把千百个工厂委员会的分散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活动转变为有组织的工人监督，以适应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

任务不是容易的，因为在工厂委员会数量增.加的同时，他们各自都有扩大自已特权的倾向,并把每个工厂当作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作为该单位的劳动者集体所有，他们自己可以决定应该生产什么、卖给谁和卖什么价格。当时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社会统治需要把工厂委员会异常分散的和相互矛盾的权力隶属于共同的政治目的。生产的社会协调在工业中特别需要，每个生产单位只完成变革过程的有限部分，只代表高度社会化的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所以，苏维埃工业的继续生存以及反对市场势力和反对把各个不同工厂的特殊利益放在主要地位的斗争,要求各个不同生产单位的活动首先有最低限度的协调。由于缺少这个首先，多少有一点的协调只是在事后通过市场进行着，或者这种协调是产生于不同工业部门或不同工厂之间的力量对比。实际上，协调也可以不实行;如果是这样,生产就越来越瘫痪。1917至1918年之间的冬季的情况事实上就是这样。

布尔什维克党因而寻找能够解决各工厂委员会活动的协调问题的办法，确切地说，就是建立“工人监督”。 它的活动范围应当比每个工厂委员会更加广泛。它应该以协调的、统一的阶级监督来代替分裂的和分散的(从而也是不现实的)并由各不同工厂集体实施的“权力”。

十月革命以后存在的条件不利于向这样的统一的监督过渡。事实上，劳动者没有立即相信限制工厂委员会的权力并使之隶属于一个外部组织是必要的。在许多劳动者眼里,建立一种多少集中的监督，好象是把他们刚刚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得的、并且希望保留在他们自己手中的工厂一级的一种“权力的剥夺”。对事物的这样看法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特别是孟什维克的鼓动。孟什维克鼓动处在他们影响下的工会组织去维护工厂委员会,甚至铁路上的“车站委员会”的自治。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早已预见到全国范围内工人监督的必要性和实现它的困难。例如，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里,列宁写道: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密的、最负责的统计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向工人监督过渡和抛弃工厂委员会走向“分散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管理”形式，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在群众中存在的并有深刻影响的、有利于“各自为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企业利己主义和对于“自由”的抽象概念。关于这一点,正如列宁所写的:

“小资产阶级抗拒国家的任何干涉、统计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对最有斗争性的工人发生政治影响，尽管这样，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影响和它在生产单位中的基础还是薄弱的，尤其在说服工作方面，而要把工厂委员会转变为工人监督组织就需要做这种工作。十月革命以后,这种转变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某些布尔什维克党员也对工人监督和限制工厂委员会的权力持保留态度,因而困难加重了。然而，最严重的反抗是由于孟什维克或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在一部分群众中发生的影响，他们利用这种影响尽可能地阻碍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实施。

这些反抗和保留态度说明了采纳关于工人监督的有关决定必须延期，并说明这些决定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可以由一些事实来说明上述情况。最初预定，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应紧接着10月25日之后举行会议时宣布建立工人监督。工人监督的法令和土地法令本来应当同时颁布;可是并没有这样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工人监督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散会了。同样,当11月3日《真理报》发表列宁撰写的工人监督条例草案时,条例本身也没有立即交付政府机关(也从来没有将草案的初稿交出来)。最后，仅在11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审核了列宁草案的修正本。经过一些修改以后，这个修正本被通过了。

颁布的条例基本上重述了列宁草案的主要规定，特别是关于工人代表所作的决定有强制性和关于工人代表和工厂主对国家负责等项。工人监督纳入苏维埃制度内;工厂委员会或工厂理事会就这样置于地方、省或地区领导机关的监督之下。法令规定设立-一个监督机构的最高组织: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

法令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在工人监督的组织体系中确定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组织双方各自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工厂委员会是各个企业的劳动者直接产生的，而各厂工会(不是一切工人都参加的)有一个集中的组织,这使它们能够协助建立同样集中的监督，但又使它们摆脱了基层的直接影响。法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工人监督的组织体系中给予工会一个重要位置。这种办法引起了某些劳动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监护制度;相反地,在工人运动内工作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员却又认为这样解决还不够;他们认为事情没有明确地朝着有利于工会的方向去解决。在他们眼里，这是趋向于把企业永远分割为独立的单位，例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工会发言人洛佐夫斯基声称:“有必要把事情绝对明确和断然地提出来，以使每个企业的劳动者不要有这样的印象:企业是属于他们的。”

1918年初，《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差不多重新采用了1917年11月条例的原文。列宁撰写的这个宣言于1918年1月3日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它指出工人监督“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因已被证实。

宣言声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承认劳动者在对工厂、矿山、铁路等的监督尚未实现之前,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就不可能是一种社会所有制。列宁在撰写宣言前不久,曾坚持“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统计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的思想。1918年8月至4月，列宁多次指出，特别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又强调指出，他心目中的群众监督和工厂"委员会谋求“各自”管理企业的活动完全不同。他说，工人监督就是苏维埃国家的监督而不是众多的、分散的监督。要实施一种关心整体利益的监督,列宁补充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图。

在各种不同的决定通过后，每个生产单位可能采取的逃避监督的行为原则上大为减少，在这些决定实际执行过程中，工厂委员会事实上丧失了它们的自治,它们不再掌握自己的真正权力,而.纳入了中央的工人监督范围内。

在一切具有某些重要性的(称为“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工厂委员会应对国家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这种责任落到了指定执行工人监督的、从工人和职员中选出来的代表肩上。

这些不同的规定引起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不满，他们妄想使工厂委员会变成在联合形式下可能组织的、但对国家机关不负责任的自治管理委员会。这些措施的反对者特别声称工人监督法令的制定把“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的概念延伸到这样的程度，即由于工人监督条例的实施，工厂委员会完全被置于其他的权力机关之下。

这个权力机关由工人监督基层组织(大体上是旧的工厂委员会)所从属的各种不同机关构成，即地区委员会和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内部，工人监督基层组织的代表是少数派。因此,在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中只有五名代表由全俄工厂委员会会议指派，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则有五名代表;工会中央理事会五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协会五名;农业工作者两名;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两名以及十万名会员以下的每个工会联合会--名(超过十万名的两名)。

在工人监督的上级机关中，这个监督的基层组织的代表占少数，而工会组织的代表比它们的代表多。

即使进行了这样的变革，工人监督的结构还不能保证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协调，但是俄国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即对城乡的供应以及不久以后对前线的供应，需要有规律地进行生产并且应该尽可能地适应总的形势的要求。

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加强”工人监督的体制,同时建立一些其他的协调和领导生产的形式，其主要的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事实上，在内战开始后的形势发展下“一切为前线”的口号占优势——，这种协调和领导的形式比工人监督更占优越地位。可以说，工人监督在旧的工厂委员会解体的同时终于瓦解了，这种解体似乎与在工厂中实际掌握问题的真正的工人组织者人数不足有关。另外，基层工人组织的缺乏，也是和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人数太少有关，也由于党组织、国家机关，尤其是军队为了完成任务而越来越多地吸收了(无疑 也是必要的)那些最积极的工人有关;与布尔什维克党缺乏有系统的推动和劳动者对工厂委员会的日益漠不关心有关。最后，在苏维埃制度最初几个月建立的工人监督就堕入了不再觉醒的睡眠之中,工业生产的协调和领导只能在别的基础上取得保证。

”

（出自《苏联国内阶级斗争 第一时期》，夏尔·贝特兰）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在一开始，是完全由工人管理工厂的，但是这种管理方法下反而是各个工厂的工人都只倾向于扩大各自工厂的特殊利益，而至社会利益而不顾。对此布尔什维克才不得不逐渐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管理工厂，不如此不可以打赢国内革命战争。那么问题来了，很明显在工厂委员会时期，工人对工厂是有完全的民主权力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机构在他们上面，按照这位作者的理解，公有制加民主制度，那就是社会主义，是最先进的制度。那为啥这个最先进的制度下，各个工厂的工人只顾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呢？为啥靠这种制度难以打赢国内革命战争呢？如果联系笔者上述的分析来理解这个问题，那答案并不困难。那就是这种所谓的公有制加民主制并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制度下既没有做到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也没做到每个工人占据一切生产资料。他不是联合起来的工人占据一切生产资料，而是分散、分裂的工人占据各自的生产资料，各自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就像整个工业领域划分为了成千上万个小集体一样，每个集体都是所有制主体，要和其他主体发生交换关系。其中强大的主体越来越强，弱小的越来越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一个集体剥削另一个集体的不等价交换现象，接着就是发展的好的集体从其他集体哪里雇佣劳动力，最终走向资本主义复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工人互相分裂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必然优先考虑自己工厂的狭隘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利益本身无法实现，就不得不用最少数先进的工人来自上而下地实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这就是事实。很多人对一些基本的道理就不理解，比如民主本身其实就是不民主。在生产资料占有不等的前提下，实行绝对的民主，结果必然是各个劳动者只在各自的生产单位内具有民主。也即位于某个工厂内的工人有民主控制这个工厂的权力，但同时他也必然失去了控制整个社会工厂的权力。但是社会生产本身又要求全社会的工厂互相协调一致，而各个工厂本身的民主制度要求的是自己工厂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就是，人人民主的结果反而导致人人失去了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权力，结果人人都是不民主的，人民当不了大家，做不了大主（指当整个社会的主人），而只能当小家，做小主。（指单个工厂的主人）真正的民主只能是在生产资料占有相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很多人都讲工人之所以没有办法管理整个社会生产，是因为没组织没技术，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就算真的全部工人都有组织，有技术了又如何?工人之间的普遍分裂没有消除，那有各个组织的有技术的工人还是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说整个社会的利益。苏联就是这样，一开始是工人监督知识分子，后面工人自己知识化取代了知识分子，但是仍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当然，有组织、有技术有利于工人之间达到联合就是了。

对于农民也是同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主导农村的土改工作，农村的土改领导权实际上在富农手里。而在接下来的国内战争中，富农在支援苏维埃政权上则并没有表现的积极踊跃，由此才引起了布尔什维克的强制性措施。我们可以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并不完美，有很多问题，但是考虑到布党对农民工作经验的欠缺，指望人家立刻拿出某种完美的策略也不现实。历来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分析问题时总是轻视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然后习惯于做道德批判。就比如布尔什维克采取自上而下的集中制度，所谓的有革命理想的“老革命”（应该是指托洛茨基那批人）就对此进行批判。那么假设这些“老革命”真的推翻了斯大林，重建所谓的民主制度，那结果如何呢?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不等，归根到底还是由生产力等因素决定的，并不是说某某一拍大腿就可以取消的，所以这些“老革命”的路线实质上会导致成千上万个经济单位成为所有制主体的情况重新产生，也即劳动者普遍分裂，主体从一往多发展。我们联系改开史就可以发现，这个进程正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阶段，实际上南斯拉夫就是这样的，等会笔者可以简单解释一下。由此，所谓的“老革命”抱着平等的思想，干的实际上是走资派的事。因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不止是在纵向上人民和干部的不等，同时也在于人民与人民的不等，而先锋队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克制人民与人民之间不等这种倾向的。所以可笑的是就在这里，许多的理想主义者，你真的让他的理想实现，那只会产生更糟糕的结果。因为理想主义者观察现实的方式就和老毛批判的一样，是主观主义的，你让这帮人去搞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得被人扬了。

再回到农民问题上来，农民工作也是同理，十月革命前列宁并没有像工人那样高度重视农民，不允许把工人的积极力量派去农村做工作。十月革命以后才逐渐重视农村工作，但同时适合农村工作的方法并不会自然而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有进步，真正意义上开始团结广大农民在布尔什维克身边，另一方面也有缺点，工作方法不够好，再加上农民本身就有很强的私有意识，许多农民表现为极度的动摇妥协。毛时期相比布尔什维克有一些进步，比如毛时期的中共主导了农村的土地革命，这也意味着中共在农村占据了发言权，再加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可以说工作比布尔什维克做的细致的多。在列宁时期，一位红军帮大娘捡了柴火，列宁就兴奋地到处宣讲这个例子。而到了中共军队时期，这连基操都算不上。很多人就不喜欢承认这种辩证否定过程，他们习惯性地将自己所认同的理论理想化，绝对化，实际上是将自己的认识绝对化。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这样一条主线，列宁时期对农民的工作是在不断发展的，毛时期对农民工作的发展不过是对列宁时期农民工作发展的继续，没有前者的发展，后者从零开始怎么可能取得对前者的超越？反过来，如果后者不对前者进行超越，那辩证法就死了，那就说明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的工作是绝对好的，是绝对完美的。那现实吗？不现实，因为即使是农民工作发展过的中共，对农民的工作也不是绝对好，抗日时期还发生农民负担太重咒骂毛的事，然后才是中共发动大生产运动解决问题。但其实侧面也说明，高层对农民的意见反映也比较迟钝，这不也是缺点？包括建国后推动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发生的问题，也是这些缺点的表现。说白了，为人民服务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辩证否定的过程，以后的实践发展还要超过毛时期。以前的一些缺点以后都要去克服。反过来，将以前的经验绝对化，就会像托洛茨基那样，在分析中国革命时认为不把先进力量放在农村是列宁制定的策略，（托洛茨基类比1915年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等到哪天中国的“十月革命”爆发后，恐怕托洛茨基就会再按照什么列宁主义去发展农村力量吧？）结果就是中国托派一直到49年新中国建立都一直蹲在城市，几乎毫无作为。这也是个讽刺的地方，真正的列宁主义是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而不是把自己过往的一些具体结论绝对化，这正是列宁一生都在做的事。所以，真正的继承列宁主义也意味着必然真正的超越列宁主义，反之，死记列宁具体结论的人却遏制了列宁主义的发展，这也是一种可悲。一切都是对立统一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一分为二的，习惯性将历史上认识绝对化的人，实际上是将自己的认识绝对化。比如笔者就经常看到这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和中共之所以政策不同，是因为各自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看法一方面有道理，那就是注意到了双方的条件不同，条件不同就必然有政策差异;另一方面这种说法好似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和中共在彼此的条件下所采取的政策都是绝对正确的。就以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例吧，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胜利，难道是因为他在21-49年整个历史阶段采取了一系列绝对正确的政策吗？并不是，比如1928年时，中共有人鼓吹焦土政策，要烧老百姓房子，把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逼迫他们革命。结果就是老百姓选择暴动攻击苏维埃政权，这样的蠢事也是在中共所处的条件下发生的，请问这正确吗？不正确，可以说是蠢得很。所以这种因为条件不同所以政策不同的说法就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对条件的反映问题。不是说你处在什么条件，然后你就正确认识这种条件，然后你就制定出什么完美的政策。而是你处在这种条件，你开始初步认识这种条件，然后在认识这个条件中不断犯错，然后才逐渐达到比较正确的认识。那问题来了，是说你一到胜利时，你的认识就绝对正确，就绝对完美了吗？不对，就以中共为例，比如笔者就说过，中共在南方的土改搞得不好，这一问题直接遗留到新中国建国以后。由此可见，革命的胜利还不是认识的完结，他只是下一阶段认识的开始。

三，接着是第三点。综合上述两个论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文革史》的作者存在着一股强烈的主观主义的以论叙史的立场。比如苏联模式与延安模式的对立，这位作者首先不去分析苏联模式产生的社会物质原因，他剥离这个基础后，一切政策的制定都是主观主义的了，也即我之所以制定这个政策是我一拍大腿决定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苏联的那种劳动者普遍分裂的情况在中国就不存在?照样存在，比如农民中间普遍存在的重乡情怀，朱德刚下井冈山后，他团里的农民士兵就打着民主的旗号跑完了。红四军七大时，广大基层指战员靠民主把爱包办代替的老毛选出了红军的领导岗位，那按照这个作者理解这是大好事，但结果就是红四军后面政治涣散，军事上屡遭失败，不得不把毛请回来。所以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发扬民主是一方面，但反过来强调集中，反对极端民主化也是一条主线。延安整风就有人从集中这条线出发来理解，最后证明延安整风是按照斯大林确立自己在联共布党的地位的模式搞的。说白了，延安模式虽然更强调民主，强调上下互动，这点算是对苏联道路的超越;但他的基础仍然是坚持党的领导，这点又是继承联共布的。说白了，他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的民主制，民主制本身是为了党更好地领导。在这里作者就刻意营造一种对立，苏联道路就是包办代替，延安模式就是民主的群众自我组织。他没有意识到苏联道路本身就包含有民主成分，延安模式本身也继承了苏联道路的民主成分并对其有所发展，同时也坚持了苏联道路的党的领导。其实在这里也很明显，很多人都是把党的领导和包办代替看成一回事的。这种强烈的主观主义方法正是毛所批评的，那按照这样的方法去认识现实，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一系列错误。

从上述几个基本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知道，《文革史》本身不可能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他对历史的分析也必然是一堆错误，因为他的基本前提都错的离谱。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点，笔者后面再讲一些具体的问题:

①毛泽东对文化战线和阶级意识的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少有的，反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建设新文化的目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出自《文革史》，北大马会，P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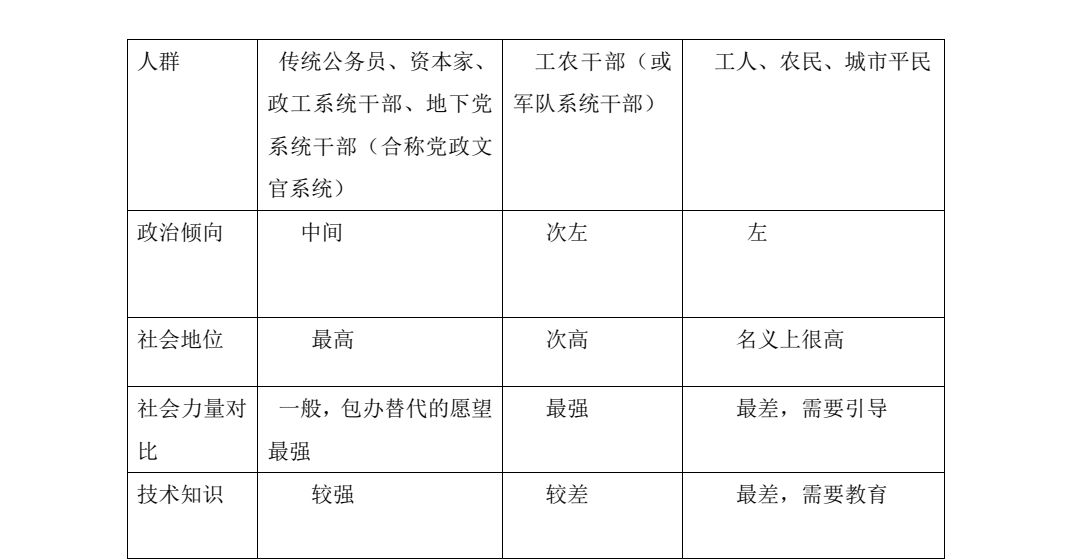
这个地方就很怪，列宁讲过:“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文学 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小业的一部分”;“文学不仅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而且要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监督”。

毫无疑问，毛的思想是对列宁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但是在这里作者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这是少有的，那这个经典作家指谁？列宁?斯大林?用语模糊就是这样，不知道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同时毛又说:

“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础观点。

这里讲的东西是和葛兰西完全不同的，葛兰西强调先夺取文化领导权，然后才是夺取政权和经济基础。可是按照毛的理论，首先是政治，经济基础，然后才是文化。实际上也是如此，毛是通过夺取地方政权，发展根据地文化，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发展全国性新文化作为一条主线的，这和葛兰西的文化战略是完全相反的。仅仅是因为双方都强调文化，然后就说毛相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西马更接近，这样的论述在笔者看来是别有用心的。

②其次是这位作者构造了这样一种论断:



至此，10年之后的那场政治运动的三大政治力量的社会基础都已近形成。有些急躁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线就是:为了维持高速工业化的进行，必须使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承担积累成本，因此要引导和支持社会主义力量继续向前推进。但是社会主义力量本身实力太薄弱，而党政官僚同样反对(如刘少奇)，无法继续推进，因此不得不向党的官僚妥协，许诺党政官僚在承担积累成本的同时可以拥有更大的政治管理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和对权力的垄断。比如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由农民自发的互助组逐渐上升为党的引导下的初级社，再到1955年“社会主义高潮”中的近乎于强制的高级社。在这之中官僚的权力垄断逐渐盖过了农民自身的组织。总而言之，这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似乎更多是党政官僚们的胜利。尽管在社会主义模式下虽然他们的消费意愿受到抑制，要承担一定的积累成本(比如一视同仁的票证)，但是作为妥协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也得到了体制的保障。最终建立起来的是一套苏联式的“无民主的公有制”。这是在社会主义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向党政官僚安协的结果。但是这次妥协注定了这一体制是不稳固的。工农劳动者可以要求强化公有制民主( 也就是扩大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去争取权益，如后来的鞍钢宪法:而党政官僚可以用公有制中民主的缺乏来强化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就是用“特权”即计划经济中的行政力量来“以权谋私”，扩大自身的消费，减少承受的积累，从而重新把更多的积累成本转移到劳动者身上，如缺乏监管的“物质刺激"和奖金制。总而言之，1956 年以后的社会问题已经是党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包办替代主义或官僚主义与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在这里作者先是把全国的力量分成三股，然后在这里就讲什么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太弱（指工人，农民，城市平民），党政官僚反对，所以没法前进。首先这里的力量应该是指组织起来的力量的含义，工人农民虽然数量最多，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组织的力量却最弱。在这里作者首先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以形而上的眼光看待工人，农民，城市平民，那就是只承认其革命性，没有看到其抵制社会主义化以至于自发走资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化强调一切人平等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对于少数劳动者来讲，其占据的生产资料以及劳动条件等比其他劳动者好上很多，社会主义化本身会取消其相对优越的地位。比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大队从生产能力强的生产队那里提留太多，以至于生产队躺倒不干。又或者是小岗村那样，一个组才两户，但是每户依然害怕对方占便宜，反而要求继续划小单位。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工作组下来用包办替代的方法强令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小岗村村民则自发组织起来要单干。就这一个实例，就已经把这位作者的基础理论推翻了。比较好笑的是，笔者并不知道这些来小岗村的工作组到底是党政文官系统还是工农干部，实际上这个划分也不科学。比如这位作者对工农干部的划分竟然是工农干部出自工农，所以更具有平等革命的意识？这就是拿出身代替实际的阶级意识了，工人出身不等于就有无产阶级意识了，一方面，很多出身自工人的人原先是其他阶级出身。其次是工农干部本身划分的范围不科学，高级干部和底层干部差距很大的，大队干部的工分被要求不得超过平均水平，也即赚的钱还不到平均水平。处于高级地位的工农干部，很容易就生活腐化。后面这个作者就把高岗列为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列为工农干部的一员，可笔者查到的也是高岗生活腐化，这种划分方法无疑是不科学的。所以这里整个基础的划分就有问题了，在这个作者看来，走资的力量就是党政文官系统，走社的力量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社会主义下资无的斗争就是党政文官系统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那我们不妨大胆假设一下，假设广大劳动人民靠普遍的组织起来打倒了党政文官系统，然后普遍掌握了知识技术。那很明显按照这个作者的设想，接下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迅猛往前进了。但实际上，人民之间对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不过是换了一种走资方式罢了。因为作者在这里几乎是完全否定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只是把资无之间的阶级斗争看成人民与党政文官系统的斗争。而没有把人民内部之间的斗争也看成阶级斗争。其实一直有个误解，那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敌我斗争，其实这只是在两个阶级敌对的情况下才成立。以下为引用:

“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有几种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党内也有几种人。实际上人民內部矛盾，就有阶级矛盾。所谓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与地主的矛盾，而是三部分人民的矛盾，这三部分人民之间，内部有一部分暗藏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

（出自《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毛，1958年8月，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查到）

这点可能很多人都注意不到，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注意不到，很多人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就是残酷无情的打击敌人。而按照笔者的意见来讲，其实还要比毛再进一步，因为笔者具体划分了工人内部的差别，农民内部的差别。作者的这种划分错误，直接就影响到了作者后面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判断。比如对反右，作者是这样讲的:

“现在，毛泽东认为党已经退化成为一个保守的因循守旧的官僚机构，已经不再能推动社会变革，而推动社会变革的途径是从体制外寻找力量。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致辞中，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口号。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5月26日宣布了这个新政策。这标志着“百花运动”的开始。（出自P46）

在城市百花运动中，大学学生最为激进也最不受约束。著名的“大学风暴”于5月19日开始于北京大学，学生们在校园建筑和教室里张贴大字报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教室里无人上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以说是这次运动最大的遗产。学生的批评意见与那些老知识分子的意见很多是一致的， 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学生的“鸣放”运动带有更明确的政治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准政治性的组织，这些组织发放传单，组织集会，出版油印小报。讨论会常常变成了斗争会，党的干部和大学管理者成为斗争的对象。一些学生领导人很快便在全国知名，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抨击“新阶级”制度，到6月初，日益发展的学生运动(这时已从大学扩展到中学)变得越来越好斗，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行动。学生占领了大学的办公机构，向政府和党的机关发动进攻，并扣押甚至殴打了学校干部和党的干部。学生们还企图“走向人民”，组织工人和农民参与斗争，但没有成功。

这几乎就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演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现象以更大的规模重现。1957年的“大学风暴”比起9年后毛泽东发动的学生运动真是小巫见大巫。（出自P53）

”

（出自《文革史》，北大马会）

笔者之所以不太喜欢这类书的原因就在于，我很难搞清楚这个作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捏造事实，还是说水平太低资料都没有太收集就忍不住制造各种言论。就比如毛认为1956年的党不能推动社会变革，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毛有这种观点。历来都是两方面，一方面毛担心党的腐化，希望发动人民来净化党，但是另一方面，毛依然坚持党的领导，他的社会革命政策依然依靠党来去推行。这个作者只爱强调符合自己观点的一面，从不提另一面，从史学角度来讲，这算捏造历史，属于很糟糕的行为。在这里作者实际上又制造了这种对立，一方面是党政官僚，另一方面是体制外的群众，知识分子等。其中前者代表着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后者代表社会主义方向。毫无疑问，前者属于作者认为的包办替代的阵营，后者属于民主的人民群众组织这个阵营。甚至这位作者认为这里的学生运动是所谓的文革预演，还举了个例子，林希翎。以下为引用:

“

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刘绍棠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从赫鲁晓夫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是这样被逼上梁山的。我们知道列宁在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曾出卖过情报，而列宁仍给他工作。在革命胜利到斯大林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这是斯大林的专横。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群众轰她，少数人欢迎鼓掌)，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道! (有 部分群众鼓掌)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各地大都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群众轰 她)我不害怕，大家不欢迎我，我就滚蛋。

我们今天的斗争不限于发发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在她发言过程中，群众递条子，要求制止她发言，并且有条子骂她是“臭娘们”)。

她讲完以后，有三四十个人围住她，要她继续讲。有个学生还找她签名。另外一个女同学说:我们要警惕煽动性的话!旁边一个学生打了这个女同学两下。( 后来这个打人的人溜走了，没有找着)接着有人发言反驳她的意见，提出质问，她又作了三分钟发言。发言未完就被群众轰下台去，有二三十人推着她到大会旁边另一个场上让她继续讲，她讲到她过去的部队里，知道部队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从马寒冰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她还说:过去在我心目中，党，组织，领导，非常神圣，我也很盲从，后来才有些转变。

(一)制度问题: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不是指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制度，而是指具体的制度)，如庞大的宫僚机构，产生了官僚主义分子。现在党也在精简机构，我衷心地拥护。再如，特权分子产生的原因也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有关，如看文件，要按级别，党团员也是一一种特权，能够留学，参加游园。因此，要克服错误，就要从根本上改革这一切制度，上次谈到不要改良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

(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它反映了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也即意识形态不能适应公有制基础的矛盾。如“三害”即与政治制度有关，与公有制不相容。这个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原因是意识落后于存在。

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这个矛盾目前是非对抗性的，发展下去可能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现在已有局部表现为对抗性，如某些地区的罢工、罢课等，我在东北、玉门曾经看到过这些现象。

(四)“三害”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现在大学里讲课提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时，总是说这是最好的社会。这个“最”字，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看只是一个社会阶段，因此他们的最”字，就是以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只歌颂正面，而对阴暗的一面避而不谈。如动员上海工人到西北参加建设，只谈西北如何美好，结果工人去了不是那么回事，就罢工。

我对现实生活是不满的，即使是五百年后出世的话，我也会不满。如果对现实满意的话，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现实不满是正常的，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我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进了一步，问题是使公有制再前讲一步.有人提出了定息70年，我坚决不赞成。

(五)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他杀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错误，二次大战不一定起(的)来。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领导的十万人也不会全死掉。

(2)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评价。斯大林的后期是反动的。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法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并非他没有犯过错误。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如他去年6月横渡长江，当时不让报道，可见他是谦虚的。主席写几首诗

”（出自林希翎在北大的讲话）

按照《文革史》作者的观点，林希翎是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新阶级制度，在笔者看来则并非如此。首先林希翎说知识分子现在也是工农兵了，这个说法缺乏依据。现实的社会主义下工农之间还是有差别，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也有差别。工业的知识分子往往在工厂属于技术专家的范畴，是要管理工人的。农业的知识分子往往蹲在科研场所，而不去下乡。文科的知识分子也一样，与工人农民联系的就那么紧密?林希翎的说法更像是，一种抗拒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说辞，是首先考虑知识分子利益的一种说辞。这种知识分子历来如此，一方面高喊着平等，现在不是社会主义。为啥不社会主义呢？因为不民主。在这里就把政治经济学分析取消掉了，不社会主义的原因就被林希翎归根为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而不是经济基础领域。照这个推论，林希翎要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呢？要的不过是公有制加民主制那种社会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复辟第一阶段那种社会主义，也即是布尔什维克当初面临的那种困境（其实76-84年也和这个阶段类似）。历来社会主义下的知识青年反对党的统治都有这个毛病，那就是只看到纵向的不等，看不到横向的不等，把一切罪责都归于共产党的统治，好像共产党一被打倒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实现了。

在这里林希翎又讲毛的话不是金科玉律，为啥不不能反对？这话当然是对的，但前提是你反对了，但就林希翎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来看，他明显对这个问题缺乏基本认识。他之所以受欢迎，根本原因在于他讲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罢了。笔者并不相信所谓的知识分子道德就多么高尚，就多么追求平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可以看出来，革命的主力是工农，大量知识分子长期待在国统区而根本不愿意去延安参加革命。这就证明，真正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少数，这也和劳动者只有少数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要求才积极劳动的情况相印证。这就表明，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讲，他们要求的并不是什么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这只是个幌子。他们只是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压迫处于不平等地位，所以希望让全体人民替他火中取栗罢了。因为真要做到所谓的人人平等，那首先全体人民收入大体上按照劳动量划分不过分吧？那这样的话为了拉平城里人和乡里人的差距，城里人的收入需要暴跌。那知识分子能接受这点吗？上山下乡运动后知识分子看到城里的自己的同期有房就觉得心理不平衡，然后哭着闹着要回城，觉得自己在农村受到了迫害。从这些点来看，知识分子们的问题和劳动者的问题有相似性，那就是依然是以私有意识出发，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至于什么平等，人人都过得好之类的说辞则都是幌子。

从林希翎的讲话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锅全是共产党的，只要打倒共产党了，问题就解决了。（看匈牙利那段就知道了）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共产党真的被打倒了，结果会如何?知识分子会选择下降城里人的收入去补农?知识分子会选择下降自己的收入去补工?在这里，社会主义、民主都是幌子，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但从我们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劳动者普遍分裂的情况下，在社会不能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联合起来的每个个人不能占据一切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必然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机构来对整个社会的利益进行协调，这要求这个机构里的人要尽量减少私心，尽量充满公心，尽量比较完整地反映整个社会的需要。那么最适合的人选无疑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知识分子真能那么代表群众的利益的话，那取得革命胜利的应该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共产党。历来都这样，大肆鼓吹党的干部特权多么大，好像党的干部占了特别多似的，只要把干部打倒了，人民就富裕了。

就以一个县为例，假设副县左右级别的干部直接拉到100个吧，然后平均每人工资141元。那一个县30万人不过分吧，假设工人平均每个月收入41元，把干部拉低到工人水平就能省出1万元，1/30=0.03，这样可以使得每个人提升3分的收入。在干部总数极少的情况下，干部的收入和一般人差1，2倍是基本不会影响群众的贫富的。而到了毛那种情况，由于人数巨少，1级才一个人，你就算把工资算到6000都对全国人民的收入几乎没影响。按笔者的意见实际上是对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拿6000完全不成问题，可能笔者不那么“马克思主义”吧？不那么爱追求“平等”。真正影响群众之间贫富的，往往是群众之间的不平等。举例来说，假设一个县30万人，3万工人，平均每人每月收入40元，27万农民，平均每人每月收入10元。那一拉平就是3\*40+27\*10=390/30=13元。农民的收入增长百分之30，工人收入要下降一半还多。因为群众太多了，往往轻微的收入差别，因为数量的堆叠也能占到极大的比重。这还是工农的差别，农民内部亦有差别。当然，这并不是说就不能反对纵向的不平等了，但是如果只是把纵向的不平等看成唯一的威胁，这并不能真正达到所谓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同时反对纵向与横向的不平等，其中横向的不平等反而更难处理。遗憾的是，历来许多左派解决不平等的方式首先就是压低干部工资，而基本忽略了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这里就很有意思，一会是各种资料显示苏联，毛时期中国贫富差距不大;一会又是官僚特权多么大，压榨多么大，笔者就听过这种说辞，说毛时期的干部与人民的贫富差距比改开后的贫富差距还大。大多数人貌似没有什么量的概念，也不懂量的差异。一说平等，就好像是绝对平等。比如《文革史》的作者还说毛时期农村基本没有贫富分化，而像大寨村这种地方，每人每天可以赚1.5元（本来可以赚3元的，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压到1.5元），其他一些村庄可能每人每天只能赚1毛到5毛。甚至还存在公社雇佣外来劳动力的情况。从贫富分化的角度来讲，这种差距肯定是不能和改开后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的，但另一方面程度低不等于不存在。难怪有人嘲讽一些人做历史不懂数学，脑子里没有量的差异这种概念，结果就是不同质量的事物混为一谈。

那再谈谈南斯拉夫，林希翎好似很喜欢南斯拉夫，因为人家很“民主”，那么南斯拉夫到底如何呢？以下为引用:

“第四，南斯拉夫人的自治利益多元主义是极端教条化的。所谓自治利益多元主义，就是指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南斯拉夫很早就意识到也承认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人们为了寻求自身的利益，必然会产生矛盾与冲突。但是自治理论认为这种矛盾是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和方法就不能再采取阶级斗争,而是要运用比较民主宽松的手段。也即用民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用民主的手段去化解矛盾，用民主的策略去统一思想，用民主的政策来保护少数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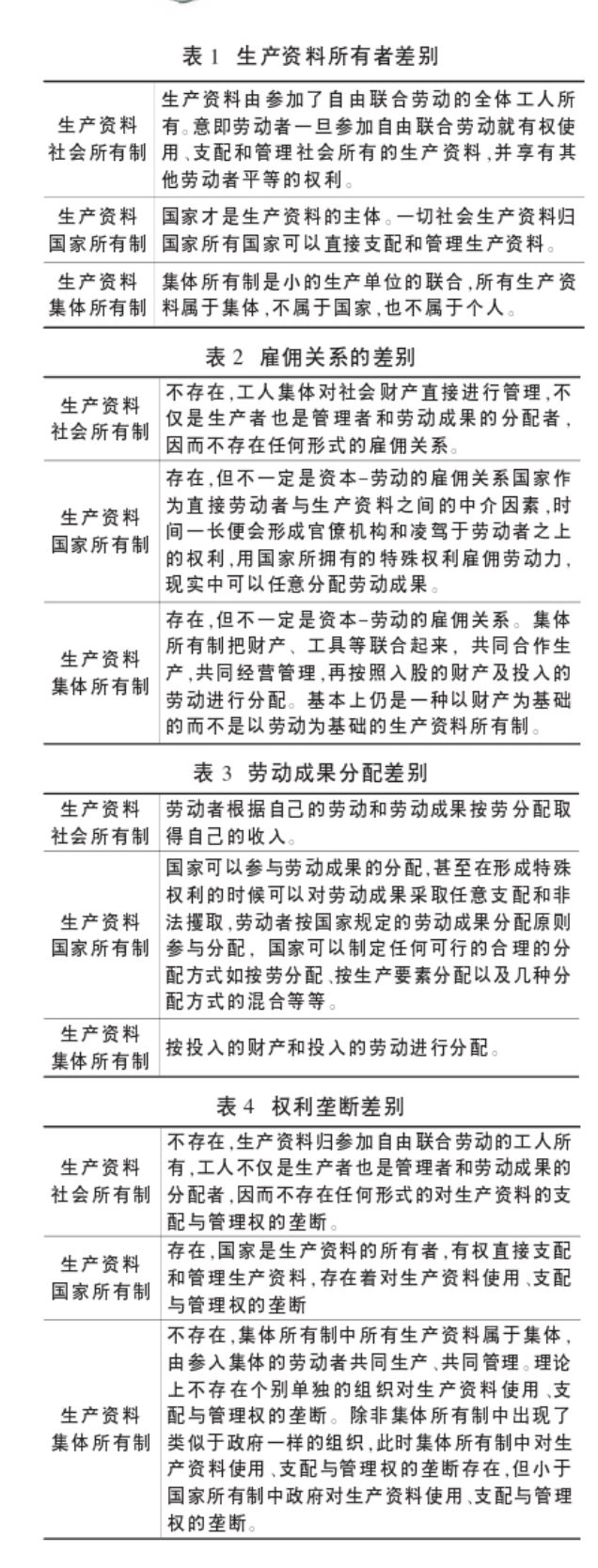
这种理论一旦演化为制度设计，就会出现很多弊病。首先，按照这种自治理论，南斯拉夫联邦中央的权力极小。因为不论什么问题、方案和计划要想得到通过并付诸实施就必须经过南斯拉夫联邦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一致同意。否则就视为非法这种机械的规定，看似是为了大局着想，事实上，许多重大的利国利民的计划、方案都是因为其中一个共和国或自治省的反对最终流产。这种制度设计只会引起几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的领导人将联邦的权力和利益视为无物，而为了本民族的发展与利益争吵不断。统一已经成为了假象，民族主义的抬头和民族情绪的高涨是意料之中的事。其次,制度设计的最初目的是抵制僵化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实行利益多元化与自治化,可却走向了极端，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分封制”,即由原来一个中心的中央集权变化成多个中心的中央集权,由原先联邦的国家主义转化成各自治国和自治省的国家主义，“一个国家主义被八个国家主义所取代”;“任何一个问题，无论轻重缓急要想做到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一致同意、各方的利益都被考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在南斯拉夫内部要做到统一决策和统一部署， 疏通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和相互关系，使得各方都协调配合，有序的贯彻执行联邦的决定和政策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利益多元化、中央集权的多元化和国家主义的多元化三者是一脉相承的;利益多元化是基础，后者则是表现。

总之，把自治理论绝对化、理想化和教条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联邦虚设。.

”

（出自《浅析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刁健 ）

其实这种利益多元化与自治化的极端化，不仅仅是在联邦中央与各共和国与自治省之间普遍存在。从微观上来看，他也必然表现在社会的集体利益与单独的经济单位之间。说白了就是，各个工厂只在乎自己怎么赚钱，不在乎社会利益。这就和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只注重自己的利益，不注意整个联邦的利益的道理是一致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人都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人人都自私，结果人人的利益都无法贯彻。难点也就在这，社会利益往往也是和个别利益冲突的，靠民主并不能自动消除这种冲突。有人曾经把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的特点做成图表。



光看图表本身貌似挺好的，但是一旦深入实际考察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样，以下为引用:

“

前南斯拉夫与前苏联在如何建设本国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分歧而最终决裂后,经过艰辛探索,最终确立了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工人自治”模式。此种模式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一定程度的直接结合,在20世纪50年代充分彰显了自己的优越性。然而，70年代中期以后，前南斯拉夫经济发展速度减慢，80年代，经济日益陷入混乱，以至最终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前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存在的种种缺陷。

第一,社会所有制缺乏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统一管理。前南斯拉夫始终认为国家干预企业必然会带来官僚体制和对全体人民财产所有权的侵犯,这样就自然产生了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从总量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缺乏国家必要的干预和调度,由此而产生和蔓延的各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社会所有制缺乏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市场经济要求有产权明晰的所有制形式和完善的要素市场，而前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是一种“无人所有”的所有制，其产权关系非常不明晰。产权不明晰,便会出现无人承担企业经济责任的局面,企业职工权责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致使大量国有资产被鲸吞或流失。

第三,社会所有制分配体制存在缺陷。社会所有制企业对其收入分配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国家除了规定企业职工最低收入标准外，不进行任何控制和调节。企业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收后,便自己决定其收入分配。这种分配体制对提高企业和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定的作用，却不利于企业的积累。只掌握经营权而不具有所有权的厂长、经理们,常常乱长工资或多发实物和奖金，使个人收入增长超过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这种消费过快的现象加剧了通货膨胀和外债负担。

”（出自《重建个人所有制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以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为例》）

“自治停留于微观方面，彼此分散，互不联系，没有形成一个集中的社会体系。这大大便利国家对自治的支配(以及金融租贸品资金脱离自治的监督而独立)，从而也妨碍工人阶级作为自治力量去占领整个社会的政治舞台。

随着实行自治，工人阶级变得分散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没有从整个社会的方面充分组织起来，社会成分混杂，在有关自已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状况的根本问题上发生矛盾，这就使得那些脱离工人阶级而独立的社会权力中心有更大的可能对工人阶级进行操纵;这些中心还以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社会上分散的状况作为口实，来替主要是对他们有利的社会权力和仲裁权力进行辩护。

所有这些消极的情况对工人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使得工人只是“小规模地”举行罢工(许多罢工的参加人数很少，持续的时间短暂，罢工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微观方面等等)。

”（出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58年至1969年的工人罢工》，P76-P77）

“南斯拉夫从1950年实行自治制度时开始下放对工资的管理权。到60年代初，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过去的高度集中的工资管理制度，形成了新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这种制度的指导思想就是扩大企业的财权，使企业充当扩大再生产的主体，同时，为了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使职工的个人收入同劳动成果直接联系起来，以克服个人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南斯拉夫在工人自治制度和联合劳动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其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前提下，劳动者在联合劳动组织内实行自治原则。按照现行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联合劳动组织中的劳动集体自行直接决定其个人收入标准。就是说，南斯拉夫的个人收入基金由企业(联合劳动组织)根据总收入情况和各种扣除的需要加以规定。个人收入基金总额能否增加,完全取决于企业经营状况和各种扣除的比例;个人收入基金在个人之间如何分配，也由企业自行决定。个人收入基金不作为生产成本，只作为总收入的一部分。”（出自《南斯拉夫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把上述问题一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南斯拉夫这套又碰到了布尔什维克在初期所面临的那种矛盾，正是这种矛盾逼迫的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采取自上而下的制度加以克服。同理毛时期也有这种矛盾，所以毛时期也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不是为了推翻党的领导，而是改善党的领导。而南斯拉夫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从他个人分配制度就可以看出来，工人本身的收入依然是和各自所处的工厂效益挂钩的，这和改革开放本身没什么两样，（实际上改革开放就包括抄南斯拉夫的部分）属于社会所有制主体从单个向多个转变的过程，也即走资的过程。南斯拉夫早在50年代就被批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道路也是修正主义的。然后一个鼓吹南斯拉夫，明里暗里贬低毛，直接攻击斯大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竟然被这个作者类比成文革的红卫兵?按照红卫兵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烂谁的狗头的逻辑，林希翎更可能被红卫兵打烂狗头。

③按照这个作者的划分，作者对反右就进行了重大的误判，这个作者基本就把反右看成党的包办替代主义与体制外的民主群众组织斗争的一种形式，并且暗示毛认为真正先进的力量在体制外。以下为引用:

“大鸣大放的空气越来越紧,大寨这时也和全国的广大农村一样,经受着一次严峻的考验。一户富农甚至扬言，要往回要他的房和地，还放出话说什么“杀不了陈永贵，大寨就翻不了身”。一些坏分子趁机四处煽动，挑起群众对干部的不满。

贾进才、宋立英、梁便良等支委们都很反感，不断找陈永贵商量，要给这些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一些颜色看看。陈永贵劝解说:“沉住气，让人家把话说出来。”

过了几天，梁便良看到实在不像话，又找到陈永贵说:“上面不说话，你也不吭声，让他们这样胡闹，我准备拿扁担和他们拼。”

陈永贵说:“这是党中央的号召，怎么能不听党中央的话呢?咱们要相信，毛主席和咱心连心，你拿扁担和人家拼，这不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吗?

陈永贵一方面劝解梁便良，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想不通。心里说:“他妈的，没有让旧社会折磨死，没有让日本人关死，难道真的还要死在这些算账户手里?”反过来他又想，“不怕，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谁敢把我怎么样?”以此给自己壮胆。

陈永贵在这一段时间里确实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一连几天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总是在想:“怎么鸣放也没有个边，好像越对干部有意见，越对党不满就越有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出自《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1.12节）

其实不仅如此，当时有农民要退社，有许多人反对合作化表示合作化不如单干好，甚至还有人贴出“兴资灭无”的口号。所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先进单位遭到了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痛击，反右本身也是对这种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一种回击。但是在文革史的作者那里就完全看不出这点。（这自然不是说不存在纵向上的压迫了，但是这个作者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承认纵向上的压迫，不存在底层群众自发走资的可能性，不承认先锋队本身也有镇压走资倾向的职能）

把上述全部的分析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文革史》这本书可以说通篇都是错漏。

首先占占有材料上面作者表现了极大的局限性，从后面作者列的一系列材料来看，作者看的往往是政治斗争领域的材料，而对经济基础范围内的斗争一无所知。而政治本身不过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在脱离对经济基础的认识下，是根本没有办法形成对政治斗争的科学认识的，由此就不得不向唯心主义求助。比如《文革史》的作者就认为:

“另一个命题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尽管与其说是剥削阶级残余不如说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才是阶级斗争的根源，”

也即，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存在的根源在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这种说法认为，虽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自身有相对独立性。虽然公有制建立铲除了私有制意识的根源，但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制意识依然存在。实际上从我们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实的公有制依然是社会主义关系与私有制关系的对立统一，现实的公有制本身就会使得私有制意识存在。

按照这个作者的讲法，社会上各阶级的力量的划分的依据就不是经济基础了，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基础了，而是意识。因为工农是最底层的，所以工农最追求平等，所以工农最具有革命意识，所以工农干部的革命性才会高。实际上这里还是稍稍用到了点经济基础，那就是从工农最底层这个基础出发。但是一到工农干部那就又重新是主观主义的。而且虽然用到了点经济基础，但没有贯彻到底，没有指出工农内部的不平等，没有指出这种不平等也可以导向资本主义，从而没有认识到工农自身也存在着走资的可能性。结果就是，只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抽象的绝对革命的人民，只要绝对革命的人民打倒了先锋队，绝对革命的人民就能自发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然后社会主义就能真正建成。但实际上，就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来看，复辟的第一阶段是减少中央的集中控制，加强各个劳动者对各自生产资料的占有，这表现为一种“民主”。党不压制群众了，群众有“自由”了。实际上，这种“民主”、“自由”的本质在于群众本身分裂的加剧，在于群众之间不平等的发展。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发展了，复辟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了，那就是少数人开始骑在大多数人的头上。

其次从写法上来看这本书也很糟糕。贯穿于全书的写作思路的核心在于以论叙史，也即从自己的理论、结论出发去叙述历史，而不是反过来从历史出发，对整个历史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行周密的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作者从社会主义下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党的包办替代与依照民主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斗争。为了

依照这个论去叙史就开始裁剪历史，先是塑造苏联道路与延安道路的对立，而不是承认后者是对前者的辩证否定，只强调延安道路的“民主”而不强调延安道路本身也是强调党的领导。结果就是所谓的苏联道路、延安道路本身也被扭曲的不像样子，和历史上的真实表现大相径庭。再到所谓的反右运动，按照作者的那个论就肯定要把党打成完全反动的地位，而把体制外的群众塑造为先进的革命者。而实际上却是社会主义先进单位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诞生的（大寨村），体制外的群众有脱离党而搞出一个先进单位的吗？恐怕一个都没有。大肆鼓吹的体制外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要么就是直接反对合作化等社会主义道路，要么就是鼓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就这样的人作者还硬说这是文革预演，你说这是改开预演我还信一点。在这里作者就把对立统一观点丢了，没有认识到，最革命的力量依然在党内（从先进单位全是靠党的领导诞生的就知道了），党本身虽然有许多落后面，但主要是进步的。群众本身并不能成为自发的最革命的力量，群众本身指出党的不足，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党的更好领导。无论是大寨还是大庆那都可以看出来，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一结合，就能发挥巨大威力，党员不是在人民之外，而是人民中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比如王庆喜这种工人，看到北京的车没油只能烧煤气会哭，因为他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林希翎这类人会这样吗？他们只会嫌弃党骗工人去偏远地区干活，实际上就是闹待遇，就像上面举的那个大庆油田知识分子的例子，来了大庆首先感到的是个人前途无望，而不是说可以为国家做贡献，所以感到无限光荣）

说白了，党是一分为二的，革命是主要的，落后是次要的。发动群众来整党，是为了发展党革命的部分，消灭落后的部分。群众本身也是一分为二的，大量的群众提意见首先还是局限于自身的个别利益，只有极少数人能从全局观点出发，而还有许多人甚至是直接反对社会主义的。党对待这些批评意见要注意，从群众中吸收那些能从全局出发的最先进的人进党，要善于正确采纳群众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见。要正确对待群众提出的个别利益，因为很多时候这其中也涉及到许多党员的不良行为，要通过群众的意见来把这些落后的党员清除出去。对于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则要学会说服教育并与之斗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情况本身非常之复杂，群众本身是一分为二的，有积极的，有落后的。积极的人提的意见也是对立统一的，有好有坏。落后的人提的意见也是对立统一的，正确对待也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比如有人要闹单干，如果充分研究他人的意见，也可以得到使他人积极拥护合作化的办法。如果简单驳斥则不一定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说白了，现实本身是极度复杂的，我们本身的叙述也只有反映这种复杂性，才能达到真实。但是这个作者不是这样干的，他是用简单的叙述来代替现实，同时用对现实的扭曲来支撑他自身的论述。所以他整本书都存在这样一些倾向，比如重结论，轻分析，直接给了个林希翎是马克思主义者，然后学校运动是红卫兵运动演习的结论，但实际上一分析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很多地方都是唯心主义的推断，牵强附会，捏造现实。比如说毛的思想和西马的葛兰西更接近，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由此这本书的史料价值也不得不大打折扣，首先是作者不懂最基本的马列毛主义理论，不懂政治经济学分析，他的基本理论是向外求的，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次是作者写文时不老实，把很多不靠谱，缺乏依据的观点当做史实丢出来，比如说毛在反右前认为党蜕变成了完全保守的机构。其次作者明显也对许多历史缺乏细致深刻的研究，然后才能写出什么列宁靠几千布尔什维克夺取革命胜利这种调调。

最后从这本书所得出的结论来看的话，老实说也毫不新奇。经济上的公有制，政治上不民主，所以只要完成政治上的革命，打倒布尔什维克党就可以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论调实际上就是上世纪托洛茨基的堕落的工人国家论调。后面的南斯拉夫也是按照这个论调来的，所以托派对南斯拉夫的“革命壮举”兴奋异常。而我国的林希翎也是对南斯拉夫的“民主”十分推崇，这一下子就全联系起来了。作者的论调不过是托洛茨基思想的继续罢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上的不民主就不去消除了，政治上的斗争就不重要了，不是的。在文革早期，指导文革的思想也是如此，以1966年文革十六条为例:

“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很明显，这段论述本身也是轻经济基础，重上层建筑。由此在以前就有很多人指责毛的文革理论基础，因为认为这种理论对阶级的划分不是以经济基础为依据的。但是要注意，毛时期的理论也不是停滞的，以下为引用: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所有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除了前面分析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没有完全取消以外，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都还有一个领导权问题，有一个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出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76年版，P29）

在这里就比66年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因为认识到了生产资料实际上归谁所有的问题，也即公有制本身依然是有问题的，他本身还是包含私有关系，不过这里的私有关系指的主要还是纵向的不平等，也即少数干部等夺取了工厂的管理权，还没有扩展到群众之间不平等这个范畴，但是理论到此的发展还是没完，以下为引用:

“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 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列宁这里讲的是由全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情况，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步。照列宁的说法，即使“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6- 257页)何况我们现在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形式，此外还有部分的私有制。这就是说，在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所有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P21）

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还和资产阶级法权关系联结着，而不同于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这种资产阶级法权规范表现在:

1. 劳动者要按照自己提供的劳动量，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以后，领取等量产品;
2. 社会还要有一个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来组织社会劳动。

正如列宁所说的:“ 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这种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就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在这个国家领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这样，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上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就具有两重性:既有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所有制关系，就不能不兼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所有制关系的特点或特征。（P22）

”（出自《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四人被抓前才堪堪成书）

由上可以看出，列宁所讲的规范法权机构也就是自上而下的集中制度，比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还不能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依然是和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相关联的，由此实际的社会主义关系还是共产主义（社会收归一切生产资料）和资本主义（个人，集体占有部分生产资料）这两种所有制关系的特点或特征。实际上这里所谈的主要还是纵向的不平等，但是注意到群众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本身也是与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相联系的，那么再进一步认识到群众之间占有不等也是必然的了。以下为引用: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个在理论上并未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存在商品生产。这一预计并未被尔后的实践所证实。但他们正确地解决了他们研究视野中的商品生产一般(即包括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类社会形态各种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这就是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个思想最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思的这一段话中,他说:“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迟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部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后来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商品生产。斯大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关于商品生产一般的存在原因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存在商品生产，除了社会分工方面的原因外，从所有制方面来说，是因为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样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它们不是私有者，却是不同的所有者，因而商品生产必然存在。因此从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后，商品生产一般存在的原因就被概括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属于不同的所有者。但按照斯大林的解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必然在三个方面是不普遍的:第一、在国别上不.普遍。革命前农业中不存在大量小生产的国度，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将不存在商品生产。第二、在范围上不普遍。全民所有制企业间交换的产品不是商品。第三、在时间，上不普遍。当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以后将不存在商品生产，即不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商品生产。实践已经证明或正在预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这三个方面都是普遍的。因此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两种形式出发去寻找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并不能在理论上解决问题,而只能使问题模糊起来;不是抓住了所有制问题，而是在回避对所有制问题进行具体解剖。于是有的同志又干脆抛开了所有制，只从社会分工和计量社会必要劳动的必要性和方法，上去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这样论证的结果必然推出商品和价值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存在的结论。在他们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范围上是普遍了，其实只是商品外壳普遍了，真正的商品生产却完全没有了，价值规律将永世长存了，其实他们说的价值只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或许存在的作为计量工具的价值的形式。对这些观点,有机会时我们将作些讨论。

商品生产一般存在原因的二因论是不能否定的，因为社会分工决定了广义交换的必然性，生产资料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决定了所交换的产品是商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也要遵循二因论。就所有制方面的原因说，关键在于对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能在全民所有制方面找到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那末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普遍性就得到了说明。的确，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全体人民的财产，所有权的主体是一个，它们间产品的交换不是所有权的转移。但全民的所有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衍化为企业的占有权，占有者在一定条件下有“相同”或近似于所有者的权利与义务，在所有权不转移的情况下占有权可以转移。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所有制方面存在原因的本质性因素，在存在公有制两种形式的条件下，“并存” 只是这方面的非本质因素。问题就要从对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谈起。

先说“所有”与“占有”的概念。在经典著作中多数情况下这两个词是同一个含义,在有的情况下它们又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在谈到领主经济封建制下的土地关系时，马克思说:“虽然 直接生产者不是所有者，而只是占有者，并且他的全部剩余劳动实际上依照法律都属于土地所有者，可是在这种关系下，负有徭役义务的人或农奴竞能有财产和——相对地说——财富的独立发展，有些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惊异。”在这里，直接生产者，即地主对他有人格所有权的农奴是土地(即他那块份地)的占有者，这是什么含义呢?马克思在如下“一段话中对此有过解释。他说: “如果我们考察地租的最简单的形式，即劳动地租,——在这个场合,直接生产者以每周的一部分，用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的劳动工具(犁、牲口等等)来耕种实际上属于他所有的土地，并以每周的其它几天，无代价地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那末,事情还是十分清楚的，在这里，地租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他又说:“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 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从以上两段来看，对于占有者并不是什么东西(这里指的是土地)在法律上属于他所有，而是实际上属于他所有。按我个人理解，就是占有权在不损害并从属于所有权的条件下，在所有者对占有者的占有权保留着“否决权”(即 在特定的情况下所有者可以收回占有者的占有权)的条件下，在所有权能够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条件下，通常所有者要承认并保证占有者“相同”或近似于所有者的权利与义务。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又把农民看作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按: 引号为原文所有，就是说占有者是“所有者”，即一定意义上的实际所有者)。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讲过“农民对士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

以上主要谈的是占有权。那末所有权是什么含义呢?斯大林讲过:“商品所有者在出售商品之后，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这就是说,所有权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最终的任意的处置权。因此，占有权来自所有权的授予或承认，这种授予和承认本身就是处置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所有者拥有对占有者的占有权的“否决权”。在这个前提下，所有者承认占有者在对别人发生关系时(包括对自己)有“相同”或近似于所有者的权利与义务。这种授予不是对所有权的否定，而恰恰是所有权的一种行使方式。

这样就发生了所有与占有的分离，在同一客体上就存在了两种权利。并不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体制都会发生这种分离，它在历史上仅发生在领主经济的封建制、原始社会末期个体家庭成了生产的基本单位但土地仍归公社所有的历史时期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前二者，这种分离发生在土地上，后者这种分离的范围就更广泛了，它包括了企业全部的生产资料和资金。这几种经济体制的共同点是所有者都脱离了具体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形象地说，只有“两层楼式”的而非“一层楼式”的经济体制，才会在生产资料.上发生所有与占有的分离。如果是单一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部生产资料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体人民。但社会主义社会与原始社会不同，它是具有精细复杂的社会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它不是一个大的原始公社，企业是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本单位，因此其经济体制必然是“两层楼式”的。我们不妨说社会主义经济这种两层楼式的特点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虽然不能说任何两层楼式的经济体制都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两层楼式的经济体制只提供了所有与占有分离的可能性，而不能决定其客观必然性。

所有与占有分离后，为了使所有权不成为一具法律空文，也为了使占有权得到确认和保障，需要有一系列的上层建筑的东西对这种关系加以明确和保护，同时所有权还要在经济上实现自己。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形态，但不能说所有地租的提供者都是土地的占有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下，公民的所有权也要在经济上实现自己。在社会主义经济两层楼式的特点提供的'所有与占有分离的可能性的前提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衍化出企业占有权的客观必然;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原因的关键所在。

我个，人尝试着做出的回答是: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之间仍然有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因而个人的劳动并不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而存在所决定的，而最终这又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决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劳动是否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的问题，马克思讲过:“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上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在问题扩大到一般的公有制时，马克思又讲过:“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可见马克思认为在公有制下，个人劳动都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力就象一个个人劳动力，而个人劳动力只是社会劳动力的不同职能。我认为这对于原始公社制及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的，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正确了，因为这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相违背的。

”

（出自《所有权、占有权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

这里实际上讲的就是76年社政经提到的企业是相对独立经营的生产单位，这其实就是横向的不平等。而这里的理论是1979年的，注意到了个人之间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等，当然，他没划分出实际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不一致这点。结尾那种自由人联合体笔者可以进行这样一种设想，用科幻的说法就是所有人的意识都融合成一体，这个总的集体意识为了满足，总的人类的需求，从而像操控器官一样操控一个个人类个体去执行各种活动。当然，现实肯定不会这样，最大的可能是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后，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同时兼顾个人利益的原则来为所有人安排工作，而所有人本身又都能克服自身狭隘的自私自利的意识，实现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实际上，这种公有制意识不过是对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反映罢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毛时期本身也存在一个对自身理论进行辩证发展的过程，66年时还是主要注意到上层建筑领域，76年就到经济基础领域了。即使是76年以后，一些理论本身也更具体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下占有制不等的问题。（当然，他们的基本逻辑是，因为社会主义下存在占有制不等，所以占有制不等就是合理的，就该发展这种不等。这和笔者的希望消除不等的思想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如果真正按照马列毛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去看待问题的话，那肯定是要去深刻研究经济基础领域的。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嘛，私有制意识的根深蒂固还是要从经济基础本身的内部矛盾中去寻找。可按照那位作者的所谓的毛的思想和葛兰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意识的残余来讲，那就根本不需要考察经济基础了。一个抽象空洞的公有制概念即可。所以，这个作者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采取的是非马列毛主义的方法，哲学根源上也是如此，也即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从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点出发。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北马的《文革史》是有着极其巨大的缺陷，错误的。基本理论有问题，占有的材料不充分，主观推论太多，许多具体结论都是错的，对历史的描述也有很多错误。这还是笔者大概只看了50页挑出的毛病。当然，听说这本《文革史》本身只是北马的成员之一写的。但是很明显，这本书的作者的很多基本观点、方法都和北马的人有着诸多的相似点。比如《共和国的历程》和《文革史》都极其轻视对经济基础的分析，但实际上马列毛主义讲的恰好是以经济基础作为分析的基本点，这才叫历史唯物主义嘛。结果两者所看重的都是上层建筑的分析，很多具体观点也相近。（比如《共和国的历程》也不承认大跃进本身导致了一些先进单位的诞生，这些先进单位本身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诞生的。从这点上来说，《共和国的历程》本身也注重的是纵向的不平等，对于党的革命性方面的理解不足）当然，在这里还要说一下，即使是先进单位也不是完美的，比如大寨和大庆都没有很好地完成文革的任务，结果自身也被时代抛弃。讲这点是希望大家对先进单位也要进行对立统一的看待，而不是只看到其好的一面。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超过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表现为对过去缺点的超越。

但是就这样一本缺点满满的书，他的许多基本观点在左派中却是相当流行。比如笔者经常看到的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无外乎这些方法，缩减工资差距（只看到纵向不等），建国后要在灵魂上铲除私有制意识（意识不到私有制产生的根源在经济基础，以为公有制不会产生私有制意识），极端要注意的是先锋队的腐化，所以要扩大民主云云（注意不到群众的腐化）。其实民主只是承认现存的占有不等罢了，从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初期面临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来。占有不等的情况下，不管是集中还是民主，本身都是不平等，只是说集中更有利于满足社会利益。当然，过分集中又会走向反面，所以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变革经济基础，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扩大民主，这个阶段完成时，先锋队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当然，人民中的积极分子还在，好，一般，落后的存在也是永恒的，在新的社会下只有民主没有集中恐怕也不太可能，变化的可能是集中的形式。也就是说未来社会应该是既有集中意志，又有广泛民主，集中与民主的统一。只是说，集中、民主的形式会发生改变。比如以后的集中可能更多的减少强迫命令的习惯，主要靠说服教育，同时呢对于利益受害者给予适当的补偿。很难想象以后就绝对不会产生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历来总是只注意到民主，而注意不到民主本身也会导致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从而导致社会利益受害的情况。）

当然，即便如此，笔者也不是说就要把这一本书贬得一无是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认识的初始阶段的产物总是比较幼稚的，到了认识的比较深入的阶段，比较深入的认识才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错误的认识也是通向正确认识的桥梁，正确的认识就是通过不断与错误认识做斗争而发展壮大的。其次，这本书的作者毕竟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不是这位作者，笔者也不知道林希翎这号人。这就像哈哈镜一样，反映的图像是扭曲的，但是抹去这个扭曲也能达到现实。同时这个作者能写出这么长的作品，影响这么多人，无疑是下了一大番苦工的，轻易地否定别人的成果并不那么好。因为每个人自己的认识往往也有局限性，你今天把别人轻易否定了，那么明天你也会被别人轻易否定。有一个短文叫《炮打北马文革史》，这篇文无疑是指出了《文革史》的一些错误。但是反过来，简单的否定方法，激烈的斗争形式，也让笔者觉得这种否定很难达到想要的效果，笔者并不想给人造成一种笔者习惯于简单否定某事物或者就帽子的印象。笔者更希望给人造成一种笔者是在认真分析错误观点产生的原因的印象。也即重点不是指责某人犯了什么错误，而是主要去分析他犯这种错误的原因。重分析，轻指责、扣帽子。

五，总结

写了以上那么多，引用了那么多，终于到了总结了。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大致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和上次那位可敬的先生争论后，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也即76-84年经济体制没变，所以这时期的高速度也是社会主义毛时期的优越性的体现，对此笔者已经回答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笔者在这里顺便简要回答下。那就是笔者说，发电量的增长会越来越慢，实际上这里反映的是生产的基数越大，增长速度会越慢的规律。对此这位先生不认同，并且贴出了对应数据材料，材料显示在一定时期内，忒涩的发电量增长反而表现出了一种高速度的态势。还有人表达这样的意见，认为基数越大，增长速度越慢的规律不存在，因为古代的基数很低，增长速度却更慢。笔者后面仔细审视了自己的观点发现确实不完善，在这里笔者的新观点是:

“在生产力不发生质的变化下，生产力本身有个上限，越是接近这个上限，增速越慢”。

比如农业领域，如今的粮食生产主要还是依赖种地这种模式，亩产量越是高，粮食的增速反而越慢，继续扩大化肥这些的投入反而会减产，也即粮食产量越高，增速却不得不下降。改开后就有这种趋势。但是，如果一旦那种人工在工厂条件下合成粮食的技术成熟了，那粮食产量不仅能远超现在，增速也能远超现在。所以，笔者原先的提法是很不恰当的，不是各位指出笔者的想法的错漏，笔者也不会去继续思考。对于发电量笔者的理解也是如此，首先电力的消耗大头自然是工业，工业的扩张笔者认为在生产力没有质的变化下是有极限的。比如假设做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车辆出行，那汽车行业就接近饱和了。（当然，实际上做不到的）这部分工业没法发展了，这部分对于发电量的需求自然就饱和了。反过来，如果以后发明了人人适用的空中交通工具，且使用比汽车还方便。（比如电影里那种悬浮飞船）然后由此引起了整个工业系统的革命，那这时候发电量增速恐怕又会暴涨。

那位先生指出的改开后，在一个时期内发电量增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对此笔者是这样理解的，这就像一个从不锻炼的年轻人在中年时锻炼了一下，然后变强壮了，但是总的来讲，他是在往衰老的方向发展。发电量也是同理，在生产力没发生质变的情况下，发电量本身的增长会有一个越来越慢的趋势，但是在一些具体时期内，由于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也可以表现为增速提升，但是总的来讲是要下降的，从最近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来，电力行业的投资额增速一直在降，这和工业的增速下降是有关的。不是有这种说法嘛，现代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会越来越大。笔者的理解是这是因为生产力本身越发接近其极限了，所以基础的工业领域逐渐停滞，投资不得不转移到第三产业。那假设以后进入太空时代呢？那恐怕第二产业又要高速增长了。

在这里的问题应该是在于因为现实本身往往是多个规律叠加起作用的，而不是单一规律起作用，由此可见笔者当初的分析也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这里笔者并不想表明自己在这里的新观点就绝对正了，因为这需要细致的研究才能证明，在这里笔者做不到这点。所以笔者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罢了。

那以上和那位先生的争论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这就要到笔者的第二个目的，也是主要目的。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根本的不在于说反驳一些笔者认为不那么正确的观点，根本在于讲清楚一些分析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最根本的在于笔者认为不管什么理论、结论、认识，最根本的在于要正确反映现实，达到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要是真理。《文革史》以及一系列流行于今天的左派中的观点他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是一系列基本理论，认识方法，所占有材料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三者之间往往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就比如基本理论吧，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不等这个说法说起来很简单，就一句话，但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花了很多时间。为什么长期在基本理论方面的认识前进的如此之慢呢？为什么像《文革史》这样的书到今天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基本理论的发展呢?首先第一在于认识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个认识的方法的第一个问题在于重理论，轻实际。许多人学习研究分析问题，习惯性地只是把他人的观点借过来。他人的观点本身其实也表明了一部分的基本理论与实际材料，但往往很片面。这就导致，这样的人必然对于实际缺乏深刻的认识，他自身的理论只能在他自己限定的材料范围内才能解释的通，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他就没法解释了。比如《文革史》就不能解释为啥少部分先进单位是在党的领导下诞生，为啥一部分人民内部存在单干倾向。

第二个问题在于只重视一部分材料，不重视其他部分材料，同时不注重最根本的材料。就像《文革史》一样，只重视政治斗争的材料，把经济基础的材料丢到一边了。但是经济基础是理解政治斗争的基础，没有对经济基础的理解，对于政治斗争的理解也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了。

还有占有的材料上，许多人也研究基本理论，但是往往浅尝辄止。也即看了点理论书籍就完了。比如笔者原先看一些地方开列马列毛书单，就直接是各种简明的教科书，如社政经这类。一方面来说，读这些书肯定容易上手，因为他比较成系统，而且总数又少。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是不是看了这些理论教科书就懂现实了呢？不是，完全不是这样的。理论本身相比现实来说是比较空洞的，因为理论属于人对现实的认识，而人对现实的认识总是不那么完善，被各种条件所束缚。也就是说，读完基本理论不是对于现实认识的完结，而只是对现实认识的开始。（很多人相反，读了几本理论教科书就开始大谈现实该如何如何了）

认识的第二步应该是大量细致地研究实际的经济生产单位，从对最基本的经济单位的实际生产过程出发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比如一个实际的人民公社是如何运作的，他有哪些职能？在人民公社里社员要干哪些事，如何分配?工分如何计算?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之间具体的经济往来如何？对于这些有了一个全面，具体，细致的认识后才可以说，你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一一般性的概念有了深刻的了解。即使是基本理论，往往76年以后也有许多人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往往也会表明其结合了一些新材料，当然，这类理论往往谬论也很多。包括对最具体、最实际的材料的占有也是。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许多描写人民公社最基础的活动或者说毛时期工厂等最基础的活动的材料，是在76年以后写的，而且是“立场”不好的人写的，这些“立场”不好的人往往会写社会主义的“黑料”，这类一般被叫做“黑材料”。比如小岗村的故事就属于这类。历来对这类材料的认识都很简单，那就是“黑材料”是假的。除了极少数仔细研究的人会看各类材料外，许多左派就是看到你给的是“黑材料”，那就不管你的黑材料给的是什么，那都是假的。比如笔者原先给人贴过毛年谱里毛的话，因为毛的话不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他们就宣称这里面毛的话是假的。这里也就表现为一种极度简单化的认识，他们往往喜欢这样，xx论调是真的，然后堆叠能证明xx论调是真的材料。你一旦拿出相反的材料，他们首先不是去试图解释材料本身为何如何，而是赶紧宣布材料是假的。比如笔者说包产到户在一定条件下能增产，对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证明笔者的材料是假的。这样就造成一种负面循环，你本身只相信符合自己论调的材料，不符合的你所想的不是说根据新材料修正自己的论断，而是选择断定材料是假的。结果你越是进行理论斗争，你本人就越是陷入一种极度狭隘的境地，超出这个境地的东西你是没法解释的，你只能把他看成假的。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首先没有把对立统一的观点贯彻到这种领域中，不能认识到正确的理论本身也是对立统一的，他本身要靠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来实现前进的。错误的理论虽然错误，但是往往也能扭曲地反映现实。还有新事物本身也不是绝对好的，也是对立统一的，认识到这点反而有利于新事物发展。所以研究新事物的负面因素也是必要的。旧事物虽然落后，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具有优点，研究这样的优点有利于限制、消灭这种优点，从而推动消灭旧事物。总之，一切认识重点都在于正确反映现实，由此才能正确指导实际。

而实际上，对于过往理论的认识，也往往直接和对今天的认识相关联。如果说我们用形而上的观点来看待文革，那就必然得出文革时期的各种方法是完美的，是我们今天应该采取的。那笔者今天写的文估计就要变成《炮打xxx》，就那种里面一大堆帽子，一大堆攻击的写法，恐怕很多人都不会认同，最大的可能是立刻激起对笔者的反批判。由于不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笔者的观点，结果必然是笔者的观点被扭曲，然后也被反扣一顶帽子。所以在这里，笔者选择了对文革方式的一种辩证否定，也即重点完全放在分析问题本身，而不是急于指责xxx犯了啥啥错误，接着再给其扣上啥啥帽子。就笔者的经验而言，专注于分析问题本身，是最有利于他人接受你的观点的。一旦你的态度稍有不好，对面往往把你当敌人，然后往往就演变成争吵，结果吵了半天没啥效果，实际上是一种低效交流。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今天的人模仿过去的行为也是必然的。笔者同样并不想指责xx采取了某种激烈的斗争形式，所以他就如何如何。今天的人，既然是从学习过去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那就自然很容易去模仿过去的行为。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只是说在实际的交流中逐渐认识到自己所采取的方法效果不好才逐渐学会改变。

自此，全文终于写完了，可能有人觉得又臭又长，可能有人愤而批判。比较遗憾的是笔者今后在这方面没办法投入太多时间了，笔者要去优先解决自身的生活问题（恐怕这一点会让许多人幸灾乐祸），所以。如果真的有人细致认真的全面批判笔者的观点，笔者在这里就先行道谢，因为愿意细致认真地指出他人的错误、不足本身也是一种付出许多的行为。同时也向这些人道歉，因为笔者可能无法回应。